


《校史资料——人物篇》系列丛书是由学校关工委文化组和党委宣传部共同策划编辑出版的重要的校园文史资料，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历史缩影，也是校园文化的凝翠精华。此系列丛书以记录学校名师、名家为切入，深度还原了北京科技大学近70年来各项事业发展改革进程，进一步丰厚学校发展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生动地弘扬了“求实鼎新”的校训精神，诠释了新时代北科精神的实质内涵。

值此《校史资料——人物篇》第四辑出版之际，谨致以诚挚的祝贺！希望全体北科师生和广大校友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深入学习和发扬老一辈北科人栉风沐雨、艰苦创业、顽强拼搏、严谨求实、锐意创新的精神品质，拓展学校文化建设的内容和形式，共同为把北京科技大学建设成为有特色的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昔日满井村 楼馆园斋 苍松翠柏 花艳鸟鸣。

今朝北科大 理工文管 栉风沐雨 求实鼎新。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前言

有言道：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永驻的教师。是的：星换斗移，沧海桑田，千百年的满井村今天衍变成了北京科技大学美丽的校园，她是我校三十余万莘莘学子永远不会拆迁的故乡；流进流出、南来北往的一代代钢铁学人早已学有所成，正在神州大地上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然而只有那些以教育兴国、科技报国为终身志向的一批批教师却永远驻扎在这里，在三尺讲台上不懈地辛勤耕耘，毕其一生。学校成了他们实现家国情怀的终极战场。

北京科技大学建校已经六十多年，她已经铸就了诸多的辉煌。当我们今天在列数这些成功、成绩和成就的时候，铭记学校先行者的丰功，传承他们那种拥有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教学和高尚的学品、人品、人格及开拓进取的优良作风、优秀的文化传统，不仅是我们后来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更是我们学校能否进一步鼎新进取夺取更大辉煌的必备基石。

编著《北京科技大学校史资料》（人物篇）的主旨是要收集、整理和编写那些曾在学校长期工作并作出突

出成绩的学校开拓者的珍贵资料。挖掘并抢救一些尘封多年且濒临丢失的建校历史史料，为将来编写的建校《百年史》或学校《名师名人录》积累必要的素材。更是为了加深对学校史料的解读，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北科大独特的大学精神，以鼓励、教育和激励后来人。

《人物篇》所要展示的大多为以往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人和事。它将记载有许多的人和许多的事，这些人有名人也有极平凡的人；许多的事有大事亦有小事。尽管这些人和事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它揭示的却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流淌着“科大精神”的人文理念。

在时间的长河里，追寻那遗失的片段，在尘封的历史中，打开尘封的记忆。回顾历史，再忆往事，你读一读就会知道：回首历史，其实往事并不如烟。

《北京科技大学校史资料·人物篇》

采编的初步实施方案

一、《人物篇》候选人遴选范围界定：对学校各方面建校和发展曾有过突出贡献且有明显影响的人物。具体范围：建校首批；在教学、科研、管理、文艺、体育等领域获得过市、部级以上奖项的教职员工；长期在校任职并对北科大校园文化精神、工作作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党政管理干部。遴选不限定人数，体系开放。

二、采集编写的主要内容：一是候选人的基本生平，专攻所长、工作业绩、专著、译著及出席国内、国际重大会议和所获市、部级以上各类奖励等情况。二是能反映候选人鲜明个性并能对后人有所启迪、教育和激励的故事及其信奉的生活、工作座右铭，有关报纸、杂志所载候选人的事迹报道和部分精选的回忆、纪念性文章。

三、基本的采编程序：

1. 挑选热心且有余力的知情撰稿人，亦欢迎自荐者和入选人家属或子女参与。

2. 初写稿完成后，在充分尊重撰稿人意见的基础上，由校园文化组编辑人员统一进行修订、统编为修订稿。

3. 将修订稿反馈撰稿人或候选人家属进行审定。

4. 最后由校园文化组编辑人员最终定稿。

5. 先行出版“人物篇”第一辑，经公开征求意见后，视资料

的完备情况择机分批分册出版。

四、《北京科技大学校史资料·人物篇》（1952年-1991年）

候选人初选范围确定为：学校初创时的师资、及以1965年前原三级以上教授为主共计32人；学校前四批博士生导师及教学、科研省部级获奖者共计14人；学校早、中期的主要党政管理干部共计9人。

说明：对于现已出版有详尽自传或已形成完整传记资料的，如魏寿昆、柯俊、肖纪美、张文奇、张兴钤等教授暂不列入本次采编范围。

北京科技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校园文化组

目录



杜若牧

- 杜若牧简历与生平 3
- 记忆中的杜若牧同志 6

符荣

- 符荣简历 11
- 高瞻务实皆吾师 12
- 风雨兼程五十年 23
- 回忆我的爷爷 58

高诒善

- 高诒善简历与生平 67
- 深切怀念高诒善教授 69

何品三

- 何品三简历与生平 73
- 忆念何品三教授 75
- 悼何品三老师 77
- 回忆父亲的二三事 81

李文彬

李文彬简历与生平	85
怀念李文彬先生	89
回忆我的爸爸	94

林楠

林楠简介	107
忆延安	111
怀念令人崇敬的三位大姐	122
林楠同志革命奋斗的一生	128

卢焕云

卢焕云简历	139
采矿系第一任主任：卢焕云	141
做好工作，搞好教学	142
山高水长	144

钱振彭

钱振彭简历与生平	155
怀念钱振彭先生	156
深切怀念钱振彭先生	159
北京钢铁学院钱振彭教授在五二所讲学	162

乔丕成

乔丕成简介	165
记俄文教研室第一任主任：乔丕成	169
耄耋之年遂一生心愿	171
亲爱的党——母亲	174
走过沧海桑田 漫渡似水流年的感悟	176

石心圃

石心圃简历	183
一张 73 年前的毕业照	188

杨让

杨让简历	193
青年时参加党组织 建校时艰苦奋斗 科研中硕果累累	196
坦率真诚、宽厚热情的良师益友	201
忆恩师杨让老师	204
杨让教授——我一生的楷模	210
泽水长流，福祉永驻	214
我深深敬仰的老师	226
杨让教授和他的团队	229

赵锡霖

赵锡霖简历	235
-------------	-----

赵锡霖教授和夫人林克悌	244
坦荡度人生——忆赵锡霖教授	249
纪念赵锡霖教授	255
斯人往矣	260
纪念赵锡霖先生	263

朱日彰

朱日彰简介	269
我的父亲朱日彰	273

朱耀中

朱耀中简历与生平	293
无悔耕耘三十载，诉尽一生钢院情	295

编后	306
----------	-----

附录：《校史资料》人物篇	311
--------------------	-----

第一辑目录

第二辑目录

第三辑目录



杜若牧
DuRuomu
(1913年—1966年)

杜若牧同志是革命的老前辈。他早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初期任辽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副厅长。五十年代初他调任国家冶金部教育司副司长，1953年1月调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任副院长，首任学校党支部书记。五十年代中后期，调任中共哈尔滨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等职。1960年曾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在北京钢铁学院初创的艰苦岁月中与我们一起奋斗，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兢兢业业，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的优秀品质深受师生的崇敬、怀念，他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老领导、老前辈。

杜若牧简历与生平

早年参加抗日救亡，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做出重要贡献

杜若牧，原名宝贤，又名伯齐。1913年8月20日生，吉林省梨树县人。十二岁过继到堂伯母家，伯父早亡，靠寡居的伯母供养求学。杜若牧少时刻苦好学，读小学、初中时成绩都名列前茅。1928年后，他来到沈阳、北平就读高级中学。高中毕业报考清华大学工学院未被录取，于是去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任职员。杜若牧在中学读书时，爱好体育，喜欢阅读鲁迅、郭沫若、巴金等作家的进步文艺作品，还阅读《辩证唯物论入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哲学书籍，这都有助于他的思想进步和成熟。1934年在东北大学补习班学习期间，他作为一个东北籍青年，深感国破家亡的痛苦，积极参加东北大学的进步学潮活动。学潮被反动当局镇压后，他离开东北大学，于1935年3月到绥远安北去垦荒。在当垦民期间曾参加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不久，又返回北平，参加抗日人民武装自卫会工作，同时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暑期，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史地系学习，在校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任分队长和区队长。1937年春，加入山西牺盟会，4-5月间到太原军政训练班

受训。后去牺盟会组训会工作，并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指导员。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调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牺盟会秘书，后任该校中共党团书记、教务科长。1940年1月，任晋西抗战学院中共党团书记、教育长，同年，到达延安。1941年8月，任晋西北师范学校校长。1942年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宣传部和政策研究室工作，参加党的整风运动。

1945年“九·三”抗日战争胜利后，杜若牧被派回东北，从1945年11月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先后任沈阳、本溪和安东市联合中学校长。1949年12月，任辽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副厅长。他在解放战争年代，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为培养革命战争急需的人才，做出优异的成绩。

50年代初，我国进入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需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杜若牧奉调到高等教育战线工作。他先后任东北工学院鞍山分院副院长、东北工业干部学校校长、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副院长、中共党总支部书记、国家冶金部教育司副司长。1957年10月，调任中共哈尔滨师范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兼副院长。1963年2月，兼任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

杜若牧到哈尔滨师范学院工作时，正值哈师院创建发展的时期，他主持组建中共哈尔滨师范学院党委，健全学校的领导核心。党委成立后，立即召开学生和教师代表大会，发出“告全院同学书”和“告全院教职工书”，号召广大师生员工在党委领导下，群策群力，加强团结，兴家立业，办好师院。他坚持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坚持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方向。在办好原有本、专科各专业的同时，还创建一批函授教育科的研究生班，要求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他重视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各项改革，不断总结教学经验，认真贯彻国家颁发

的《高教六十条》等有关方针政策，狠抓教学质量的提高。他总结1958年以来“教育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学校教育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甚至有时脱轨”的主要原因是“左”的干扰。遵照毛泽东“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的教导，大力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选拔、培养一批专职政工干部，安排一批青年教师兼任学生辅导员；他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办哈师院“三勤农场”，成为师生劳动锻炼的基地；他重视学生民兵训练和体育活动，亲自带领师生参加社会实践。杜若牧有能力，有魄力，有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勇于开拓奋进的精神。他全面主持哈尔滨师范学院工作仅几年，就使哈师院跻身于黑龙江高等学校的先进行列。他于1960年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杜若牧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经常到课堂听教师讲课，到食堂、宿舍了解学生、教工的生活情况，常到老教师家走访、谈心，交知心朋友。由于他关心教职工学生，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望，学生都觉得他是一位可敬的师长，教职工则觉得他既是领导者，也是大家的知心朋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杜若牧便被停职反省，强加给他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使他在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1966年8月31日，含恨而死。时年53岁。黑龙江省委于1978年9月，为杜若牧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杜若牧参加革命30余年，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特别是对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发展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他兢兢业业、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的优良品德，深受师生的崇敬、怀念。

——摘自黑龙江信息网

记忆中的杜若牧同志

今年是北科大（前身为北京钢铁学院）建校六十五周年。回忆往昔不禁使我想起建校领导人之一的杜若牧同志。他是原重工业部沈阳东北工业干部学校校长，为支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建校，东北工业干部学校整体支援老钢院建校（当时在清华大学筹建老钢院）。他率东北工业干部学校40余人来到清华园，后来这批干部分配到学校的各部处系为老钢院建设奉献了一生。

1953年春节刚过，他们就从东北沈阳千里迢迢来到清华园，学院当时已经从图书馆迁到生物馆办公。办公室设在生物馆三楼，一个里外间，外间是办公室，主任是郭文之同志。我们几名办事员在外间，有赵松年、张昶栋、谭学道、王兴红等同志。为欢迎他们的到来，我们在生物馆二楼一间大教室由部门工会召开了欢迎大会。主持欢迎仪式的是赵锡霖教授（他当时是清华大学教育工会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部门工会主席）。赵锡霖教授宣读欢迎词开口便讲：兄弟我代表北京钢铁学院部门工会欢迎大家的到来，支援钢院建设，他的讲话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接着杜若牧同志代表东北工业干部学校讲了话。至此以后我们就一起办公。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心我们这些青年人，经常和我们谈心。他理论水平很高，讲话声音宏亮很是感人。大约在1954年，他曾在西饭厅讲政治理论课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

他在老钢院工作了几年后，大约在1956年调冶金部教育司，指导冶金部属院校的工作。他有时也来老钢院看望一些老同志，

后来听说调哈尔滨师范学院任党委书记兼校长，但在“文革”期间受迫害不幸去世。

杜若牧同志是我们大家学习的革命老前辈。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奉献了一生，先在山西革命根据地工作，西北解放后又开赴东北，为培养干部作出不少贡献。他在北京钢院初创时期来到学校，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和我们一起奋斗，他是中共钢铁学院党支部的首任支部书记，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老领导、老前辈。

供稿人：张昶栋

——摘自《校史资料》“难忘的岁月”中
（东北工干校整体支援老钢院建设）一文



符荣
FuRong
(1926 年—2008 年)

符荣同志是北京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他在北科大担任过人事、科研管理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委领导。他在担任党委书记期间（1983-1992年），为北科大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建设与发展，尤其在团结、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在北科大的历史上留下翰墨多采的一笔。符荣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在六十多年革命生涯中，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坚持求真务实、不图虚名，工作作风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干部群众。他心地善良，爱护青年，特别注重培养青年人才和青年干部，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符荣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高尚品德和对党、对祖国做出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并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符荣简历

符荣，1926年出生，四川省宣汉县人。北京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1944年毕业于四川达县师范学校，1945年3月在陕甘宁边区庆阳三八五旅司令部参加工作，先后在延安大学教育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系学习，194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满洲里西满军区办事处招待所所长，东北财经干部学校政治班助理员，吉林工业专科学校政治班副主任。

建国后，历任东北工学院学生指导科科长、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中央重工业部教育司干部科科长；1958年3月调入北京钢铁学院工作，曾任人事处副处长，工艺系、理化系总支书记，科研部主任、总支书记，政治部副主任、总支书记；1979年2月担任北京钢铁学院党委副书记，1983年10月至1992年4月任北京钢铁学院（1988年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符荣同志1994年4月离休。离休后仍然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2008年3月22日1时3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医三院逝世，享年81岁。

高瞻务实皆吾师

——回忆符荣同志二三事

我与符荣同志属两代人，是北科大30年的同事和邻居。他在北科大担任过人事、科研管理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委领导。他在担任党委书记期间（1983-1992年），为北科大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建设与发展，尤其在团结、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在北科大的历史上留下翰墨多采的一笔。可谓：“经年更识符荣同志，尚践高瞻是我师。去渍扬清多转侧，改革开放正当时。摇篮满井留文藻，细雨和风现梦思。大笔鸿基千载业，一生毓秀百年诗。”

发挥知识分子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符荣同志在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等方面做了许多带有关键性的工作。这些，不仅在学校的《改革纲要》、《发展规划（1986-1990）》、《整党计划》中得到反映，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予以体现。1985年1月24日，符荣在整党第二阶段《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中指出：“只有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彻底否定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论和学校党阀、学阀联合专政论，才能肃清‘左’的影响。”符荣同志对担任宣传工作的同志说，彻底否定“文革”的重要标志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例如《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等，我们都听过传达，有的甚至是直接聆听的，我们要好好学习，切实贯彻。首先要有三个确定，确定知识的重要性，确定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确定十七年是红线主导，才能真正尊重人才。“知识就是力量”，这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说的。知识可以说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自己的力量，更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力量。他说，我们学校是大小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什么“教头”“名角”都有，只有真正的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才能发展科教事业和培训新型知识分子。符荣同志举例说，如果像制造自行车和热水瓶那样，30年“一贯制”，没有什么变化，那这些工厂只要有熟练的工人就可以了，还要用工程师、技术员干什么呀！是浪费金钱，更是浪费人才……

“我们学校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们当干部的必须在思想认识上，承认教师、技术人员，尤其是老教师拥有丰富、有用的知识和教学科研工作的劳动成果。”符荣同志非常关心教师的任教和任职情况，他要求发挥“教授治教”能力，亲自与他们谈话，要求他们担任某种重要的科教工作，甚至是学校或处级或教研室的领导。1984年1月4日，教育部、冶金部和北京市委批准了学校的机构设置。全院40个处、系（14个）单位的中层干部共116人，绝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学校领导干部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比例更大。符荣同志与王润校长一样，非常注意教职工高级职称的提升情况。有人曾经提出如何处

理“历史问题”和“派性”问题。符荣回答说，主要看现在、看表现、看专长。他引用了邓小平在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也要团结教育，发挥他们的专长，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和热心帮助他们进步。”“‘文革’中的派别、对‘十七年’的估计、对有关干部的评价，是拨乱反正、激浊扬清问题，都属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提职称时，重在表现和业务水平，不计前嫌，不管背景、出身、年龄，一视同仁。”所以在符荣担任党委书记时，被晋升高级职称的至少有286人，例如1987年有86人，1991年至1992年有112人，还有相当数量的教师获得国家或市或校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称号、“中青年专家”称号，有的还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所以有的教师被喜称“四喜临门”、“五子登科”。他们中的大多数受到符荣的称赞、祝贺或拜访。

符荣同志很关心老教师的思想政治进步并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他主动与老教师接触，听取意见、询问工作、学习、生活情况。1984年6月28日在161名新党员宣誓仪式中，有外语教研室主任83岁的乔丕成教授；在1985年7月1日的入党宣誓中，有林宗彩、柯俊、肖纪美三位教授，成为学校的重要新闻。1983年初，学校党委传达冶金部教育工作会议后，明确要把北京钢铁学院建成以工为主，理、工、管、文相结合的多学科重点大学。学校行政在建综合大学改校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符荣同志认为应多听老先生们的意见，提出了拟名“钢铁大学”、“冶金大学”、“理工大学”等方案。最后一次商讨校名的党政联席会议，还有一些老教授参加。符荣同志说改校名是科技综合发展、学校多年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广大师生的愿望，想再听听大伙的意见。柯俊说多数老先生认为带有专业名称的校名，不能反映其综合性，

故倾向于“理工大学”这个名称，专程与会的国家教委副主任刘忠德说“理工大学名已由北京工业学院捷足先得。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怎么样？”“译成英文差不多……”符荣说“老先生们没有异议……”刘忠德说“先这么定下……”

符荣同志很注意教师的业务工作和业务时间。他提醒校宣传工作的同志，对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要求科技人员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适用于高等学校。像“文革”期间，老是搞突出，搞突击，乱哄哄的，“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书桌”，什么事也干不成、搞不好。要把业务时间“还给教职工……”“政治学习活动，不能搞形式主义。”

符荣同志赞赏“全员育人”。1984年6月在筹备第十次工会代表会时，张奇曾提出，要提倡“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符荣同志赞叹地说“教学、教务部门早提出“教书育人”，现在又有“两个育人”，成为“三育人”可以说“全员育人”了，很好，要大力提倡”。1986年开始，在学校教学、人事部门组织下，多次举行了“三育人”或近似于“全员育人”的经验交流大会和表彰大会，充分发挥教职工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朱荣华、孙维约、肖纪美、张铃等成为“三育人”的先进模范人物。

胜似“后勤总务长”。自邓小平说“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后，符荣同志很关心教职工的住房问题。他说，“安居才能乐业”。他告诉起草《家属宿舍的分配、调整、管理试行条例》的同志，“35栋的分配，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到公平、合理、公正、公开。”符荣很赞成在条例中有学历分、职称分和奖励分。这个《条例》经多次讨论和修改，在1984年9月第一届教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成为教职工分房的依据。以后由于学校行政和基建部门的不断努力，逐步解决了教职工的住房问题。

建立强有力的思政系统

“文革”以后，符荣同志在主持学校全面性工作的同时，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做好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上。1984年以前的工作重点是拨乱反正，清理思想，整顿队伍。符荣认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产生了“两脱”问题，即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上，脱离学校实际搞形式主义、“假大空”不着边际，学校没有平静的日子。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上，是“摆架子”、“使鞭子”、“扣帽子”脱离群众。思想政治工作，不再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表扬激励为主的精心陶冶，而是用训人、压人为常态的粗暴方式行事。符荣同志在作整党动员和整党总结报告前后，对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极“左”影响作了多次调研，列出了它的表现形式，同时明确指出：“否定思想政治工作中极‘左’做法，是彻底否定‘文革’的重要标志。”他还会同思政部处制订了做思政的要求：“要深入群众，做思政工作的同志和朋友；要用正确的方法，及时了解思政对象的真实思想状况；要及时进行思政工作，重要问题不过夜；要平等待人，“不打棍子”，“不扣帽子”；要启发自觉，调动自我教育的积极性；要不断学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政工作的水平。”

1984年后，符荣同志认为做好思政工作的重点是完善和改进组织系统，着力提高思政工作的效率和质量：(1) 提出了选择思政工作者标样：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和党的基本知识，具备思想先进性。学习成绩要好，有示范作用。要有为思政服务的意愿责任心和实际能力。要有大局观点、群众观点，能平等待人。具有艰苦奋斗，朴实认真的工作作风。(2) 健全了组织机构，



党委书记符荣（右四）参加学校第十届职工代表大会

进一步明确了分工。学校党委主管思政工作的领导，下设教职工思政工作阵线，由教职工各党支部党总支及专职思政成员构成，由党委宣传部牵头，负责全校教职工的思政工作；下设的学生思政工作阵线，由学生党支部及专职或兼职政工人员，以及任教的教职工组成，由学生思政处负责全校学生的思政工作。1991年5月校党委《关于加强研究生政工队伍建设及健全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机构的意见》，决定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校、系和教研室三级党的组织和行政共同负责的工作体制。1990年3月，学校在《制定‘八五’师资队伍建设规划的意见》中，明确了行政在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职业道德培养方面的职责和要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学校陆续涌现了一大批思政工作先进的党支部和先进个人。1986年9月张铃等被评为“全国冶金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1988年12月学校主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同志被评为“全国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先进工作者”。1991年7月国家教委授予陈玉鑫“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

称号。(3) 建立了思政工作、理论研究和工作经验交流新阵地。在符荣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1985年初《思想教育研究》创刊,并于1987年4月向全国公开发行。这是首份全国公开发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学术期刊。1985年10月《北京钢铁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创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向全国发行。1988年12月成立冶金系统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并有刊物发行。此外,应时成立的思想教育专业、学位授予点及其教学与研究的组室,专门成立的业余党校,都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思政研究和培养思政队伍的重要阵地。(4) 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由于主管青年学生思政工作领导,与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教育教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的共同努力,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学校思政教育开创了新局面,走上了新阶段,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出版了相应的著作。这个理论体系,大致分为六个部分:①思想政治工作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指导思想。②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特征。③思想政治工作学的基本规律和理论体系。④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⑤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基本方针和原则、基本过程、基本途径和方法。⑥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和现代化。

总结培养有用人才的经验

为教改和校庆30周年作准备,1981年11月6日,时任学校党委副书记、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符荣,带领了一个有樊源兴、陈襄武、李锦承参加的四人小组,奔赴华北地区毕业生工作的所在地,进行近三个月的调查研究。临行前,符荣对调研组说:我们学校匾额上誉为“钢铁摇篮”,社会上和一些毕业生称它为“市长

基地”，也有人嬉说它“钢老三”或“体育学院”，说明我们这个以钢铁冶金材料为专长的学院，在培养“钢铁精英”及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体育工作和竞技运动方面，也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我们这次去4省市自治区6城市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表现的反馈和毕业生工作的深刻体会，进一步了解用人单位对学校培养钢铁工业人才的期盼和要求，总结培养技术骨干力量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

1. 在天津总结冶金企业特点和培养人才的基本要求

1981年11月7日召开的北京钢院毕业生座谈会上，校友们的发言很热烈，主要集中在冶金企业特点和毕业生的适应性方面。符荣同志总结说，毫无疑问，冶金企业的特点，决定了冶金院校培养专业人才的基本目标和方法。冶金企业可以说是“一大”，企业大、人数多。“二多”，多为联合企业，多在远离城市的资源地。“三高”，高耗、高危、高污染。所以，冶金院校的毕业生要有“四种意识”，就是大局意识，群众意识，超前意识和危机意识。缺少任何一种观念，就不是合格的毕业生。冶金院校的毕业生，还要有“五种本领”，就是工程技术设计和施工的能力，本职工作方面组织管理能力，调查研究的能力，自学和提高的本领，专业劳动、普通劳动、吃苦耐劳和适应环境的本领，只有“五有”者，才能在冶金企业中生存、发展和作出应有的贡献……

2. 在石门归纳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两个结合”

在石家庄召开了两次毕业生座谈会。第一次与会者多为体育运动的佼佼者。第二次多为省市科技或生产劳动的模范人物。他们的发言，集中在学生时期的“全面发展”和工作时期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符荣同志称赞说：你们在基层的出色表现

和可喜的工作成就，比较集中的反映了钢院培养人才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全面发展”和“两个结合”。这就是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上体现“三坚实”（坚实的理想信念、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以及结实的体魄）。在进行科学世界观和劳动观教育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符荣同志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和“专心致志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同时提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钢院是有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的。大概可以这么说，学生在校进行有系统的基础理论学习之后，可以有一段时间有计划地开展厂（矿）校相结合的教育。师生们到有关的厂矿企业去，拜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为师，跟班劳动，开展现场教学或者“真刀真枪”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同时，有目的地进行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劳动创造世界、劳动造就人才、劳动保障幸福）和劳动习惯，牢固地树立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的教育形式，可以使有关的厂、校人员有更多的互助，更深入的交流和取长补短，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促进教学改革，又可以促进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实践证明，这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有效方式。实践的教训是要建立稳定的教学秩序。

3. 在包钢赞扬毕业生的崇高理想与志向

1981年11月11日在包头毕业生座谈会上的发言者，多是在包头冶金或军工企业工作20年以上的科技或生产岗位的骨干。他



院领导和四名志愿去青海工作的毕业生合影。

们的发言从头到尾，洋溢着爱国、爱边疆的热情。符荣同志赞扬说，你们是在高呼“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声中，来到包头，扎根边疆，为祖国的冶金工业、国防工业服务，你们用实际行动最生动地诠释了党的教育方针和人才培养。你们具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志向，时刻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用智慧和力量，用汗水和成就，最好地回应了党和人民以及广大教职工的殷切期盼。高校毕业生都应有“好儿女志在四方”、“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精神和意愿。学校的马列主义教育、形势、任务、政策教育、劳动与卫国教育是我们这个时代造就有用人才和英模人物的必由之路。

4. 呼市归来，畅谈边疆繁荣稳定和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性

1981年11月12日在呼和浩特召开了一次以蒙族毕业生或结

业生为主的座谈会。符荣在调查组总结会上说，这次呼市座谈会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边疆的繁荣稳定最坚实的基础是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内蒙的冶金、煤炭、稀工、军工企业和畜牧业的蒸蒸日上，确保了经济的全面繁荣和社会的持久稳定。这其中主要的因素是科技和生产工艺水平的提高、高素质人才和劳动力比例的增加……；二是在全局观点和前瞻性观点指导下有计划地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民族干部，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水平，树立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理念，是全面建设边疆的有力保障。符荣说，50年代初在吉林工专蒙族班培养的干部，现在已成为内蒙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蒙汉团结的模范。

符荣同志已于2008年3月22日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在改革开放浪潮中，从一个党务工作者的角度，概述了对党的教育方针的理解和担当，同时对北京钢院——北科大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作了一个阶段性的小结，有经验、亦有教训，值得后来者回忆、鉴别和学习。

撰稿人：樊源兴 原北科大党委副书记

后任中国冶金报社长、党委书记

2020.4.4

风雨兼程五十年

——记符荣同志在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原名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符荣同志1958年调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作，1978年任学院党委副书记，1983年任党委书记直至1992年。符荣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三年了，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善于听取专家学者和干部群众的意见；他坚守信念光明磊落，逆境顺境都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我们敬重他，怀念他，并以此文回顾纪念他在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工作的五十个春秋。

青春年华奔延安

符荣（原名符雄光）1926年12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汉溪乡。父母均小学文化程度，务农为生。其家乡曾有工农红军活动，符荣父亲参与其中，后遭军阀反动派杀害，符荣时年七岁。此后，依靠亲属帮助和母亲做小生意艰难地支撑起这个三口之家，并供他和弟弟读书。

1941年，他小学毕业，先后在四川达县师资训练班和达县师范学校就读，于1945年1月毕业。这时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形势已经很明朗，八年抗战使我国经济遭到巨大损失和破坏，

人民生活艰难困苦。符荣的家乡处于川东北地区，虽未被日寇侵占，但其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符荣师范毕业后，继续升学无门，想找个小学校员的差事也无望，失学、失业的痛苦让他寝食难安。这时居住在同乡镇的和他家有远亲关系的苏姓长辈找到了他，要他同自己的儿子一起去投靠在陕甘宁边区当八路军的王维舟，在那里或读书或做事，总会有个出路。

王维舟（1887—1970）四川省宣汉县青溪乡人，早年投入四川省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符荣有亲戚关系。苏姓长辈的建议让符荣动了心，但他担心母亲阻拦，就谎称去重庆找同学，得到同意后，于1945年2月同这位长辈的儿子一起上路，途中又碰到愿意同往的张姓同学，于是三人结伴同行。川东陕南地处大巴山区，交通极为不便，他们又没有多少钱，只能步行出川入陕。一路上，他们以去西安上学为名，应付沿途军警的盘查。当时虽处于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战时期，但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国民党仍设置封锁线，军警特务不时巡查盘问，如被抓住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趁黑夜穿过封锁线，到达驻守在甘肃庆阳地区的385旅驻地，王维舟时任该旅旅长。在欢迎他们到来的时候，王维舟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三个年轻人应该如何选择个人的人生道路，并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这是符荣走上革命道路受到的启蒙教育，既深刻又难忘。经王维舟介绍，5月他们进入了延安大学，符荣被分配在教育系学习，由此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时他刚过十八周岁。

延安大学的学员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这里既有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氛围，又有艰苦奋斗团结紧张的学习生活。符荣很适应新的战斗生活，互帮互学的同学关系使他很快融入在这个革命集体中。在这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和毛

泽东思想，特别是学习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使他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坚定了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决心，并提出加入党组织的申请。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的斗争进入到新阶段。1945年11月，根据中央关于发展东北的指示，符荣等一批学员被调入延安干部大队开赴东北。他们到达张家口地区后，由于北进道路受阻，于是在1946年2月—5月，转入华北联合大学政法系学习。党组织根据符荣同志一年来的表现，1946年5月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并于半年后提前转为正式党员。

1946年7月，符荣所在的干部大队到达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他被分配到西满分局土改工作团。在半年的土改工作中，他受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与考验，懂得土地改革和农民翻身解放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紧张的土改告一段落后，1946年11月至翌年7月，他担任西满军分区满洲里办事处招待所所长。这个对外称招待所的部门却担负着特殊任务，它是新中国成立前，中苏两党人员和物资来往的重要中转站。

1947年7月开始，他转入教育部门工作，先后在哈尔滨东北财经干部学校、吉林工业专门学校担任助理员、政治班副主任等职，主要负责政治思想工作。他在回顾这段工作时说：那时自己刚20出头，参加革命工作才二三年，理论水平不高，许多学员年龄资历都高于自己，一边学一边干，在教育学员的同时自己也受到教育得到提高。

1949年8月调他到沈阳东北工学院（今东北大学）工作，先后担任学生指导科科长、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和团委书记，后调入

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师、秘书。这时期的工作，提高了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并对高等学校政治思想工作有所了解。

1953年7月他调入北京，在中央重工业部教育司任干部科科长、党支部书记。1954年他经历了全国范围内的干部政审运动，在1956年干部评级时被评为行政14级。1958年3月符荣同志调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从此开启了半个世纪的为发展我国钢铁事业的教育生涯。

三十而立来钢院

符荣同志1958年调入钢院后，先后担任系和院机关党总支书记、教务处副处长、科研部主任等职。他积极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热情支持并投入学院开展的“一参三改三结合”、“现场教学”“真刀真枪结业”、“少而精”等教育教学改革。在全国大学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热潮中，根据冶金工业部指示，1964年5月学院党委成立政治部，党委副书记刘少华、马纪民先后兼任政治部主任，符荣同志任副主任并主持常务工作。这一阶段，在全院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中、在推动开展争当“三好学生”“五好职工”的活动中、在建立系（部处）政治工作机构配备政治工作干部等工作中，符荣协助主任积极落实党委的工作部署，取得较好成绩。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公开发表，首都高等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并向全国蔓延。钢院是北京高校的重灾区之一。运动初期，冶金部派工作队进驻学院领导运动。不久，工作队宣布撤销党委书记兼院长高芸生党内外一切职务，符荣、王慕林（时任市委常委、总务长）停职反省。

几天后，高芸生含冤自刎辞世。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队的撤离，许多学有专长的专家教授和中层党政干部，遭受批斗、殴打、抄家、关押和劳动改造。1967年2月，院内一派组织夺取学院党、政、财、文大权，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由大辩论演变成大规模武斗。符荣由于不赞成“全盘否定十七年来高等教育的成绩”，不同意“打倒高芸生”，被扣上“黑帮”、“走资派”、“钢院最大保皇派”的帽子，受到残酷批斗和殴打，隔离审查达两年之久，1973年被下放到锅炉房劳动，并以所谓的“历史问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当时学院党委对揭批“四人帮”、落实中央拨乱反正的政策不得力，1978年5月，冶金部派出工作组进驻钢院，指导帮助党委开展工作，落实政策。符荣等一批干部和教授的冤假错案获得平反改正。1979年2月，冶金部党组任命叶志强副部长兼任钢铁学院党委书记，张文奇任院长，刘少华、符荣、崔鲁斌任副书记，王润、李辉东、魏寿昆、柯俊、朱觉、林宗彩任副院长。学院的各项工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迈入改革开放的新征程。

1980年，学院召开第五次党代会，在新一届党委班子中，叶志强任第一书记，刘少华任书记，符荣、崔鲁斌任副书记，党委常委11人，学院行政领导没有变化。当时叶志强副部长以冶金部工作为主，学院的党政工作主要由刘少华书记和张文奇院长主持。在他们的领导下，学院在整顿恢复教学秩序、调整增设新专业和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在落实知识分子和干部政策、配备各级领导班子方面，在对外开放开展与国外高校合作方面，在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领导和科研队伍建设方面，在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

工作方面，都做出了显著成绩，为学校的后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符荣担任党委副书记后，分管全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主管学生工作。这一时期，国内思想政治战线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在社会上包括党内，有极少数人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右的思潮和错误思想引发了高校一部分年轻学生思想上的混乱，甚至出现“罢课”、“游行”等极端做法，在选举基层人民代表时搞所谓的“竞选”活动。

高等学校出现的情况，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1980年12月又发表了《贯彻调整方针，加强安定团结》的讲话，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中央和北京市委也做出相应指示和部署。学院党委根据以上指示精神，结合学院的实际，开展了一系列有成效的工作。符荣同志是这些工作的具体领导者和执行者。1979年5月，由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意见》经党委讨论后下发。《意见》提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以“三好”为目标，以学习为中心，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要充分发挥政治理论课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党的领导，是搞好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保证。同年5月4日，符荣在全院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他在肯定学生精神面貌主流的同时也指出青年人的不足。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教育，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在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特别注意调动广大教师的力量，做到教书

又教人。党委文件和符荣讲话的精神，在后来实际工作中，不断补充和完善，随着形势变化又有新的发展，但其基本原则一直贯穿于我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中。

符荣同志在主管思想政治工作的四年中，主要开展和落实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整顿调整学院思想政治工作机构设置，充实队伍。明确学生和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分别由党委青年部和宣传部负责，院党委和各系党总支都有一名副书记主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各系一、二年级配备政治辅导员，高年级设班主任。并逐步建立从优秀毕业生中选拔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制度与办法。

二是，广泛开展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三育人”活动，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去。1981年11月—12月，学院分别召开教师与实验技术员、学生和机关后勤职工大会，刘少华、张文奇、符荣三位学院主要领导分别作题为《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树立良好校风而努力》、《把做好管理与服务工作同培养合格人才紧密结合起来》的主题报告，动员全院教职工结合本职工作，积极引导广大学生走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成长道路。在全院教职工积极参与下，涌现出以孙维约老师为代表的一批教书育人先进教师和先进班主任。

三是，为适应政治思想工作的新形势，在加强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同时，1981年9月，学院建立德育教研室并开设德育基础课。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学生思想实际，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形势任务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这门课程作为大学生必修课正式列入教学计划，从而使德育逐步走上专业化和制度化的轨道。1984年学院在全国高校中首

批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办该专业的第二学士学位班，为充实和提高政治工作干部的数量和质量创建了更广阔的平台。

四是，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教师党支部通过党员教师的实际行动，带动教师和实验室人员紧密结合教学任务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学生党支部要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同学积极投入学雷锋、“创三好”活动。学院先后有钢78班、机79-1班和尤文泉同学获得全国与北京市先进班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在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下，全院掀起了向先进学习的热潮。

几年来，学院党委每年都要围绕加强与改善政治思想工作召开党委扩大会或专门会议，研究和落实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主要有：

1980年3月，专题研究学生政治思想工作，要求各级组织切实加强领导，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排除“左”“右”干扰，在工作中做出新的成绩。

1981年2月寒假期间，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符荣同志在会上作《把我院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主题报告。

1981年9月，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符荣作《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和改善我院学生政治工作》的报告。

1982年7月，党委召开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介绍教研室党支部做好工作的经验并对今后工作提出要求和具体部署。

1983年7月，符荣在全院学生大会上作《学雷锋，做八十年代优秀大学生》的报告。

总之，符荣同志在分管全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几年中，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下级和广大师生的意见与建议，在党委

统一领导下，为学校的发展稳定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提供了坚实的政治思想保证。



年过半百挑重担

1983年11月，冶金部林华副部长在我院科以上干部会上宣读中央关于学院领导的任免批复：符荣任党委书记，王润任院长，崔鲁斌、樊源兴任党委副书记；李静波、戚以新、杨静云任副院长；张文奇、柯俊任顾问；韩文植为纪委书记。符荣同志在任职大会上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指导思想，牢固树立起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培养人才服务，各级领导、教师、干部和职工都

要为学生健康成长服务。我们办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他还特别强调指出，我们要按照中央要求，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党的建设，把整党工作做好。

这一届班子上任时，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开始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时期。1982年9月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又相继发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央的这些决定，为高等学校改革与发展指出明确的方向。以符荣、王润为党政一把手的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和依靠全校教职员工和广大学生，继往开来，不断进取，学校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1990年10月6日，在学校中层干部会上，冶金部领导宣布了学校新一届领导班子：党委书记仍由符荣同志担任，校长李静波，党委副书记祖天启，副校长顾正秋、杨天钧、钟廷珍、陆国市、高颂烈。徐大铨副部长对上届领导班子和学校的工作都给予充分肯定：1983年10月组成的领导班子，政治坚定，团结协作，为科大稳定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国家教委、北京市委和冶金部多次表扬。科大一直重视党的建设，队伍建设，一直重视加强基层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建立了一支专兼结合的政工队伍，在1989年以前历次学潮中，保持了学校的稳定。在89年的风波中，不分昼夜，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做了大量工作，为稳定起了很大作用。学校的教学、科研、后勤等工作均取得很大成绩。在全国高校中首批建立研究生院和博士后流动站，为冶金战线和其它部门输送了大量人才。科大有一支水平较高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教师队伍，近年来获得部以上的科研成果奖200多项，办学条件有所改

善，体育工作成绩显著。

符荣同志作为学校主要领导，在近十年任职期间，为学校发展与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在工作中体现出的能力、品格与作风为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宝贵的经验。

一、把握正确方向，积极稳妥地推进学校改革发展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工作“三个面向”的指示加快了高等学校改革的步伐。1984年初，我院新班子上任不久就提出：对改革要有紧迫感、责任感。常委会多次开会，学习上级领导指示和兄弟院校经验，讨论我院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与目标。4月，符荣同志在一次以老教师为主的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我校的一切改革都要有利于培养人才和全心全意为学生健康成长服务，有利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提高，有利于提高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有利于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同时，要设法增加收入，改善知识分子、全体教职员工、学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只有改革才能开创我院的新局面。同时指出：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会有各种风言风语，还会得罪一些人，会遇到各种阻力，我们要发扬创新精神、探索精神和开拓精神，提倡科学态度，排除障碍，把改革长期坚持下去。在改革中，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学院改革的长期目标是要把我院办成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结合，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多科型全国重点大学，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成为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成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阵地。近期目标是在今明两年内，以管理改革为重点，以端走“大锅饭”克服平均主义为突破口，完成定编，建立教师工作规范和职工岗位责任制，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和奖金制度，初步

实现人才流动。根据条件和可能，并经领导批准，从试点入手实行岗位津贴制度以及浮动工资制度。在开展管理改革同时，要根据“三个面向”的方针，抓紧业务改革，包括教学改革、科研改革，着重研究专业调整和改造、重点学科建设和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和财务改革要做到更好地为教学、科研与培养人才服务。



1984年5月，在多方听取意见和讨论修改后，院党委常委会通过了《北京钢铁学院改革工作纲要》，明确学院发展的指导思想 and 目标，全面系统提出各项改革的任务、目标、措施和步骤。同月，符荣同志签发了《关于加快我院改革的请示报告》，上报冶金部党组，请求增加对学校建设投资，加大学院财务和人事等工作的自主权。

符荣同志较早提出改革要从试点开始，以点带面逐步推开的思路。1983年底，党委率先宣布采矿系的新领导班子，并确定在采矿系进行改革试点。符荣参加该系的改革动员大会并讲话，鼓励和支持他们的改革举措。系主任任天贵同志在动员大会上满怀激情地说：“振兴采矿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五十岁上下的教师，在采矿系工作了二三十年，我们的骨头恐怕也要埋在这里。特别是共产党员，不把采矿系变个样子，我们都对不起采矿系的下一代……”。他对全系在业务、体制、管理三个方面的改革目标、措施作了说明和布置。党委指定一位副书记具体联系采矿系，了解改革的工作进程。符荣多次听取汇报并带领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采矿系现场办公，帮助解决遇到的问题 and 困难。在进行定编定岗明确责任和考核奖惩制度后，改革逐渐深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调动了全系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学生学习成绩也有较大提高。在全院中层干部会上，采矿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分别介绍了推进改革和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做法与经验，对全院系一级的改革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

在两年的时间里，全院完成了定编，制定出教师、干部、职工等不同岗位的责任制与考核办法，出台扩大系（所）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制定学院“七五”发展规划。总务后勤部门和校办工厂先后实行承包和公司化管理。本科教育提出培养学生要“基础厚一些，知识面宽一些，适应性强一些”的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做到“基础理论不断线，实验技能不断线，外语学习不断线”，并开始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学分制，开展了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体制的改革。科研方面，在下放管理权限后，各系研究所、教研室和广大教师科学研究积极性大大提高，科研项目和经费不断增加。1983年科研项目466项，科研经费到款

652.36 万元；到 1992 年，这两个数字增加为 895 项和 1441.37 万元，科技总经费达 2269.6 万元。



党委书记符荣（右四）给获教学优秀奖的先进集体颁发奖状

1984年至1987年间，学院先后成立社科系、地质系、计算机系、化学系、表面科学与腐蚀系、材料物理系。1988年校庆，经国家教委和冶金工业部批准，学校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这标志着学校已经从单科型普通工业院校，初步发展成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经、法多学科综合性大学。

回顾学院改革历程和“七五”规划执行情况，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符荣同志在1991年学校第二届教代会上也作了分析和总结。

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干部和职工的积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推翻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符荣长期在教育部门工作，经历了“文革”之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办学中的重要地位。1984年他在一个会上说，我们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担负着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建设人才的光荣任务，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敬。但是在十年内乱中，由于受到“四人帮”摧残破坏，教师应有的权利横遭践踏，身心备受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1978年，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同时也要看到，无论在思想认识上、在社会舆论上，还是在各项政治、经济和组织措施上，还远远没有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们要继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提高教师地位、形成尊师的良好风气，为尊重知识、尊重和关心知识分子继续努力，使他们更好地为祖国“四化”发挥作用。符荣上述讲话所表达的思想在工作中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在1983年11月宣布的学院领导班子中，大多数都有大学或研究生文化程度。符荣参加革命工作早，年龄也最大，但他丝毫没有老革命、老资格的架子，而是尊重并重视发挥其他同志的作用。1984年常委会在讨论学校改革时，他诚恳地说：院里改革怎么搞？教学科研我是外行，请王润、静波多考虑，我可以在管理改革上多做些工作。对张文奇、柯俊两位顾问，更加尊重虚心请

教，学校专业设置调整、课程体系改革、研究室(所)设立、重大科研项目和重要实验设备采购等方面，符荣都自己或请有关校领导去听取他们意见。张文奇不再担任院长后，在1986年的第六次党代会上仍被选为党委委员、常委，发挥他在学校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在学校改革起步不久，符荣、王润等多位校领导专门请以直言不讳著称的肖纪美教授进言。肖先生就“为何改”、“教学何以改”、“科研何以改”等问题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这些意见在以后学校的改革中大都得到采纳。



1979年恢复教师职称评定工作。由于这项工作前后停顿长达十六、七年，学院积压的待评人员与上级下达的职称指标差距较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矛盾都比较突出，工作难度比较大。院党委和行政要求各系和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调查研究，妥善处理

好全局、局部与个人的关系，建立从申请到评审的工作程序，用制度保证相对的公平、合理与公正，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的干预与影响。在具体评定过程中，还遇到如何处理好“文革”前的历史问题和“文革”后的“派性”问题。对此，符荣同志说：职称评定主要看现在，看表现，看专长。对“文革”中的派别，对“十七年”的估计、对有关干部的评价，是拨乱反正问题，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评定职称要重在表现和业务水平，不管背景、出身、年龄，一视同仁。我校职称评定工作没有出现大的矛盾与波动，能够平稳公平进行，这是符荣、王润、李静波等领导班子成员正确掌握政策的结果。

符荣同志平易近人，关心支持基层第一线教师的工作，对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更是重视和爱护。改革开放初期，曾有兄弟院校的党委书记商调我校的一位中年教师去其所在学校担任领导。符荣得知后，明确予以谢绝。他对我院的同志说：这位老师教学科研工作很踏实，他的特点是只做不说，或者是多做少说，我们学校更需要这样的人，也更能发挥他的才能。事实证明符荣同志是有独到眼光的，这位教师在后来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院士。由青年教师带领并以青年教师为主的自动化系机器人研究项目，在起步阶段科研经费十分困难，符荣得知后与有关院领导同财务处协调，给予了很大支持。通过团队的钻研与拼搏，1991年出色完成了该项目的技术攻关任务并获得表彰和奖励。科学技术史现在是我校的一级学科，它是由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很不起眼的冶金史研究室发展起来的，当时曾为出版一本国际会议专辑而遇到经费困难，符荣得知后，认为冶金史研究室规模虽小，但它的研究内容具有学校特色，在他的支持关心下经费问题得以解决。

符荣同志不仅关心学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教师遇到突发事件时也竭尽全力给予帮助。那是1984年3月14日，一位中年教师傍晚突发急病生命垂危，家属、邻居、同事和校医院的大夫、车库司机都参与了抢救工作。那时一般教师家中没有电话，符荣的家便成了抢救病人的调度室，各种信息不断从这里传进传出。他对参与抢救的同志说：“我今晚不睡，你们有什么事马上打电话给我”。经过牵动人心的12个小时，这位教师得到成功救治。

“文革”之后，经过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广大教师深受祖国“四化”前景的鼓舞，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许多老教师追求进步，加入党组织的愿望强烈而迫切。党委常委会对此专门讨论研究，要求各系党总支要积极做好培养和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工作。符荣主动与老教师谈心，询问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听取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建议，谈对党的认识。在符荣和党委有关同志的共同关心下，有多名著名教授，如1984年，从青年时期就追随党的八十三岁高龄外语系乔丕成教授，1985年，柯俊、林宗彩、肖纪美、童光煦、陈华序教授等都光荣加入了党组织。符荣亲自参加金属物理教研室党支部讨论肖纪美教授入党的大会，对肖先生入党表示热烈祝贺。林宗彩教授入党还有一段小插曲，林先生是民盟成员，在民盟内担任一定领导职务，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为做好发展工作，党委派组织部和冶金系党总支干部向民盟中央报告，并将反馈意见与林先生沟通，在林先生表达了对加入党组织的坚定态度后，经民盟同意，才履行了相应的入党手续。

符荣同志深知办好一所大学，不仅要有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有专业知识的优秀教师队伍，还要有素质良好的行政与政工人员队伍和工人队伍。以他的经历，对干部队伍熟悉自不待言，

“文革”中他曾在锅炉房劳动五年，对后勤工人的状况也比较了解。在讨论学校改革问题的中层干部会上，他强调：学校是一个整体，有教学、科研、管理机关和工人，科研中又分为厂协和国家项目，教学中有专业课和基础课，学校一半以上的教学任务是由基础课教师承担的，学校创收分配对调动积极性影响很大，要有全局观点，要统筹考虑，要把分配政策制订好。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要“一切向钱看”。党员要带头，要提高思想境界，要努力做到“个人名利淡如水，革命事业重如山”。学校在制定分配政策时，坚持以按劳分配为总原则，兼顾学校教职工的方方面面，努力做到了公平合理。



冶金部长戚元靖，副部长林华来校同部分学生代表座谈

三、贯彻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坚持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目标
1978年，在符荣同志担任党委副书记并主管学生工作后，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在指导思想、教育重点、工作原则和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规范与制度。1983年学院新领导班子上任后，由一位副院长（党委常委）主管学生工作。这一时期，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并注重工作中的总结、研讨和理论提升，不断向科学化、专业化深入。

1985年，在符荣同志关心支持下，由中宣部教育局、国家教委政教司直接指导、编辑部设在我院的《思想教育研究》杂志创刊，并于1987年向全国正式发行，它为全国高校研究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搭建了平台，也促进了我校学生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保持在首都高校中的前列地位。

符荣担任党委书记后，一如既往地关心学生成长与进步，关注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随着学校研究生数量的不断增加，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亟待加强。1984年，党委制订了《关于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规定研究生政治思想工作由一名党委副书记和一名副院长负责，由党委宣传部主管，组织部、青年部（后学生工作部）及团委、研究生处和各系等部门积极配合。各系有一名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负责本系研究生工作。学校同时还制定了《研究生班主任（级主任）职责》和《研究生兼职辅导员职责》，初步形成较完整的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系统。鉴于导师在培养研究生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学校制定《研究生指导教师（或指导小组）职责草案（试行）》并召开了全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大会。当时全院研究生导师188名，其中党员87名，要求入党积极分子44名。符荣在导师大会上要求导师要全面关心研究生的成长，做到“教书育人”。他语重心长地对党员教师说：你们既是专家，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对研究生业务

上应该严格要求，政治上、生活上也必须关心培养，教育研究生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要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做出应有贡献。

符荣十分关心在学生中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在1985年召开的学院组织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他要求各党总支要提高认识，抓好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发展党员工作，落实发展计划和培养教育措施。根据市委要求和我院具体情况，提出在学生中，1986年要达到低年级班有党员，高年级班有党小组，年级有党支部的目标。组织工作会议后，各系学生中的党课学习小组数量大增，教育内容和方式更加生动深入。许多中老年党员教师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向年轻学子讲述他们几十年来追求进步，不断坚定政治信念的感人经历。符荣也深入到学生中，89风波之后，他参加热能工程系党课学习小组活动，向学生介绍肖纪美教授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热爱祖国，从一个科技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先锋战士的事迹，希望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坚决跟党走，做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他还由东欧剧变谈到安定团结政治局面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勉励学生珍惜大学学习机会，为祖国“四化”贡献青春。

为使党课教育更加系统科学，有效地提高学生党员和争取入党积极分子理论水平与政治思想素质，1987年党委决定成立学生业余党校，校长由党委副书记樊源兴兼任，符荣出席党校第一期学员的开学典礼并讲话，在简要介绍《共产党宣言》内容后，他希望学员们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逐步树立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1990年，符荣出席第六期业余党校开学典礼，高度评价广大学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的政治热情，赞扬同学们在经历政治风波后通过学习与反思，展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勉励同学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确立革命的人生观，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符荣一贯重视教职工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在北京地区的高校中，较早倡导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简称“三育人”或全员育人）。党委号召教职工立足本职岗位，通过做好自己担负的工作，潜移默化把育人融入其中。1986年学院召开“三育人”积极分子经验交流和表彰大会，符荣出席并讲话。同年，首届教职工代表大会着重讨论加强学风、校风建设和教书育人工作，制定通过了《教师“教书育人”的基本要求》，并进一步明确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服务，培养学生不但是教育部门和教师的任务，也是学校管理部门、服务部门和全体职工的任务。



符荣（右一）参加群众体育活动

符荣很关心学生的学业成长，有关教学改革等重大举措都经过党委常委会讨论后施行。学校坚持通过期中教学检查、教学改革与教学经验交流，严格学生教学管理等措施，使学校教风、学风、教学秩序始终处于良好状态。他参加优秀“三好学生”座谈听取同学的发言，称赞他们有理想、肯努力并取得好成绩，给全院同学带了好头，希望他们继续起好带头作用，使自己成为祖国“四化”建设的优秀人才。

学校历任领导都非常关心重视学校体育工作，认真贯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将其作为培养学生成才的一件大事来抓。建校以来，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并形成传统，田径等竞技体育项目在北京市乃至全国都有很高声誉且长盛不衰，全校师生员工皆以此为傲。

在回顾这一时期学生工作，必须看到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学校为保持安定团结所做出的努力和1989年政治风波对学校的波及与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过程中，曾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存在着对经济建设和政治思想教育“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符荣同志在学院领导班子生活会上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不要思想政治工作一定会出乱子的。那几年，在北京高校中，出现了因教学、生活和校园治安问题引发的张贴大字报、罢餐、罢课，甚至在校内或上街游行的现象。学校党委对此保持警觉和重视。1985年11月底，符荣、王润等校领导和团委、教务处、总务处、院办负责人，主动到学生中去听取意见和建议。针对学生提出的有关助学金、伙食、宿舍灯光、晚自习教室太少等问题，学院制定出台了《关于改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改善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加强学生工作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设校领导接待日、

校学生会主席和研究生会主席参与校务会议等内容。那时，学校十字路口也曾出现过大字报，党委除及时召开常委会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外，符荣同志建议召开一次学生党员会，讲明学校办学方面的实际困难，希望大家谅解，要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通情达理的。要求各系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要动员教师和政工干部，按年级、按班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后勤服务工作要积极改进，干部要切实负起责任，把食堂伙食问题、打开水问题等当成重要的事情去抓。这几年，尽管一些兄弟院校“小风波”不断，由于我校党委在维护校园稳定工作上，指导思想明确，具体措施有力，学校教学和工作秩序没有受到干扰，一直处于正常平稳状态，收到较好效果。

在1989年春夏发生的政治风波中，首都高校出现了学生罢课、上街游行事件，我校大部分学生和少数青年教职工也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其间，学校党委和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教师与干部，对学生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和劝阻工作，也为保护学生安全健康采取了许多措施。那时，学校党委常委天天开会，了解分析学生动态和情况，及时传达中央、市委和冶金部的指示精神，动员全校教职工坚守岗位，维护校园安全，保护国家财产，把损失减到最小。进入6月中旬以后，党委组织全校党员、干部、教职工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发出了《给全体共产党员的几点要求》，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在言行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模范地遵守北京市有关通告，做好家属子女的工作；教职工党员要坚守工作岗位，尽职尽责，继续做好学生工作。在党委统一部署领导下，在全体学生中也开展了学习与反思教育。符荣同志在学生学习动员大会上作报告，着重讲了大学生应该如何通过这次政治风波接受教育，并对全体同学提出殷切希望。通过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

学校较快恢复正常教学与工作秩序。广大师生员工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和对这场政治风波的性质、危害都有了新的认识，也为今后如何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思考与契机。



符荣（前排左一）陪同校友罗干同志（前排右一）
（时任中共中央常委 政法委书记）参观

四、始终把抓好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领导工作的第一要务

符荣同志担任党委书记以后，改革发展任务迫切，学校各项工作都需要他研究、协调和处理，但在他心目中第一要务是抓党建、抓思想政治工作。他认为这项工作抓好了，就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1983年10月，在宣布新班子的干部会上，他对班子建设提出要求：新班子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

思想和政策水平；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一切重大问题要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集体讨论决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充分发挥行政系统的作用；在工作作风上要反对官僚主义，面向实际，面向基层，扎扎实实地逐个解决问题；要发扬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互相支持共同提高，不谋私利，埋头苦干，全心全意为办好钢院而努力工作。这些要求，在符荣担任书记近十年中，基本上做到了。他先后同王润、李静波两位校长共事多年，他们在工作上取长补短，相互支持，一切从学校的发展大局出发，配合默契。同他一起工作的党政副职，先后有十多人，团结配合都很好。工作上难免有不同意见，但从未发生过权力或利益纠葛，更没有个人间的恩怨与成见。在查阅八十年代领导班子生活会记录时发现，工作上的不同看法都能在会上坦诚交换或作自我批评。符荣作为班子的领头人、班长，在班子建设和工作中，展现出善于团结同志和有凝聚力的长者风范，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敬佩。在中层领导班子调整实现新老交替的工作中，他提出：要按照中央“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选拔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人；选拔作风正派、秉公办事、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的人；选拔能吃大苦耐大劳、勇于自我牺牲、敢于想问题、讲问题，一切为办好钢院而努力工作的人。符荣同常委会一班人按照上述要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通过座谈会、个别谈话、民主测评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反复研究讨论，在1984年初基本完成中层领导班子调整任务。在116名中层干部中，正职33人，副职83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91.3%，平均年龄普遍下降，新提中层干部多在40岁左右，最小26岁。此后，逐步建立中层干部任期考核选拔等工作程序，并在系一级开始推行“能上能下”机制。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常委会不再讨论科级干部任免。

加强对学术带头人、骨干青年教师与干部的培养，党委党校分期分批开展轮训。在日常干部管理方面，符荣对干部既爱护又严格要求，没有因为一时一事一棒子打死，特别是对年轻干部发生的偶尔过失，在批评教育的基础上，继续观察使用。但对屡教屡犯，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尽管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较好业绩，仍然给予降职或免职调离。对长期不团结影响工作的个别班子，也采取坚决措施予以调整。总之，在干部选拔使用上较好地坚持了德才兼备，公平公正的原则。



符荣（左三）主持会议

在符荣担任书记期间，进行过两次党员集中教育，第一次是1984年开展的“整党”，第二次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开展的党员重新登记。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中共

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全党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在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我院整党准备工作从1984年初开始,党委常委会多次开会学习研究,为搞好整党进行组织、思想和工作上的准备。1984年11月8日,符荣在全院党员大会上,作整党动员报告。他说:按照中央要求,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队伍。我们要紧紧抓住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核心问题,向全体党员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性,把我院党的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学院工作的坚强核心。他要求党员和党的干部要正确处理好整党与日常工作的关系,处理好整党与改革的关系,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组织既要认真贯彻整党工作计划,又要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创造性地搞好本单位工作。动员大会后,根据上级要求,整党工作按照系统学习教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对照检查与党员登记、组织处理四个阶段进行。

符荣对这次整党工作非常重视,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每个阶段的工作目标和要求在常委会讨论后,由他向全体党员进行动员,向各党总支布置工作安排和检查总结的会他几乎都参加并讲话。在研究如何抓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阶段的工作时,有同志提出:这个阶段要联系个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实际表现,难度大。符荣说:关键是领导带头。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全院党员动员大会上,他讲了“文革”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损失和灾难,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所在。他联系个人工作和思想实际,对“文革”前由于“左”的错误影响,把党委内部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当作是“两条路线”斗争;“文革”中又以党员干部要到群众中参加运动,参

加了一派群众组织的活动做过错事。符荣带头联系实际否定“文化大革命”和作自我批评的诚恳态度，在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起到带头作用，院系（部、处）两级主要负责同志都在各自工作范围的党员大会上作了发言，推动这一阶段整党活动深入开展，取得较好效果。在市委教育工作部召开的高校领导干部大会上，我校介绍了整党工作的具体做法和体会。1985年7月，在完成整党四个阶段的任务后，经市委验收合格，整党工作结束。

1986年1月，我院召开第六次党员代表大会，符荣同志在工作报告中对整党工作做了总结。他说：我校参加整党的正式党员1318人。我们本着高标准严要求的精神，坚持联系实际学习文件，坚持自上而下进行整党，坚持干部带头，启发自觉，开展谈心活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了较好效果。广大党员受到一次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绝大多数党员认真对照党章党纲，总结了入党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清除了“左”的思想影响，提高了同党中央在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进一步清除派性，增强党内团结，密切同群众的联系等方面，都获得了可喜的进展，促进了学校改革和各项工作的开展。总的看，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中央提出的整党任务，市委教育工作部在检查验收时，认为我院的整党是严肃认真的，给予了较好的评价。

党员重新登记是我校开展的第二次党员集中教育。这次教育是根据1989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的意见》开展的。《意见》指出，在平息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学校党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调查分析党员状况、建立组织机构、制订工作计划。按照党员标准教

育、申请登记和个人总结、党支部大会民主评议、上级审批和组织处理等几个阶段进行。这一工作从1990年5月开始到1991年1月结束，当时在校的1828名党员，有1793名办理了党员重新登记手续，其余35名或出国或补课或等待处理。符荣同志领导了这一工作全过程，从开始动员到最后总结。他深知，这次党员重新登记，不是着眼处理几个人，而是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素质，紧密结合89年的政治风波，着重解决“理想”、“信念”、“宗旨”、“纪律”等问题。在党员标准教育基础上，个人总结和党支部民主评议是能否取得实效的重要环节。他在给全体党员讲党课时，强调进行党员重新登记的意义，提出具体要求，明确个人总结中的重点是：对照党员标准，检查自己在反对动乱过程中的思想认识、实际表现和差距。个人总结要层层把关。党委审阅了70份中层正职的个人总结，党委领导找谈话12人，其中符荣谈了5人，并提出批评意见。学校主要领导符荣、王润在全校中层干部会上进行个人总结，接受评议。他们的行动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其他领导和中层正职也都在一般党员总结之前，率先在党员大会上作个人总结。这些做法，带动广大党员认真剖析自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这次党员集中教育没有走过场，取得较好效果，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政治素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政治核心作用。

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工作，也是党的工作任务的落脚点。符荣重视基层党支部工作，他要求组织部和各党总支在党支部书记的选拔配备上重视其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这样才能很好的发挥对行政工作的保证监督作用。按照这个要求，机关部、处党支部书记一般由中层行政副职选举担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则由思想政策水

平和业务能力较强的党员教师选举担任。在党支部带领下，要求党员在政治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在做好本职工作、做好团结协作、做好“三育人”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多年来，我院涌现出一批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冶金机械教研室党支部、数学第一教研室党支部、选矿教研室党支部和刘建平、吴杏芳等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1990年3月，学校党委作出《关于向冶金机械教研室党支部学习的决定》。《决定》指出：冶金机械教研室党支部是一个很好发挥了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的党支部，他们坚持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党员和全体同志，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培养合格人才放在首位。他们党政协调配合，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党支部和教研室形成了事业心、凝聚力和献身精神的光荣传统，在教学、科研、教书育人、思想政治工作、党支部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个教研室曾两次被评为冶金系统先进集体，1985年—1989年先后获得北京市文明集体、先进党支部、教书育人先进集体、劳动模范集体等光荣称号。符荣在全院表彰该党支部的大会上讲话时说：我校有186个党支部、2000多名党员，如果多数党员和支部能达到他们这个水平，学校的各项工作就会出现新的局面。各支部要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党委的决定，认真学习冶金机械党支部的经验，各党总支也要总结自己的典型。大家共同努力，把我院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抓好全院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委领导下的一项重要任务。符荣担任书记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是完善和改进组织系统，着力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本科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和各项措施相对比较规范顺畅，主要是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系统不断进行改善。1991年5月，党委决定成立研究生工作部，使

整个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得到完善健全。在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党委决定一位党委副书记主管，党委宣传部牵头制订学习计划、安排教育内容，各党总支、党支部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具体实施落实。1984年，党委明确指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重点是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热爱教学，教书育人，协作攻关。要把教学科研中的协作精神作为检验世界观改造的重要标志之一，把教书育人作为衡量教育观点和教学态度的重要尺度。这一基本做法在学校得到长期坚持并取得良好效果。

符荣同志重视群团组织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每届教代会主题都经党委讨论后确定，符荣参加大会并代表党委讲话。学校共青团组织的重要活动，符荣大都参与其中。倾听民主党派教师对学校工作的建议与意见也是他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这些渠道，符荣把党委同基层群众紧密联系起来，把上级的声音、党委的计划转达到学校基层的方方面面。

1990年初党委在认真总结经验和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过程中，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学校在德育教育上的好做法好传统，克服工作上的不足，争取更好成绩和更大进步。1991年2月，党委根据中央、市委和冶金部的有关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在认真总结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意见》。《意见》结合学校实际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促进了新形势下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健康发展。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学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为加强和改善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取得了较好成绩，1994年2月，学校被评为首批“北京市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等学校”，此时符荣同志已离开领

导岗位，时任党委书记李静波同志感慨地说：这个荣誉属于全校各级党组织、党员和全体师生员工，是前任领导刘少华、符荣等打下的良好基础和卓有成效工作的结果。



符荣（右三）和学校领导与香港校友合影

1992年在校建校四十周年时，学校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李静波校长在《继往开来，为开创学校发展新局面而努力奋斗》讲话中指出：四十年来，随着全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学校从一所单科工学院转变成具有18个系、25个专业、35个硕士学科、14个博士学科理、工、管、文相结合的多科性大学，实现了冶金部1983年为学校规划的发展目标；从以教育为中心转变为教育、科研两个中心；从一所基本上是培养本科生的学校转变成能够培养博士、硕士、本科生及成人教育等层次齐全的大学；从基本上

是封闭的学院转变成为与 10 个国家 21 所大学签订协议，与国际上广泛合作交流的开放大学；从单纯依赖冶金部拨款转变成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其中争取到的世界银行贷款使我校实验设备水平迈上了新台阶。到 1992 年，学校具有 6 个重点学科，2 个国家重点专业实验室，3 个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建校以来，我校在 503 项获奖科研成果中，有 68 项国家级奖，其中，国家发明奖 13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29 项，国家自然科学奖 2 项，全国科技大会奖 24 项。学校取得这一系列成绩，归根到底是因为学校有一支政治业务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老教师为我校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年教师成为学校的中坚力量，一批改革开放后成长的年轻教师脱颖而出，成为学校发展的希望。几十年来，老钢院重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体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得到传承和发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学校坚持加强党的建设和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使学校的改革、发展稳步向前迈进。我们在看到取得的这些成绩时，同样看到了包括符荣同志在内的历届校领导的奋斗和辛劳。

1992 年符荣已年满 65 周岁，他还在为学校工作忙碌着。在学校四十周年校庆前夕，他率校友会会长戚以新等 4 人，走访西北地区的酒泉钢铁厂、西宁钢厂、甘肃白银和金川有色公司、陇西西北铝合金厂和陕西有色与钢铁企业，看望校友，听取对办学的意见。

在隆重举行建校四十周年校庆大会之后的 5 月，冶金部领导来校宣布冶金部党组决定，由李静波校长兼任党委书记，杨天钧任常务副校长。随着符荣等老一辈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相继离开领导岗位，标志着学校领导的新老交替基本完成，新的领导班子担起重任，将带领和推动北京科技大学在新的历史时期

创造新的辉煌。

符荣同志虽然离开了领导岗位，但他一直关心学校的工作和发展，新上任的领导经常能从他那里听到建议和得到鼓励。他一如既往地广泛联络校友，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发展。

2008年3月21日，符荣同志因病逝世，享年81岁，走完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正如学校在《符荣同志生平》中叙述的那样：符荣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强的党性，在六十多年革命生涯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坚持求真务实、不图虚名，工作作风严谨细致、一丝不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干部群众。他心地善良，爱护青年，特别注重培养青年人才和青年干部，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符荣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高尚品德和对党、对祖国做出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并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稿件撰写至完成，学校原领导李静波、樊源兴、祖天启给予许多指导与帮助，并对稿件进行审阅，提出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衷心感谢。）

撰稿人：赵续生 原北科大党委副书记

段凤英 原北科大离退休干部处处长

2021年7月

回忆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符荣，因病在2008年离开了我们。弥留之际，老人家是有遗憾的。他带着没看到国家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对奋斗终生的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无限的厚爱，带着他对亲人、同事、朋友和学生的无比眷恋和不舍，离开了这片倾尽心血，无比热爱的土地。

转眼十三年过去了，这篇对爷爷老人家的回忆，是在我和父亲还有叔伯的资料整理中完成的，同时也根据爷爷的一些亲朋好友和学生的叙述，希望通过这种简短的方式，让大家能更多了解他的经历、为人和他在北京科技大学任职期间，对学校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也无比怀念、感恩爷爷和那一代人对中国革命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

少年时期

爷爷1926年12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的清溪乡。这里深居大巴山，风景秀丽，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红色革命圣地。爷爷的一生，很大程度上是受老家革命风气的影响，也受到身边亲人的熏陶。那时正是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和各路军阀混战的年代，军阀割据和战乱不断，使国家和民众都生活在千疮百孔的乱世中。对于一个大巴山的孩童来说，老家是闭塞和贫困的，因为这里实在是穷山荒岭。他目睹了穷苦百姓的艰苦生活和积贫积弱的国家。

影响最大的就是爷爷的母亲和亲人，都是为了穷苦人民的翻身而投入到革命运动中。爷爷的父亲为了掩护地下党的负责人而壮烈牺牲，因为这个原因也成为军阀和国民党的“眼中钉”红军家属，所以爷爷的母亲带着爷爷和二叔公东躲西藏。在工农红军从川北革命根据地转移开始长征时，爷爷的母亲毅然带着年幼的兄弟二人跟随部队艰难行进。在一次红军和敌人的战斗中，爷爷的母亲带着兄弟俩与大部队走散，只得流浪返回了家乡。爷爷的亲舅舅和一个姨妈都在长征中，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随着年龄增长，爷爷有了独立的思想意识。青少年时期爷爷就萌生了一个朦胧的信念，要为天下穷苦人能吃饱饭、孩童能读上书的理想社会而奋斗。从达州师范毕业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胜利的前夕，国民党和四川军阀刘湘又开始对过去老区的红军家属进行迫害和屠杀。爷爷在长辈的引导下告别了家人，同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符荣，寓意革命光荣，踏上了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革命之路。

青年时期

爷爷前往延安的时候，同行的还有两个同学苏荣和张荣，他们三人同时给自己名字都改成带一个荣字，代表那个时代青年对革命的热忱。当时爷爷和两位同学是徒步去往延安，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非常不能理解和无法想象的，从老家宣汉到延安在如今的导航地图上也有900公里，在那个年代爷爷他们不仅风餐露宿，沿途还要警惕国民党警、特和官兵的审查，任何一点问题都可能带来危险。我找到一篇张荣爷爷在新浪新闻中心2005年讲到的这段往事的文章——《出川抗日 这一走改变我一生》。文

章写到：1943年，正处于抗战时期，他们三人日夜兼程，徒步走了3个月，终于出川到达陕西。在西风镇，国民党的碉堡遍地，当地百姓生活得小心翼翼的，“红军”二字半点不提。他们找到一个当地熟悉地形的人，给了引路费，那人才领着3人沿山丘间淌水的沟沟走，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到达了陕甘宁边区的庆阳，在385旅旅部见到了王维舟。王维舟是红三十三军创始人（抗日战争时任385旅旅长）。在老革命家王维舟的亲切鼓励和教导下，爷爷受到了极大鼓舞，明确了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在时间过去很久之后，他老人家回忆到当时的情景时依然激动不已。他描述说，当时王老双手叉腰，用自信而坚定的目光看着他们，充满激情的说，新中国就要到来，国家需要大批的专业人才。你们年轻，有文化，去搞教育，为党培养大批的教育人才，为国家培养大批的建设型人才。他们被送到延安大学教育系学习，开始了他一生热爱的教育事业。

在延安学习期间，爷爷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爷爷的成长离不开在延安的学习生活，这也是日后众人所说：他是共产党里面有文化的青年干部。

奔赴东北、心系钢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共中央决定进军东北，爷爷随即被派往东北工作。当时爷爷被派往满洲里的西满军区，主要负责对苏联人员与物资来往的相关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也是从延安来的延大校友郑拓彬（原外贸部部长）。郑部长说过知道爷爷家里有亲戚在部队担任重要职务，但爷爷为人非常低调，从不炫耀自己的家庭背景，而凭着自己的能力做出成绩，而且为

人善良、谦虚待人。

1948年爷爷调往由陈云（时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导的东北财经干部学校，培养未来东北所需要的财经人才。从东北财经干校到吉林工业专科学校，从东北工学院到北京钢铁学院，从重工业部到冶金工业部，爷爷一直都要求在教育部门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他为教育事业终身奋斗的目标。

1958-1992年，爷爷一直都在钢铁学院工作。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曾经想让爷爷去北京市政府工作，爷爷也是毅然放弃，坚守他热爱的教育事业。爷爷在对学校的工作花费了半生的心血，在爷爷任职期间，学校师生和所有工作人员团结一心，带来了钢院那个年代的辉煌，“钢老三”这个词就是最好的见证。

清正廉洁，不图私利

爷爷一生光明磊落，品德高尚。尽管家中有亲属身居高位，但爷爷从未想过利用自己的关系升官发财。反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在升职加薪之时，爷爷总是将机会留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记得“文革”后，一位爷爷的朋友来探望他，非常惊讶爷爷目前级别和所住的房屋。告诉伯伯和父亲，他的级别中就是有爷爷让的一级。称赞爷爷真是两袖清风。爷爷和奶奶，相识于东北，一见钟情。奶奶出身在一个国民党官僚家庭。奶奶的父亲曾毕业于黄浦军校，在抗战中因受伤而退役。在“文革”中，共同的理想使他们二人走到一起，即使在“文革”，爷爷遭受迫害的年代，他们依然相亲相爱，荣辱与共，不离不弃。父亲跟我说起“文革”中爷爷受了太多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被造反派挂大木牌，开批斗会、还有用弹弓拿石头砸爷爷，

父亲说起小时候爷爷鼻青脸肿和受伤的情景，感到非常痛心和难过，但爷爷始终相信自己没有做错，没有任何有愧于自己的信仰和对不起国家。

尊重人才 真诚待人 肝胆相照

爷爷一生敬重知识，尊重人才，深知人才和知识的重要性。因此，他总是虚心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对同志，对朋友都真心实意。不虚伪，讲实话，讲真话。无论是声名显赫的院士或大科学家，还是普通平凡的教师，默默无闻的后勤工作者，锅炉房的工人，木工厂的师傅，食堂的炊事员。他们中很多人都愿意与爷爷倾心交谈，表露心声，把爷爷当成真正的朋友。正是因为父亲的待人平等，乐于助人的态度，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他们从未把爷爷当成领导，爷爷也从未把他们当成下属。认真关心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声音，解决他们的困难，实际的帮助他们，做他们的贴心人，赢得了大批知识分子和工人们的爱戴。他们亲切地称他为老符头，这说明爷爷毫无官僚主义的架子。

爷爷对青年学生总是充满着关心和爱护，总讲学生工作无小事。在复出工作后，对青年学生工作高度重视。把关心、热爱学生作为他工作的重要任务。他总说，青年学生是未来。是祖国的栋梁。要允许他们犯错误，更要帮助他们认识改正错误，走上正确的道路。记得有一次，一位已毕业的学生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挫折，求助无援之下找到了爷爷。他不但耐心的听，还细致分析，一方面积极地给他鼓励，一方面帮他认识到问题，更积极帮他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他能够更积极的面对人生。正是这种真情和待人真诚，使得很多学生成为了他的朋友。不论从生活上还是

工作上，爷爷真正成为了他们所信赖的师长和朋友。

信守承诺 终身奋斗

十年“文革”，把爷爷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埋没。从保皇派到516分子，从旧市委的黑苗子到国民党，经受了太多太多的委屈。但爷爷完全没有放到心里，去计较个人得失。他始终乐观向上，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始终坚定自己的信念，从未放弃自己的承诺。记得恢复工作后，组织上曾有意调他回四川老家，担任一定的省级领导职务。在向他征求意见时，爷爷再三解释了自己的愿望，那就是他和老院长高芸生的约定，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和钢铁学院奋斗终身。他曾说自从他第一次放弃了到北京市政府工作后，就与高芸生院长惺惺相惜，共同将自己的一生交给钢铁学院。即使在父亲弥留之际，他依然想着他热爱的学校，依然想着那些支持他关心他同甘共苦的先生们、工友们、同事们。

十三年前的今天，3月21日，爷爷离开了我们，驾鹤西去。但是学校的老人们都没忘记他，无论我们在何处都能感受到爷爷的爱，感受到他那慈祥的笑容和睿智的目光。他对理想执着的追求，坚定的信念，对社会和国家，展现出真正共产党员的初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对家庭和亲人，爷爷留给我们后人更多的不是财富，而是他的精神传承，就像一座永久的丰碑，屹立在前方。

符荣之孙 符家豪



高诒善
GaoYiShan
(1914年—1968年)

高诒善先生热爱党，忠于党的教育事业。教学认真，勤奋敬业，学术广博。为学校早期物理化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作风正派，长者风范，对人谦和，爱生如子，深受师生的拥戴。

高诒善简历与生平

毕业清华 严谨治学 师者风范

高诒善，男，江苏江宁人，汉族，生于1914年4月，193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曾任重庆大学助教、重庆中央工业职业及专科学校讲师、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理化系副教授、东北大学（四川山台）化学系教授、四川乐山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教授及教务主任和四川化工学院（泸州）教授。1954年9月，调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在冶炼系的物理化学教学小组任教，后任教学小组主任。1954年12月学校再行确认高诒善正教授职称。1954年11月，高诒善先生代表教学小组在全校教学交流会上发言，介绍教学经验。1955年5月，学校成立教学法委员会，高诒善任基础课教学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委员会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冶原物化四个教学组。1956年，学校共设立五个系：冶金、工艺、机械、采矿和物理化学系，高诒善任物理化学系副主任。高先生在担任行政工作的同时，仍继续面对学生讲授物理化学课程。1958年至1959年，学校指派高诒善作为物化教授，到前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考查、进修、访问一年。

高诒善先生多次讲授物理化学、化学热力学和胶体化学等课程。著有物理化学讲义、化学热力学及胶体化学参考资料和醛酮类有机分析新实验等。

高诒善教授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要求进步，积极靠拢党组织，

多次书写入党申请和思想汇报，有一次思想检查多达 20 多页。后来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高诒善教授教学认真，勤奋敬业，学术广博，讲课自如，条理性逻辑性强，概念清楚，学生喜欢上他的课，师生关系融洽，讲授的课程一直受到学生好评。他也常给教研室老师们开专题讲座。有一次面向全院开讲“不可逆过程热力学”，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时这是新知识，物理概念、数学基础都更深一层更进一步，但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普遍感觉收获不小。

高诒善教授作风正派，长者风范，对人谦和，平易近人没有等级之分，对待实验人员和教师都热情招呼，一视同仁。有新来的同志，他会与之谈话，了解情况，这让刚毕业走向工作岗位的青年人，感到温暖和鼓励。有几位四川乐山的年青人，在高中时是他夫人方婷芝（乐山一中化学老师）教过的学生，方老师爱生如爱子，常让年青人到他们家玩耍。到了北京钢院，年青人又是高先生的学生，方老师也调到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书，师生关系甚为密切。

部分同事的回忆（王月整理）

深切怀念高诒善教授

高诒善教授热爱党，拥护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校党委的指示和工作布置，在多种场合都能积极表达自己意见。在物理化学系关于金属物理化学专业（后改名为冶金物理化学专业）的讨论中，他的基本思路是执行前苏联莫斯科钢院该专业的教学计划。而当时的系主任柯俊教授的意见是数学和物理课程应加强，系副主任高诒善教授意见是既属于物理化学专业就应加强化学方面的课程比重，以培养专业学生能力出发。他们各述己见，经过几次辩论、探讨、协调，最后制定出约 4000 学时，三年半学制的教学计划。这样高质量、高要求、多学时的计划安排，在“文革”中虽遭到批判，但实际上培养出来的基本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在此专业的建设中，教务长魏寿昆教授、系主任何俊教授和系副主任高诒善教授为培养专业人才，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教研组和系工作中认真负责。与人为善，不摆架子，与同事们和睦相处。在教研组的同志们无论是在他面前或背后，都尊称他为高先生。他在教学工作中，认真备课，讲解条理清晰，得到学生好评。他曾编写物理化学讲义、醛酮类的有机分析新实验及化学热力学等教学参考资料。他在苏联学习期间，根据苏联专家建议，编写了物理化学教学指导书，讲授过物理化学、胶体化学、化学热力学等课程，还指导过物理化学实验课。

物理化学是一门公认难学的课，特别是热力学部分，但高诒

善老师把它讲活了，不但概念清晰严谨，例证与推演翔实，而且每节课讲完，留下5至10分钟进行小结。有时他还让一位同学先小结一下，其他同学做补充，最后由他点评。有位同学回忆到：在“文革”中后期（1970至1973年），住在集体宿舍，晚上闲时甚多，当拿出大学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笔记复习时，惊喜地发现，一学期中高老师曾三次叫我起来小结，而且每晚我都在笔记本上专门作了回忆记录和老师的点评。正是由于这种在课堂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使不少学生喜欢上了这门不太好掌握的学科课程。

编者整理的部分同事和学生的回忆记录



何品三
HePinSan
(1917年—1986年)

何品三教授一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他光明磊落，性格开朗，平易近人，为人热情，团结同志，德高望重。他勤奋好学，具有较宽的知识面，不断学习国内外近代数学知识和先进教学经验，努力参加教学改革工作，为使教学工作进一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做了大量工作。他极其关心教学质量的提高，并为此努力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何品三简历与生平

何品三，原名何奎昌，曾用名何文宣、何万科，汉族，辽宁铁岭人。北京钢铁学院数学力学系教授，曾任数学教研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等数学研究会前任理事，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委员，冶金部教育司数学学科组副组长。

1939.8—1943.8 在四川省三台国立东北大学化学系读书，毕业。

1943.8—1945.5 分别在四川绵阳高中、三台国立十八中学、三台师范、沈阳东北临时大学、长春大学、沈阳机械学校及北京石景山钢铁学校等多地多校任教。

1958年9月调北京钢铁学院数学系任教。

何品三先生熟练用英文翻译相关专业书刊，对数学分析、微分方程有较深钻研。对代数系统、现代运用数学等都有相当的研究。何教授勤恳教学四十余年，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优良的教学成果，注重对数学教师的培养工作，桃李满天下。他善于研究教学规律，能结合最新国内外数学成果进行教学改革，著有多本书籍和论文发表于冶金部《高等数学研究》杂志上。

1986年4月出差武汉途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69岁。

——摘自档案资料

国内多家媒体发布何品三教授去世消息



何品三教授一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他痛恨“四人帮”组织，积极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在临终前不久还再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何品三教授一生勤奋好学，具有较宽的知识面，不断学习国内外近代数学知识和先进教学经验，努力参加教学改革工作，为使教学工作进一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做了大量工作。他极其关心教学质量的提高，并为此努力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何品三教授光明磊落，性格开朗，平易近人，为人热情，团结同志。作为一位有威望的老教师，他一贯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悉心指导，诲人不倦，经常给以热情的帮助。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对我院教学工作也是个很大的损失。我们要学习何品三同志的优秀品质继承何品三同志的遗愿努力工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摘自何品三教授悼词

忆念何品三教授

1960年我大学毕业后来钢院工作，被分配到数学教研室，当时的教研室主任就是何品三教授。这是一位和蔼可亲、乐观睿智的老先生。据说，他本专业并非数学，而是化学（毕业于东北大学化学系），由于对数学有特殊的兴趣，故选择数学教学作为终身职业。他教学经验十分丰富，教风严谨，语言生动风趣，不仅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而且也为青年教师们起到示范作用。当时的数学教研室在他和钱文侠、朱元泉两位副主任的领导下，承担着全钢院的高等数学、工程数学和先后两届应用数学专业全部课程的教学任务，虽任务十分繁重，但却一直享有较高的教学声誉，为以后形成代代相传的优良教学传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方面何教授功不可没。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有幸与何教授一起去北京钢厂搞教改。我们在电炉前与工人师傅们一道冒着高温挥汗炼钢。何老师当时已有55岁，但仍像小伙子一样举起大铁铲，往电炉里甩铁矿石。在工余时间，他还和我一起去马连道走访老工人，师傅们看到老教授亲自上门，十分感动，彼此交谈甚欢。

何老师虽然教学成就斐然，但他从不固步自封，还锐意改革。1984年我与他一起去南方调研大学数学教改。回校后经教研室批准成立了试点班，选用国外著名教材，进行数学分析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何老师以他扎实的外文基础，指导我阅读原版的英文教材，并帮我选择有特色的习题和考题。此次改评在当时的冶金

部所属院校内影响较大，受到冶金部教育司和同行们的肯定与好评。

何教授为人宽厚，作风民主，不搞宗派。1964年前后，组织上派他去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一年。他是一位爱国爱党的非党人士。

撰稿人：秦明达 原北京科技大学数理系教授

2020.11.13

悼何品三老师

何品三老师去世的噩耗传来，我们无不为之震惊、悲痛！打开何老师那封未发出的信，熟悉的字体呈现在眼前：“……考卷阅完，成绩尚可，少数考生成绩优秀。”就在您去世前还亲自主持了今年上半年自学考试高等数学的阅卷工作，您不顾年迈、多病，每晚前往阅卷点，同其他教师一起阅卷，电梯停了，自己从七层楼上走下去。您不仅承担着校内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令我们特别感动的是：您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的意义有充分的认识，您把它视为选育专门人才的新途径。您不顾考生程度、水平不等，兢兢业业地负责命题、主持阅卷。您热爱这个事业，为它倾注了多少心血！然而，仅仅一个星期之后，在您出差途中，心脏病突然发作，您竟离开我们而去！

何老师啊！我们深切地怀念您！回想与您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怎能叫人忘却！您是有四十多年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授，却一丝不苟，与其他教师一起从命就的八十多道题目中，精选出七、八道题来组成试卷，为了研究考生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做完题目，您亲自试做；您已是六十八岁高龄，仍克服困难，亲赴外地命题，为建立题库贡献了自己的经验和力量。

何老师，您没有离开我们！您那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朴实无华、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您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满腔热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七·五计划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工作。

何老师，您安息吧！我们将继续您关心、热爱，并为之辛勤耕耘的事业，开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新局面，为之辛勤耕耘的事业，开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新局面，为国家选育更多的合格专门人才。

学生 黎纹

细微之处见风范 毫厘之差定乾坤

常微分方程
习题一

在1-4空框中解给定的微分方程.

1. $y' + 3y = x + e^{-2x}$, 2. $y' - 2y = x^2 e^{2x}$

3. $y' + y = xe^{-x} + 1$, 4. $y' + (1/x)y = 3 \cos 2x, x > 0$

(例) 1. 与标准形式 $y' + p(x)y = q(x)$ 相对应, 这里
 $p(x) = 3, q(x) = x + e^{-2x}$
 $\int p(x) dx = 3 \int dx = 3x, e^{\int p(x) dx} = e^{3x}$

由 $y e^{3x} = \int q(x) e^{3x} dx$

得 $y e^{3x} = \int (x + e^{-2x}) e^{3x} dx$
 $= \int x e^{3x} dx + \int e^x dx$
 $= \frac{1}{3} \int x d e^{3x} + e^x$
 $= \frac{1}{3} (x e^{3x} - \int e^{3x} dx) + e^x + C$
 $= \frac{1}{3} x e^{3x} - \frac{1}{9} e^{3x} + e^x + C$

即 $y = \frac{1}{3} x - \frac{1}{9} + e^{-2x} + c e^{-3x}$

2. $e^{-2x} y = \int x^2 e^{2x} \cdot e^{-2x} dx = \int x^2 dx = \frac{1}{3} x^3 + C$
 $y = \frac{1}{3} x^3 e^{2x} + c e^{2x}$

习 题 八

1. 对于一个形如 $y'' = f(x, y)$ 的二阶微分方程, 代换得其一阶形如 $v' = f(x, v)$ 的一阶方程. 假定此方程可以就 v ($v = y'$, $v = y''$) 解出, 则可通过积分 $dy/dx = v(x)$ 而得出. 注意在就 v 解这个一阶方程时, 使得 v 为一个常数而在就 y 积分时, 得去另一个任意常数. 解下列微分方程

(a) $x^2 y'' + 2xy' - 1 = 0, x > 0$

(b) $xy'' + y' = 1, x > 0$

(c) $y'' + x(y')^2 = 0$

(d) $2x^2 y'' + (y')^2 = 2xy', x > 0$

解 (a) 设 $y' = v$, 则 $y'' = v'$, 原方程变为

$$x^2 v' + 2xv - 1 = 0, x > 0$$

$$v' + \frac{2}{x}v = \frac{1}{x^2}, x > 0$$

$$vx^2 = \int \frac{1}{x^2} \cdot x^2 dx = x + C_1$$

$$v = \frac{1}{x} + \frac{C_1}{x^2}$$

$$\frac{dy}{dx} = \frac{1}{x} + \frac{C_1}{x^2}, dy = \frac{dx}{x} + C_1 x^{-2} dx$$

$$y = \ln x - C_1 \frac{1}{x} + C_2$$

(b) 同样代换 $y' = v, y'' = v'$, 原方程变为

$$xv' + v = 1, x > 0$$

$$x dv + v dx = dx$$

$$vx = x + C_1, v = 1 + \frac{C_1}{x}$$

$$dy = dx + C_1 \frac{dx}{x}$$

$$y = x + C_1 \ln x + C_2$$

(c) $v' + xv^2 = 0, v^2 dv + x dx = 0, -\frac{1}{v} + \frac{x^2}{2} = C_1$
 $\frac{1}{v} = \frac{x^2}{2} - C_1 = \frac{x^2 - C_1'}{2}, \frac{dy}{dx} = \frac{x^2}{x^2 - C_1'} \Rightarrow dy = \frac{dx}{x^2 - C_1'}$

——摘自何品三先生手书《讲义》

回忆父亲的二三事

父亲一生从事数学教学工作，其实他大学的专业是化学。据母亲说，他大学一毕业就被学校直接聘为数学老师，转专业源于他对数学的热爱和优秀的学习成绩。上大学期间，他还在民国时期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可惜证书散失没能保存下来。

父亲毕生热爱数学，热爱数学教学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究、教学，从未懈怠，为数学教学倾注了一生的心血。直到他去世前依然保持着每晚看书（多数是英文专业书）到夜深的习惯。除了教学他还同时承担着北京市高等教育研究会理事、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委员、原冶金部教育司数学学科组副组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社会性的工作。

每逢新学期开始，他的备课稿总是重新撰写，将国外最新出版的数学书中的新观点和新内容揉进讲课稿中，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新知识，足见他对教学的严谨态度和对学生认真负责的责任心。见过他的讲稿，笔记清晰整齐，字体漂亮，一如课上的板书。在课堂上他声音宏亮，抑扬顿挫，逻辑清晰，据说课堂气氛和讲课效果都很好，广受学生的好评。他早年的学生曾这样描述，父亲给他们上微积分课，在黑板上先画一只大梨，继而讲述如何对这个形状不规则的梨形图形展开微积分计算，风趣幽默，课堂气氛活跃，很吸引人。

父亲常看的书除了数学、物理、英文专业书，还有文史哲类

的书籍，闲暇时父亲会饶有兴趣地浏览这些书籍，家中许多这类书籍都是父亲购置的，如《古文观止》、《左传》等。他还亲手包上书皮，工工整整地写上书名。

父亲最大的喜好就是京剧。他是个戏迷，经常有板有眼地哼唱京剧唱段，并给我们讲一些京剧传统剧目，如《打渔杀家》、《长坂坡》等。他还曾在钢院大礼堂演唱过京剧唱段。耳濡目染，我们兄弟姐妹中的几个女孩子都喜欢上了京剧。

父亲为人正直谦和，气清磊落，与人为善，给同事、学生、亲朋好友，以及周围的人留下了乐观、开明、随和的印象。同事、学生到家中来访，他从来都是以礼相待。无论我们兄弟姐妹中谁的同学、朋友来家作客，父亲都热情地招呼，像老熟人一样健谈，话题总能活跃气氛，让年轻人很快就没有了拘束感。有时候聊着聊着就聊到数学上，他把生活中的常识用数学的语言描述，生动有趣。就连院内商店的售货员都与父亲相熟，父亲去买东西，总是会和他们聊上几句。他们说父亲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

父亲离开我们30多年了，他是在去武汉钢铁学院进行数学评估工作的路途中突然离世的。但他的音容笑貌从未走远，他对我们的如山父爱和言传身教，以及清正做人、认真做事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会伴随我们的一生。

何品三子女

2021/2/20



李文彬
LiWenBin
(1919年—1993年)

李文彬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是国内最早开展固体内耗和超声衰减研究工作的学者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内耗和超声衰减专业委员会委员，为推动我国固体内耗和超声衰减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以及在这一领域的国际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文彬简历与生平

李文彬，汉族，1919年生人，四川中江县人。大学毕业，会英语、德语、俄语，从1942年起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时期曾在空军机械学校任教。1948年在成都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1938-1942年国立四川大学理学院物理系上学。

1942-1951年 空军机械学校、成都成华大学担任物理、数学讲师，副教授。

1952年8月 在东北工学院任教，民主同盟成员，长春市人民代表。

1954年3月 调入北京钢铁学院。

1963年担任物理教研组副主任，协助顾静徽主任工作。

1978年担任物理教研室副主任。

1980年 在物理教研室作为内耗科研组的负责人，主持国家91项重点项目之一《固体中的内耗和超声衰减》课题。

1982年担任物理教研室主任，曾经获得学校先进教师荣誉称号，是我校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享受司局级待遇的离休干部。李文彬教授曾任北京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和副理事长、北京市物理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内耗和超声衰减专业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兼秘书长、《物理教学》杂志编委。

1987年 退休，享受司局级待遇。

李文彬教授的部分学术论文目录

[1] Li Wen-bin, Liu Zheng-qun, Yang Guo-ping, Li Cheng-hsiu and Zhang Bin, Investig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rare earth elements in pure iron by the method of internal friction, Journal de Physique Colloques, 1981, 42(C5): C5-463-C5-468.

[2] Li Wen-bin, Yang Guo-ping, Li Cheng-hsiu and Liu Zheng-qun, An internal friction study of mechanism of improvement of the properties of Fe-Cr-Al alloys by the addition of small amount of rare earth elements, Journal de Physique Colloques, 1981, 42(C5): C5-469--C5-474.

[3] 吕金钟, 李文彬, 氢在 Ta 中的扩散, 金属学报, 1986, 22(3): A213-A217.

[4] 邱宏, 杨国平, 田跃, 李文彬, 纯铁中磷的高温内耗研究, 北京钢铁学院学报, 1987, 9(2): 125-131.

[5] 米云平, 李文彬, 杨国平, 张立德, 稀土元素 La 对 Al 的晶界内耗峰的影响, 内耗与超声衰减—第二次全国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论文集, 1989, 31-32.

[6] 吴平, 杨国平, 吕金钟, 李文彬, 用簧片振动法研究辉光放电法制备的 a-Si: H 薄膜的内耗, 内耗与超声衰减—第二次全国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论文集, 1989, 129-130.

[7] 吴平, 杨国平, 吕金钟, 李文彬, GD a-Si: H 薄膜的内耗及结构缺陷, 唐山工程技术学院学报, 1993, 4: 77-82.

讣 告

北京科技大学物理系李文彬教授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93年4月27日下午2时52分不幸逝世，终年74岁。

李文彬教授生于1919年11月28日，四川中江县人，194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物理系，解放前先后在成都光华大学、建国中学、清华中学等校任教，1950年至1954年在东北工学院任讲师，1954年起一直在北京科技大学任物理教师。历任讲师、副教授、物理教研室主任，1980年提升为教授。

李文彬同志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解放前夕在成都参加民盟地下组织，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50年成都解放时协助接管成都成华大学，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任。李文彬同志是我校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享受司局级待遇的高休干部。

李文彬同志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地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五十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人才。李文彬教授治学严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教学工作认真负责，效果好。曾被评为我校先进教师。李文彬教授长期倡导基础课教师在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并亲自组建了内耗科研组，在固体中的内耗与超声衰减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培养了一批研究人员，在基础课教师开展科学研究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李文彬教授生前历任北京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理事长，北京市物理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内耗与超声衰减学会筹备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和《物理教学》杂志编委。

李文彬教授为我校的物理教学工作，为我校物理系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不幸逝世是我们的一大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一位好师长。

李文彬同志，安息吧！

定于1993年4月30日上午8时10分在北医三院小礼堂进行遗体告别，7时45分车库准时发车。

李文彬教授治丧委员会
1993年4月28日

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

唁 电

北京科技大学物理系：

惊悉李文彬教授不幸逝世，我们万分悲痛。先生生前对我国内耗研究所做的贡献铭记在心。请转告我们对杨国平教授及其家属的慰问，沉痛悼念李文彬先生。

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付所长张立德
中国物理学会内耗与超声衰减专业委员会
孔庆平、朱震刚

一九九三年五月四日

怀念李文彬先生

抗日战争时期，李文彬教授在空军机械学校任教，编写授课教材，为民族的抗战培养了一批空军人才。解放前夕在成都参加民盟地下组织，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积极参加爱国进步活动，他在成都的家成为民盟地下组织的一个联络点。1949年底成都解放时，协助人民解放军接管成华大学，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任，做学生工作。1950年作为筹备委员会成员发动和组织成立了成都市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和成都市高等教育工作者工会。1951年参加中国物理学会，同年参加了东北局工作团，曾被评为“模范工作者”。

李文彬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是国内最早开展固体内耗和超声衰减研究工作的学者之一，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内耗和超声衰减专业委员会委员，为推动我国固体内耗和超声衰减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以及在这一领域的国际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6年开始，他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开展了固体材料中内耗的研究工作。1959年在第一次全国固体物理学术会议上作了“铁铬铝电阻合金内耗研究”的报告。1978年在冶金部第二届稀有金属结构与性能学术交流会上作了“内耗与超声衰减综述”的报告。1981年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委托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瑞士洛桑召开的第七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并发表了2篇学术论文。1982年我学校举办了全国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讲习班。在葛庭燧院士的领导下，他积极参与组织和筹备了



李文彬教授（第二排左一）参加学术讨论会议，第一排左一：葛庭燧院士



李文彬教授（右一）同国际友人在一起

1989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九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李文彬教授在 *Journal de Physique*、*金属学报* 等学术期刊上以及在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多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得到国际滞弹性内耗研究领域创始人之一葛庭燧院士的高度认可，被收录在200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葛庭燧院士的专著《固体内耗理论基础》中。

李文彬教授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国家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建设人才。他治学严谨，有很高的学术造诣，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他担任物理教研室副主任和主任期间，积极倡导基础课教师在教学的同时开展科学研究，并亲自组建了固体内耗研究组，开展固体内耗和超声衰减方面的研究，1980年承担了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固体中的内耗与超声衰减”中的稀土在钢中作用机理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在基础课教师开展科学研究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



李文彬教授在实验室工作

李文彬教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积极尝试探索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人才培养和科研方面的合作，建立了学校和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的合作，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学校物理学科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李文彬教授积极开展学校和企业的科研合作，他带领固体内耗研究组的同志们去四川省中国嘉陵集团开展调研，解决企业在材料方面遇到的科学问题，为企业在关键材料的科技攻关中提供科研支持，积极推动了固体内耗研究工作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



李文彬教授（第二排左二）同固体内耗研究组的师生参加198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九届国际固体内耗与超声衰减学术会议

李文彬教授教书育人，一直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科学精神，努力为国家培养人才。在指导学生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他是一位严谨的老师，他给学生讲授理论知识、实验设备的原理和操作方法，同学生一起认真分析实验结果，探讨实验现象背后的物理机理，非常耐心地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学生大胆提出新的理论设想。他认真地审阅和修改学生的学位论文，甚至不放过一个错别字。他经常带领学生们参加国内和国际的学术会议，培养学生的学术交流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在平时的生活中，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如有时间他会和青年学生们去公园踏青。如果有学生出国留学，他会认真地给学生写推荐信，在学生出国留学前，在家里请学生吃顿送行的便饭，叮嘱学生在国外要注意安全、注意身体等。在学生们眼里李文彬先生是他们的良师益友，他在工作中严谨求实的态度和生活中平易近人的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学子，激励着他们在各个领域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葛庭燧院士曾评价李文彬教授：“李文彬先生为我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为人师表、平易近人、诲人不倦、培养后辈兢兢业业，堪称育人楷模”。

数理学院，物理系，应用物理系供稿

回忆我的爸爸

北京钢院，北京的八大学院之一。解放后早期建立的，应该是五二年。我爸我妈来到这里工作，认识结婚，然后有了我们三个小孩。

按照先成家后立业的说法，老爸先前或之后都不属于很传统的。他结婚晚，所以养我们孩子的年龄也大。因此在我的眼里，老爸似乎从来都是一个老人。他眼睛也不好，带着一副 1500 度的眼镜，厚厚的。每当小朋友问起的时候，我都是瞎支吾一番，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成那样的。跟他走在马路上迎面有人打招呼，老爸总是微笑着点头，但每次过去了之后他才会问那是谁谁谁。我都习惯了这么的帮他，反正院里就那么多人，差不多都知道。而且那时候的礼仪习惯与现在的也不同，现在的人无论年老、年轻都称先生，可在过去见面的称呼有叫同志、大夫、老师，还有叫先生的，那时候老爸一般是被人称为李先生。而当时在钢院里被称先生的，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但却一定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起码看着都是比较老的吧。而老爸就更是了。他有明显的上一代人的特征，不仅是穿衣服样式老，说起话来也没有当代人的语气，时髦词也不会用。反而什么事被他一形容，似乎就还带上了那时社会的味儿：那时的街，黄包车夫喜欢聚在哪条街，在露天的小担子前，一碗一碗冒着热气的肉汤泡饭……，几乎都被我闻到了似的，特别的香。就连讲个当时的时事政治笑话，也会是哪个地盘上的哪个军阀怎么怎么的主持社会秩序，且对新

政所定的马路右向行规如何的大加指责：“人都去走右边，那左边的路谁来走啊？……”。

哈哈……，逗的我呀！

说实话小时候我真的挺爱听老爸这类比较遥远的的故事。他中学同班上的哪位同学如何绝顶的聪明，但故事的重点却落在人家在排球场上如何的找不到北——“哦吼！”……球都已经砸地了，尖子同学依然架着姿势等天落…。

“看看，看看大脑太好用了吧，小脑就不发达了……”老爸这类道理可是不少。

“爸，你们那个时候就兴打排球啦，你的学校算是够现代的哈”

“那当然了！……”，老爸可高兴了，“我们还跳高呢……”

“你还跳高？喔……跳过多高啊？”

老爸提臂一比划，立马把我给震了：“大概有这么高吧”；即不懂“俯卧”也没见过“背越”的他，真是浑身的一体轻，站着就能跳过头了。

“太厉害了呀，是不是把国家记录都给破了吧？哦对啦，你们那时候有记录吗？……”

给老爸气的呀；“嗨呀，嗨……你这个真是……真是的”。

确实，作为老一辈，如何看社会或感受事物，不会像我一样。就我而言，尤其是小的时候，哪热闹往哪儿去，看热闹不闲事儿大，没反应。

有一段时间里，钢院里面的广播喇叭大更新，数量倍增不说，还都换成了高音贝的……，而且是成对成双的对着挂。男女广播员的嗓子变得也特别好听，又高又亮。一时的我，耳朵里还进来了很多的新名词；什么“篡权”、“夺权”，整天整天的。慢慢的，

居然我还听出了些情节来了，那个叫“权”的，好像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好像原来是在办公楼里面，后来好像去了图书馆，再后来又好像到了一斋里；不是大白天的、还是黑夜里的这儿或那儿的，真的是让人很纳闷这个“权”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啊？问老爸的时候，他的回答却又让我有点失望了，当时他只是两个手一合，合成了个圆形状：“哎呀呀……，就是那么大点个圆坨坨。”



当然那个“圆坨坨”到底是什么，却是我自己后来才悟出来的。是比不上玉玺大印，那一阵子大学生们来回抢的宝贝玩意原来是钢院的圆形大公章。

而在我们的家里，在老爸的抽屉里也有章。印章是长条方形的，粗的，细的，两个呢，还都是象牙做的，上面都刻有老爸的名字。不说今天的标准了，老爸肯定是缺乏环保意识的。而就在

当时，人们也早就不兴用什么个人标志的东西了；久了不用放着的图章字上的红泥都已经干透了。其实抽屉里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一些旧的文献卡片，旧的钢笔，还有的就是那一副金丝眼镜，架子可软了，但挂着厚厚的镜片拎起来沉甸甸的直往下坠。真是的，每次拉开老爸的那个抽屉就是一股的古懂味。

事实上，如果用时间来衡量的话，老爸绝对算是个人历史比较长的，但却没有什么过人的英雄举动。因此，遇到轰轰烈烈的运动时，跟不上不说，而且老爸这类人往往都是被动的。我虽然年龄还小，不太懂什么，但一段时间里，总能见他在灯下从黑夜到白天的，直接能感觉到的就是：他在受煎熬。还好，在钢院这种地方里，不论历史长的或历史短的，尽是一些需要反思的人；大家聚在一起谁比谁也强不到哪儿去。最后，等一个一个轮着反省完了，就一批一批地下农场劳动去了，老爸还是第一批就被派下去了的呢。那段时间好多人家里少了大人，没人管，院里的小孩们显得多了起来，吃食堂，到点不回家，觉得特别自由。而老爸在农场的劳动，是天天扒猪圈；他后来解释说，那是轻活，是大家照顾他的年龄和眼睛才给他的好活。用铁锹扒了一年的猪圈，手得了腱鞘炎，胃病也老犯，但老爸却认为那是他近年来过的最轻松的一段时间。

一年多以后，完成了再教育的大人们终于可以回钢院了。那天下午好多人都聚在了车库的周围，我和老弟也在其中等待着。那一阵子钢院的上空老有成群的鸽子在飞，还发着响，似乎就是预示着好兆头，说好了老爸也会给我们带鸽子回来的，确实有盼头了……。

当一个个一身土的叔叔阿姨伯伯爷爷们，陆续爬下了卡车后，一群人里我是挨着个的寻摸，等我终于看见老爸的时候，又几乎



是认不出了。不光是他那半长的大衣面布满了灰，好像一下子他还长矮了半截似的。本来他那顶灰色的老头帽却因为密绒细缝里已经塞满了土，已经变成了一顶土毡子扣在额头上。而那脸也像被土给平了似的，变得又干又暗，倒是他的眼镜变化不太大，虽然上面也落了些土，看不清后面的眼睛，但却依然能反射着一些光。猛的一看，老爸这副样子就更是旧社会了，简直就是一个哈了个腰、提着一篓鸽子的旧社会老头子。

老爸出生在1919年。但说他是完全的老脑筋也不是很确切。事实上他生长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的年代，自身经历在华夏社会发展的变革期，受当时社会潮流认识的影响也是必然的。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最早我就是听老爸说起的。他是崇尚科学现代化的，不然他怎么从事起了科研教书工作，并进到钢院这个理工科大学里了呢。

北京的高校，有一阵子兴搬迁，钢院人都忙着打木箱子搓草绳子。要出远门的北京人似乎还有一件要紧的事赶着要做——就是去爬长城，离开前去爬，回来后可能也要去爬，到底是什么心态怎么说的都有，而那一年的那一次却是我的第一次。天还没有亮，我们邻居朋友几家的大人和小孩一帮人就在五道口等到了开往八达岭的火车。那天的长城上面几乎没有人。头顶上的天是蓝蓝的，飘着的云彩白白的，比较容易发感叹：“不到长城非好汉”。而老爸的声音却不大，差不多算是在嘟囔吧：“这么大的工程，多耗时间，耗劳力啊，可一架飞机一眨眼不就过来了，你说是不是啊？”

他在问我？……

老爸这种时间和空间混搅为一团，不仅没有诗意，怎么听着就跟谬论似的。不过，他的这一番倒是悟了我一下，本来我看着脚下的石砖路是一路往上的，而路面上还有驴驹子满地满处的爬，两边的野树野草密密麻麻、那酸枣棵子更是了，直从石头缝里往外蹿着长，野香野香的；这么好的地方原来曾经是边界呀。

现在想起来，老爸的兴趣爱好在理工。在文学方面老妈倒是要强好多，起码老妈，认为主要自己是没时间，否则可以细读更多的文学作品，她的意思是要好好的欣赏、以欣赏的态度阅读，而不是像老爸只是为了娱乐。像《三国》和《水浒》这类的名著，他都是后补上的。什么简易版的、甚至是借来的小人书，老爸也能娱乐的很尽兴，并且他有随读随卖的本领。比起我认识的其他几个能通读原著并爱卖弄故事的小朋友们来，老爸也是不差的；什么鲁肃老实，周瑜的心眼小，林教头爱家爱妻子……，鲁智深不认字能喝酒。

我个人也可能是受他的影响多一些，不怎么很人文。对古代

四大名著，听情节，看热闹可以，却也都到不了审美欣赏的高度。不好意思的讲，从来我没读过三国的大部头，而都是到了很后来后来了，才看完整个全套的《三国》电视片。一点都不夸张，直到今天我依然读不懂《红楼梦》，那毛笔大字从小到大都写不好。

“都是你把我给耽误了……”

我不止一次的对老爸发抱怨，不过每次都一样的，如果他今天还在世的话，相信一定还是会找点办法把我给敷衍过去了事。因为在他的观念里，一向都是“12345”比“知乎者也”来得更加实在，“……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被老爸着重、重复的“引用”。



老爸是搞物理的，教物理、也研究物理。他常挂在嘴上的一个专业词叫“内耗”，那是他的兴趣领域，研究物质内部的损耗现象。更具体点，更专业些的词汇就会听到：结构、材料、金属材

料等等。当今“稀土”这个词很时髦，好像是个很国际政治的东西，可在小时候听爸讲起这个东西，直接的反应也就是字面上的“物以稀为贵”。往原材料里加“精”料，改变结构，最终对其性质状态发生的变化进行观察与探测。对存在的好奇，对世界的反应，专注于求索对物质本质的理解和认识，那个理似乎就是这么简单。

在钢院小教室里他曾经教过专业的固体物理学，“晶格格点”啥的，挺微观的。而在办公楼的大教室或图书馆的阶梯教室里，他站在大黑板前，给更多人讲过的是宏观面上的经典物理学。

而我们的家里也挂有一个小黑板，在这个黑板上老爸曾经也拿着粉笔给我画图、写公式，帮我开脑，帮我意识。按照他的话，初中课本里有牛顿三定律，到了高中还是牛顿三定律，等以后上了大学又是牛顿三定律。公式，定义都一样，简单容易背，而且你都会照着样子解一两个题，然而如果想深入了，就是另一回事了：首先是概念的建立，其过程可以是非常艰难的。其次是相对与绝对、必要与充分、时间和空间的标准量化，事实上涉及到的：新意识习惯的开通。其实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或人文的，对世界的事物及其变化，其认识的过程是类似的。对一些自身已经存在并习惯了的直觉意识感，是需要先做否定的。但毕竟人都是太爱自己了，做起来实在是不容易。

虽然我到底还不能彻底到位的理解牛顿定律，但依然记得当初发呆，发愣，死磕死想，而顾不得老爸一边的“嘿嘿嘿”，因为我知道他那不是在笑话我，而是在认可我。脑子是要用的，用狠了，脑门子都可能疼，但过去了以后，就会是新鲜的，新概念、新意识的空间是另一片的天和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老爸是有一些很逗人的谬论和歪理，然而一旦严肃起来他还是极靠谱的，这时候的他就不显得老调了。



1993年老爸离开了我们，快三十年了，连他的小孩——我们自己都已经开始老了。当初我第一次出钢院大门去外地，那似乎像是一次预演的自立一样，临走的时候，接到了朋友们的送别礼。其中一个大笔记本里发小还提了词，用了“出类拔萃”来形容或共勉。这下可好，把老爸可是给新鲜着了，一次又一次地将这个成语单拎出来念，“有意思，有意思……”，大概他自己这一辈子都没想起过用这么漂亮的词。说白了，他从来就没有那么高的格调。对我，他也从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期望，最多听他告诉我的就是；“好日子和坏日子都要会过得”。而那回出北京前，他倒是对我谆谆教导得非常具体，要我不用先想他。到了南宁后，先把那个地方所有像是好吃的东西都先试一下，看看什么最好吃。大概这就是他说的“好日子”，起码是在南宁的好日子，他教我了该怎么过。



参加国际会议

真的是！正儿八经的大道理，老爸实在是没有，但平时的笑话和故事确实是不少。吃饭的时候他讲，灯下或窗前也会说，连听音乐时他也要插些话。全家干活刷白墙，累的半死、饿的半死，晚上十点了才端上碗，老爸却说“处在这种累的状态的时候，吃面就可以吃香了……”，而且他还继续的打岔、加情节，可以岔

到了“高山顶”，说登山路上如果先忍住不吃东西，到了山顶上保证你就可以吃上一生中最好吃的一顿饭。

老爸用他的这类谬论或是自圆其说的故事，逗我们，带着我们，带着我们看远方。很小很小的时候，似乎是刚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就是这样了。还说呢，那一次，虽然我根本都忘了跟他进城是去看了什么，是电影还是话剧都忘了，却记得我们回来得太晚了。22路到北太平庄下来我们没赶上31路回钢院的末班车。老爸背着我就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讲，他还像峨眉山里的老和尚一样吆喝着：“山娃儿（猴子）啊，出来吃花生啦……”。我听着，看着，也坚持着……，马路上的灯在头上，一会亮，一会暗，几乎睁不开眼了的我，到底什么时候闭了眼也不知道，但却记得了那是在雨中……。

李波（李文彬的女儿）



林楠

LinNan

(1918年—1995年)

林楠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抗日救国、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党的建设及党的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斗一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忠于党忠于人民，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她一生兢兢业业为党工作45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她待人诚恳，谦虚谨慎，联系群众，平易近人，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林楠简介

林楠，曾用名林秀蓉，女，汉族，1918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

1937.2—1938.2 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聊城政训处工作。

1938.10—1941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八路军山东六支队二团政治处干事、中共泰西地委、鲁西北地委妇委书记及主任。

1941年—1943年 历任中共冀南三地委妇救会宣传部长、中共河北省永年县抗联主任。

1944年 延安中央党校学员及中央党校六部党总支委员。

1945年 黑龙江北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生产部部长。

1949年 中共辽宁省本溪市委妇委书记，市妇联主任。

1951年 哈尔滨工业大学党总支副书记。

1953年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其后历任：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监委书记。

1982年12月 从北京钢铁学院党委副书记岗位离休，享受老红军待遇。

生平介绍

钢铁岁月

艰苦建校

1953年初春3月，我从沈阳调来北京。当我坐着汽车在天安门和两边的红墙前路过时，心里充满了喜悦。“啊，离开了八年战斗生活的东北，终于回到关内来了，来到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所在地工作，是多么的幸福！”

不几天，接到了重工业部的通知，决定我到钢铁学院任政治辅导处处长。我对这个工作并不是很高兴，听说钢院还没有盖起房子，在清华大学筹备，郊区的公共汽车路尚未修好，离家较远。当时我已35岁了，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孩子们又都很幼小，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不愿意做高等学院的工作。参加革命前我是只受过后期师范教育的学生，未接触过多少高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工作多在农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虽然也工作了一年，在那里虽也感到是比较愉快的，和陈康白、高铁等老同志之间的关系还比较亲切，也看到了青年大学生的很多优点，但因文化不高工作起来总觉得有点困难，所以对去北京钢院有些迟疑，但自己对于组织的决定过去也很少提出不同意的意见，所以4月份我即持重工业部的介绍信去报到了。

那时钢院只在清华的一个楼上有几间小办公室，而且工作人员也很少。我去时把介绍信交给了第一副院长魏景昌同志，还没有正院长，他是主要负责的。他对我来表示欢迎，简单的给我谈

了下情况，并说以后由杜若牧副院长负责政治工作，后来我又见到了杜院长，以后工作便向他请示汇报。老同志还有院长办公室主任郭文治，工作和他联系也比较多。

钢院是当时“院系调整”后由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山西大学、西北工学院等六个大学的冶金专业合并而成，教师和学生暂时在清华上课，各系都由大学的教授任系主任，如冶金系的林宗彩，工艺系的杨尚灼，章守华，采矿系的卢焕云等。校舍已在动工修建，盖房子也是领导上的重要议题。学校的上级行政领导是冶金部，党委的工作是北京市委领导，市委指示多由当时清华校长蒋南翔同志传达，他当时兼任市委高校的领导工作。因钢院党员较少，只成立一个支部，支书是魏景昌，杜若牧和郭文治均为支委。我负责的政治辅导处只有以胡颖为科长的宣传科，和朱耀中为科长（兼团委书记）的学生科。学生科有几名政治辅导员，一系一个，力量较强，保卫科只有一个干事，人事工作直接由魏景昌负责。

我每星期六坐学校的大卡车进城回家一次，平时住在清华，和女教授顾静辉（徽）同住一个单元。我住在一个很小的北间，我俩相处还可以，有时我们一起到院里散步或买东西。我当时生活在写有“水木清华”的大校园里，看到教授们点头哈腰互相称先生，教授夫人互相称太太，心里有些不习惯，觉得他们是统战人物，在思想感情上存有距离。他们对我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一方面接受领导，同时也觉得老干部是不懂业务的土包子则敬而远之。



20 世纪 50 年代钢院主楼

1953 年的冬天，钢院的校舍只盖起了教室楼，几栋宿舍，和几个临时工棚。在这种情况下，钢院所有的教师、学生、工人和干部都搬去了，大家都在教室办公，学生都在临时工棚上课，搭起了木板作为课桌，没有食堂在院子里吃饭，路上都是大深沟，上面搭上窄木板。我开始住在一栋楼下一间小房子，房子尚无取暖设备，晚上不脱衣服盖上被子还觉得很冷。大家都过着同样的生活，一方面进行教学，一方面共同艰苦建校。

忆延安

一心向往

啊，延安，

……

你的名字将千古流芳，

在历史上灿烂辉煌。

这支延安的颂歌不知曾有多少爱国的革命知识青年在纵情的歌唱。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枪炮声在芦沟桥畔响起，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开始了。我的故乡山东省东平县由万里等同志领导的地下党组织成立了“抗日救亡协会”，团结了很多爱国知识青年，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我和几个女同志也按捺不住对敌人的仇恨怒火，也积极前去参加。在万里等同志那里，知道了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都在那里。那里有中国红军，已改名为八路军；有“红大”，已改名为“抗大”。最使我兴奋的是听说那里吸收女兵，看到毛主席与贺子珍穿着军装的合影，我是多么的想当一名女兵，扛起枪来和敌人战斗啊！从此我的心便与“延安”联系在一起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与万里委员长合影

1938 年春天，我在鲁西参加了革命队伍，当年即入了党。虽然远离延安，但经常听到从延安来的同志谈起延安的情况。在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是在延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像灯塔一样始终为我们指引航向。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等在思想上武装了我。1942 年，我调到冀南抗日根据地，那里的环境逐渐变得残酷，敌人以“铁壁合围”的方式频繁对我们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安了很多“钉子”据点。

1943 年春天，这块平原地区久旱不雨，赤地千里，有许多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一些老乡因吃不饱饭，又加上传染病流行而死去。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军民团结一致，对敌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顽强斗争。因为我们坚信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

分析判断，这是敌人垂死前的挣扎，是黎明前的黑暗，胜利和黎明即将到来。

1944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接到冀南三地委的通知，调我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高兴的几乎跳了起来，我久已向往的愿望即将实现了，但要离开艰苦战斗过的地方和战友、老乡们，又产生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惜别之情。有的同志在送别我的时候，含着眼泪说：“你已经半年没吃过饱饭了，看麦子即将收割了，也不能等着吃白馒头了。你还能回来吗？”我说：“能！等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见！”

跋山涉水

我去延安的路上，首先是组织上派一位交通员同志护送我过平汉铁路。铁路是敌人的封锁线，我虽然早已是农村妇女打扮，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要在夜间才能通过。过了铁路后的那天早晨，交通员同志带我来到附近的村子里，村里是“革命的两面政权”，又掩护我们，又应付敌人。村里一位老大嫂热情接待了我们，她烙了薄饼给我们吃，正在吃饭的时候，她告诉我们村子里有“汉奸队”来了，说如果看到我们，就说我们是“走亲戚的”。我们在村里吃饭休息之后，交通员同志将我们送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找到了冀南区党委。区党委将我三位也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组织了一个行军小组，二位男同志和一位女同志，我们每人背着一个简单的小包，有两件换洗的衣服和一个笔记本子，头戴一顶草帽，手拿一根小竹棍，开始了奔赴延安的长途跋涉。我们出发的第一天，因需要渡过一条河，组织上安排了马匹送我们过河。我骑马过河时，突然感到头昏而掉在水里，所幸水浅，只

是湿了衣服和头发。

太行山是八路军前方司令部和中共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兼北方局书记。我们到北方局住了几天，并办理了到延安中央组织部的介绍信，又继续开始了我们的行程。两条腿和一个小竹棍，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每天都要爬过几个山岭，或趟过几条小河，每天要走几十里的路程。有时赶上我们的交通站即住上一两天，或住在路边村里的老乡家里。村干部在村里给我们募集点粮食，我们打了收条，他们用条子抵交公粮。为了不麻烦老乡，男同志上山打柴，我们两个女同志借锅自己做饭。我有一次切面条时把手指切破了，至今还留有疤痕。

太行山晋东南革命根据地与晋绥解放区相连，在晋绥地区又通过了汾河敌人的一道封锁线。在一天夜间渡过了一道半人多深的河水，交通站派了当地几个会水的青年农民，搀扶着我们过了河。过了河又是多为崎岖的山路，出了晋绥地区终于来到了陕甘宁边区，进入了延安地界。我们特别的兴奋，好像天空更高，也更蓝了。绥德、米脂两县的风景显得特别优美，男女青年也显得格外俊秀。在去延安的路上，看到有骑马而过的外国人，路上有人告诉我们：这是美国派到边区的观察小组。我们都觉得脚步特别的轻快，最后一天竟走了七十里到达了延安。

我们找到了中央组织部，我被介绍到中央党校六部学习。这时已到秋天，延安早晨的气候很凉爽。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毛主席为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为副校长，六部驻地在延安城南的杜甫川，听说唐代诗人杜甫曾到过那里。上面是山坡，下边

是小河，宿舍多建在山坡的窑洞里，只有饭厅和我们的两个支部的活动场所，是简易的平房。我与两个女同志同住一孔窑洞，我们到延安后除了两件换洗的衣服几乎一无所有，在敌后游击区，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只吃在老乡家，衣服和鞋子都是老乡大嫂给做的，冬天就睡在老大娘的热炕头上。到延安后发了被褥、床单、衣服、牙刷、牙粉、肥皂等，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食堂的饭多为小米饭、南瓜菜，都能吃饱，每个礼拜还可改善一次生活，吃上白馒头和肉菜等，病号饭还有面条。生了孩子的女同志集中到妈妈支部，每个孩子一个月还发一定数量的面粉，她们窑洞的前面都支起一口小锅随时可以热饭。她们吃不了，有时还请我们过去做客，吃烙饼。我们每个学习小组每月还发一些自种的干烟叶，会吸烟的同志都用一小块白纸卷上吸，有时连我们这些不会吸烟的女同志也卷上一支烟轻轻吸一口。冬天天冷了，我们每人都发了一套用羊毛织成的布做的棉衣。

在延安时间较久的同志告诉我，因为陕甘宁边区是个贫瘠的地方，国民党中央政府不但不给我们部队和地方供给，还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因此粮食不够吃，也没有什么菜吃，只能吃黑豆泡盐水。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延安掀起了大生产运动，不只是开荒种地，并且发展了自己的工业。这样经济得到了发展，保证了我们部队和机关的供给，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把当地老百姓的生产也带动起来了。我们常看到有的农村青年妇女，骑着小毛驴赶集或走娘家，她们都穿得整整齐齐，小毛驴身上还铺着一块漂亮的毛毯。

我们党校的学员一面学习，一面也参加到大生产运动中来，有的做肥皂，有的纺线，有的给服装厂缝制衣服，窑洞门口小小的空地上都种上了西红柿等蔬菜。我们支部的男女同志都参加了

缝制衣服，这样我们也能增加一点收入，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和我们小组的一位女同志，星期天到南门外的市场买了几片熟肉和一小瓶白酒，回到宿舍，虽然我们都不会喝酒，但我们却津津有味的品尝起来，因为这是享受我们自己劳动的果实啊！

在游击区，我们的部队和地方干部虽然一面同敌人作战，一面也帮助老乡干一些锄草、收割和灭蝗等农活，但因敌人频繁的扫荡，还不能像陕甘宁边区一样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学习与整风

1944年的中央党校已发展成立了六个部，分别住在延安的六个山头 and 山坡上。学员都是先后来自全国各解放区的军队和党政群组织的党员干部，也有的来自大后方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党校也见到了过去在鲁西和冀南工作的领导同志和战友。当时中央党校的主要学习任务是整风，四部和五部还补习文化。我学习了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学习与时局》、《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这些报告虽然过去工作时已经读过了，但这次主要是根据报告的精神结合入党以来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总结和提高，并在学习小组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和启发。这次整风对我个人增强党性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整风学习开始，曾插进个“拯救运动”，清查混入党内的敌人“奸细”，出现了逼供信和扩大化，误伤了一些同志，我们到党校时已是善后和甄别阶段。听说毛主席对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并说这是参加整风的党员在灰锰氧中洗了个澡，伤了点皮，希望同志们正确对待。我们六部成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我是总支委员，主要的任务是进行调查和甄别等善后工作，宣布结论，

对清查错了的同志解释道歉，使其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1945年4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在大会前总结了建党后二十四年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为了统一认识，党校也按地区组织了讨论。我们抗战初期曾在鲁西北工作过的同志分为一组，齐燕铭、徐运北等同志也都参加了，齐燕铭同志还拿了一份过去出的鲁西北的《抗战日报》的合订本作为参考，让大家畅所欲言。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指出中国仍是“两个前途”，有发生内战的危险，并提出我们的斗争纲领和路线政策。党校对这个重要报告开展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大家对革命的前途进一步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同时也对前进中的曲折和困难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人民群众的文艺

我们到延安后，去桥儿沟“鲁艺”看望过去熟识的同志。那里正在演出秧歌剧，他们就邀请我们去看演出。演出没有舞台，在场院里进行，观看的人围了个圈，我们坐在条凳上看。节目是《兄妹开荒》和《夫妻识字》，都是只有两个男女角色的小歌剧，我们看了觉得耳目一新。“鲁艺”的同志告诉我们，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我们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指出我们文艺工作的方向应该是为工农兵“人民大众”的，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加以提高，再到群众中去，

教育群众。这是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也是个无产阶级的立场问题。

歌剧《白毛女》第一次在中央大礼堂演出了，党校五部、六部的同志们晚上都去看演出，该剧的政治内容和艺术创作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大家被剧情深深感染，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演出结束已到了深夜，天下着大雨，延河的河水暴涨，淹没了来时的道路，我们只好在礼堂休息，等到天亮河水消退后才过河回到驻地。京剧《逼上梁山》也在延安演出了，这在延安文艺界也引起了哄动，我这个不看京戏的人从那时起也对京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见到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

1944年的“双十节”，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党中央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召开了纪念大会，我们支部有两个参加会的名额。来延安时间比较久的同志让我和一位女同志去参加，说：“你们才来延安，去参加会吧，说不定会见到毛主席呢！”我们俩高兴极了，多么想见到久已想念的毛主席啊！

礼堂内摆满了长长的条凳，人来的已经不少了，我们俩从后门里进去坐在了后排。会议将要开始时，会场突然变得特别寂静，忽然间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坐在我旁边的同志小声说：“毛主席来了，中央领导同志来了！”我兴奋极了，又不敢离开座位，但却伸着头瞪着眼睛向前张望，模糊的看到他们坐在前排的条凳上，只能看到些背影。会上朱德总司令讲了话，他主要是回顾了辛亥革命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司令和听他讲话，他是我们崇敬的八路军总司令。

大会结束了，我和同去的那位女同志为了能看清毛主席而忘掉了一切，我们竟紧跟着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等从前门走了出去，我急促的问那位女同志：“哪个人是毛主席？”那位女同志拉了一下我的衣服，低声说：“小声点！这就是毛主席。”我看见距我们五六步远前面的毛主席，身材高大，穿着一件黑色的夹大衣，头上戴一顶八角帽，他大概听到了我们俩说话的声音，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然后上了前面的一辆吉普车离开了会场。我们看到毛主席的面孔是那么红润和丰满，比抗战初期时看到的照片显得年轻多了。我们不只是为见到毛主席而高兴，我们更知道他身体的健康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多么的重要啊！

我们支部有两个同志是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她们经常谈起对“周副主席”如何崇敬和热爱，那时周总理也经常回到延安。在延安召开的全国妇女联合会筹备会上，我去参加时不仅见到了令人崇敬的蔡畅、邓颖超、康克清三位大姐，还高兴的见到敬爱的周副主席。他和我们一同站着乘坐在一辆大卡车上，一直把我们妇女代表送到杨家岭的开会地点，他显得和蔼可亲，目光炯炯有神。延安延河岸上的书店是“韬奋书店”，即是新华书店的前身。有一次在书店门口看到了刘少奇同志，他拿着几本书从书店走了出来，他给我留下一个有着学者风度的印象。

延安，领袖，领导同志是伟大和崇高的，又在群众之中。

1945年8月9日，百万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寇宣战，八年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在这关键时刻，党校接到通知去中央大礼堂听毛主席的报告。我们到达会场时里面的人已经满了，不但座无空席，站着的人也将通道挤得严严实实的，我们到后只好站到门口。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去了，毛主席做了《抗日

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他告诫我们：“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蒋介石要“下山……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要摘桃子了。”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听报告时因为我们站在门口，虽然聚精会神，有的话音听不太清，回支部后大家反复核对，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使我们认识到抗日战争胜利已将成为定局，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国民党、蒋介石与共产党和人民建立一个民主、和平、团结的政府，但内战的危险仍严重的存在，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告别延安

1945年8月15日的夜晚，我们党校的同志们尚未休息，忽听到外面山上传来人们的欢呼声，这声音由远及近，近处的山头上的同志们也欢呼起来：“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并有敲锣打鼓的声音，有的山头上还点燃了火把。我们党校的同志也都跑出屋外，喊了起来，和远近山头的欢呼声连成了一片。有的同志拿着自己的白铁洗脸盆使劲的敲了起来，有人把床上铺的干草也抽了出来，在山头上点燃起火把。这天夜里大家兴奋得一夜未能入眠。

8月15日以后，党校的同志们再也学习不下去了，延河两岸人来人往到处是一片欢腾，有的三三两两到《解放日报》社去打听新的消息，有的被中央组织部找去谈话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任务，有的收拾行装回山东、河北解放区或其他解放区去，有的被派到新的地区去开辟工作。

那时党中央对东北的工作非常重视，派了大批的干部到东北去建立我们的根据地。我和很多同志都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

要我们参加去东北的干部大队，准备9月初从延安出发。彭真同志在中央大礼堂给我们做了到东北如何开展工作的报告。当我们真的要离开延安，离开延安的山头、窑洞、延河的流水、高高耸立的巍峨宝塔的时候，离开共同学习和生活已一年多亲密无间的同志们的时候，却又产生了依依不舍的留恋之情。我们几个同志凑了点钱到市场上买了个猪头，在窑洞口用自己捡到的柴草烘烤炖熟了，作为了临别时的会餐。

当我们整装完毕准备出发的时候，传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毛主席应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邀请将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我们一方面为国家将要出现民主、和平、团结的局面而寄予希望，但又为毛主席去重庆后的安全而感到担忧。当毛主席到飞机场将要离开延安的时候，我和很多同志也都跑去了，亲眼目睹毛主席高大的身影挥手向同志们告别。

1945年9月2日，我们在延河岸边整队出发了，很多仍然留在延安工作或待命的同志前来给我们送行。队伍徒步离开延安经陕甘宁边区向东北进发，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路上，不断见到当地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少，迎接我们的队伍，在路旁热情地慰问我们。那时红枣刚刚成熟，老百姓每人手里都托着一盘子枣子，高声喊着：“同志们，辛苦了！吃红枣吧！”我们都点头致谢，谁也没有动手拿一颗。因为我们知道革命的队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但是我们深深地体会到陕甘宁边区的人们是真诚拥护我们的，真是“一颗枣儿一片心啊”！

怀念令人崇敬的三位大姐

蔡畅、邓颖超、康克清三位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大姐”，在近几年里相继去世了。但是，她们并没有离开我们，她们那熟悉的身影仍时时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她们那朗朗笑语，常回响在我们的耳畔；她们的思想、智慧和卓越精神，继续闪耀着璀璨的光华，鼓舞着我们前进。

1944年，我离开战火纷飞的冀南敌后游击区，行程两个月，通过两道封锁线，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组织上决定我到中央党校六部参加整风学习。第二年，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大”，毛主席作了《论联合政府》的工作报告。不久，在延安召开了全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会，以推动妇女工作在全国展开。因为我在鲁西和冀南根据地都是做妇救会工作的，组织上要我去参加这次会议。那天，我兴冲冲地赶到杨家岭，见到了彭总的爱人浦安修，1941年在太行山我就认识她了。她向我一一介绍了在那儿等待去参加会议的著名妇女运动领导人，当时最引起我注意的是蔡畅、邓颖超、康克清三位大姐。蔡大姐身材俊秀，两眼炯炯有神，穿着上黄下绿的女工服，在女同志中往来说笑，十分活跃；邓大姐比蔡大姐略年青些，面孔丰润，穿着上蓝下黑的女工服，显得和蔼可亲，蔡大姐亲切地叫她“小超”。我在敌后做妇女工作时，已经是农村妇女打扮了，进了陕甘宁边区就剪掉了梳在脑后的“发节”，到了延安也换穿了偏扣腰扎细带的“延安服”，二位大姐与众不同的装束，给了我一种特别新颖的印象。康克清

大姐则穿着一套深灰色的延安服，她当时是解放区儿童保育工作领导人，结实的身材，红扑扑的面膛，显得那么年轻、纯朴。我早知道，这三位大姐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不屈女战士，蔡、邓二位大姐又分别担任党的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崇敬和爱戴之情油然而生。从杨家岭到开会的地方，还有一段路，我们坐上了延安少有的汽车——大卡车。邓大姐先登上了车，站在中间招呼着后面的同志，我们随之也都爬上车，挤站在一起。开车前，周副主席突然来了，他笑着看我们都上了车，好像担心大家坐不稳的样子，最后他和蔡大姐也上了车。我在车上非常兴奋，一方面因为和周副主席及三位大姐同坐在一个车上，还因为我在犬牙交错的敌后游击区参加反扫荡时，都是远远地看到日寇的汽车和坦克在那里猖狂，这是抗战期间第一次坐上自己的汽车啊！开会时邓发同志代表党中央表示祝贺，传达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三位大姐夜以继日地工作，与来自各解放区的妇女干部亲切交谈，调查研究，具体指导，并作了重要发言。会议赞同蔡畅同志的意见，确定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号召解放区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努力支援前线，迎接最后的胜利。这次会议，成了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会议选举蔡大姐任中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大姐任副主任。从此，她们代表党中央领导了全国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卓越贡献。会议开完后，我们在中央机关一个小食堂就餐。1983年，我重返延安参观毛主席故居时，才知道这个小食堂就在毛主席居住的窑洞下面。

1947年，中央召开了“土地会议”，邓颖超同志在会议上提出了全党做妇女工作，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我在省委听了传达并参加了讨论。有一天，省委书记王鹤寿同志告诉我们，蔡大姐

要到北安检查工作。那天，到车站欢迎她的女干部很多，蔡大姐走出车站时，我们都围了上去，喊着：“蔡大姐好！”蔡大姐也高喊着回答：“同志们好！”她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不知疲倦。我们先向她汇报了在土改中发动妇女的情况。因为六区群众发动得较好，她要亲自下去看看，我们非常高兴，又担心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她身体受不了。她到六区后，住在奉天屯一个雇农家里。看到妇女群众参加政治活动和生产的积极性那么高，她十分兴奋，坐在炕头上与一些妇女积极分子彻夜交谈，耐心讲述土地改革、妇女工作的指导方针和革命道理，并热情地参加群众活动。蔡大姐在北安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是她那特有的风采和那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深深赢得了群众的敬佩。六区干部群众纷纷送去自己用土枪打的野鸡和自己做的粘豆包，以表慰问。以后，奉天屯一带的干部群众一直对她念念不忘。1948年底，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在东北解放区的沈阳召开。这时正是全国解放前夕，妇女革命运动已经在全国汇成巨流。李立三同志代表中央参加了这次大会，刚从国外回来不久的李德全也赶来参加了。黑龙江省委派我去参加，我还准备了一份黑龙江妇女工作情况的书面报告。大会上，我又见到了蔡、邓、康三位大姐，并热情地互相问候。她们要主持会议，工作异常繁忙，仍时时关注着各地代表反映的情况。蔡大姐因刚去过北安，见到我很是亲切，详细询问了那里的妇女工作和土改情况，我把书面材料交给了她。大会上我与三位大姐接触较多，进一步领略了她们的风采：蔡大姐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富有鼓动力；邓大姐沉稳平易，细致周到；康大姐则朴实刚毅，处事果断。这次大会开得热烈隆重。在第二年春天于北京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华全国妇女民主联合会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妇

女运动从此迈入了新阶段。会议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动广大妇女，彻底推翻三座大山，迎接全国解放。蔡大姐担任全国妇联首任主席，邓大姐任副主席，康大姐担任了常委。1950年秋天，全国妇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妇女代表会议，规模宏大，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妇女代表汇聚一堂，气氛极为活跃、热烈。我代表本溪市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仍由蔡、邓等几位大姐主持。在会上，我初次见到了杨之华（瞿秋白的爱入）、帅孟奇同志，还见到曾在解放区一起做妇女工作的几个战友，大家都特别激动。会上印发了一本各地做妇女工作经验的小册子，我写的妇女识字班的文章也在里面，大会还组织了经验交流。蔡、邓、康三位大姐在紧张操劳之余，常常到代表们住的地方探望。邓大姐见到我时，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看到了你写的本溪妇女识字班的文章！”我为自己的文章能为邓大姐关注而高兴，更为她如此好的记忆力而惊讶。蔡大姐怕代表们菜少不够吃，特地指示要增加一个菜。有一天休会，我们过去就认识蔡大姐的几个同志到她家去看她，她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留我们吃了便饭。大会即将结束的一天晚上，蔡大姐来到代表驻地通知我们，晚上有晚会，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晚会开始前，我们都在会场坐好，睁大眼睛看着前排。一会儿，毛主席、少奇同志、朱老总、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蔡、邓、康等大姐陪同下从前门进来了，大家都站起来热烈地鼓掌。当时，我们真想跑到前面去看毛主席，因为蔡大姐早就告诉我们要维持秩序，只得脖子伸得长长地向前排张望。演出的节目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由王文娟、袁雪芬主演。她们的演出是那么的精彩动人，毛主席几次高兴地鼓掌。晚会结束后，代表们回到宿舍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虽然我参加过一些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的大会时能看到三位大姐熟悉的

身影，但直接聆听她们教诲的机会就很少了。（1958年，我给蔡大姐写了封信交全国妇联转送，信中谈了自己的一些思想状况，很快我就接到她的回信，并要我过几天到北京医院门诊部去找她。我去后，她已看完病正在等我，见到我即热情地挽着我的胳膊说：“你还以为我不记得你了呢……”她要我到家去谈谈。我和她一起坐着她的车来到中南海她的家中，她耐心而诚恳地和我促膝谈心，交流思想，并留我在她家吃午饭，是同李富春同志和他们才从苏联回国的女儿一起吃的。蔡大姐看我有点拘束，饭后拉着我到院子里散步，边走边告诉我很多花草树木的名字。



20世纪60年代和钢院毕业生合影

临别，她又派自己的车子将我送回了家。这次谈话，给了我

极大的鼓励，使我能够战胜以后遇到的各种困难。当时，我丝毫不感觉不到她身居高位，只觉得眼前是一位无比可敬可亲的大姐。蔡大姐的侄女蔡妮同志〔蔡和森烈士的大女儿〕和我是邻居，她每逢年节去看望蔡大姐时，我总是托她代为问候，她也常带回蔡大姐的致意。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遇到问题和困难时，还曾得到过邓大姐的关怀。几位大姐对一位妇女干部的深切关心，体现了她们的伟大人格，三位大姐领导新中国妇女运动的卓越风范和伟大功绩，将在历史的长河中万古留芳。

以上内容节选自林楠同志自述材料

林楠同志革命奋斗的一生

林楠又名林秀蓉。女，汉族，山东省东平县人，生于1918年3月。1937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5月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作，为首位学校党总支书记。1956年定为行政12级。1982年12月离休，老红军待遇。



晚年的林楠仍在学习

一、早年参加革命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祖国处在最危险的时刻。

林楠同志虽然出生在地主家庭，但她从青年时期起就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刊，接触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在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得到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培养，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她向党组织表示：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坚决抗战到底。时年 19 岁。

1937 年至 1938 年，在东平县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938 年秋至 1944 年 5 月，历任八路军山东第六支队二团政训处宣传干事；鲁西妇救会常委；冀南三分区抗联秘书；永平县抗联主任。1944 年 5 月至 1945 年 9 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六部学习，参加整风。1945 年冬至 1953 年 5 月，历任北安中心县委（相当地委）宣传部长；本溪市委妇委书记；哈尔滨工业大学党总支副书记；沈阳市委宣传部副书记。林楠同志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的历练，革命意志更加坚定，群众工作经验不断丰富，解放后被人民群众誉为“三八式”老革命或“三八式”老干部。1953 年 5 月来我校工作。

二、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1937 年卢沟桥事变。抗日的烽火震撼了全国人民，在这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林楠同志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她参加了抗日救亡协会（这是万里同志在山东东平创建、领导的抗日组织，从此林楠与万里同志建立起志同道合的革命友谊。之后她有困难、有问题愿意向万里同志汇报、求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活动。她在鲁西北地区做妇女工作，用多种文艺形式（演戏、跳舞、唱歌等）宣传抗日；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救亡工作；组织建立县级妇女救国会；动员学生参加战地服务团；发动妇女慰问、声援抗日将士，祭奠牺牲烈士；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激发群众坚持抗战到底的斗志

和决心。

1938年日寇向鲁西北中心城市进行围攻扫荡，林楠同志转入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被编入八路军山东第六游击队支队二团做宣传工作，成为一名八路军女战士。驻军在老乡家里，地上铺着干草，夜里睡觉不脱衣服，天冷就把自己的棉大衣盖在身上，生活非常艰苦。她经常到连队去讲解形势和任务；教唱抗日歌曲；教战士识字，学习文化；办油印小报，表扬好人好事；宣传军民团结、官兵平等，鼓舞士气。还做民运工作，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支援抗日游击战争；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是革命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组织军民联欢，利用各种集会扩大抗日的影响，在泰肥山区、平阿山区泰西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壮大队伍，巩固扩大游击区和根据地。

1944年日寇进行垂死的挣扎，以“铁壁合围”的方式频繁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军民团结一致，对敌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抗日胜利的黎明即将到来。这时林楠同志得到了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在党组织精心周密的安排下，离开战火纷飞的冀南敌后游击区，经过敌人的两道封锁线，长途跋涉，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和一根小竹棍儿，每天要走几十里路，最后一天走了七十里，历时两个月终于到达延安。在延安参加了学习和整风，她认为：这次整风对自己增强党性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提高了马列主义、政治思想水平，从理论上奠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她在延安期间，迎来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进一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时也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使她受到极大鼓舞。

随后，东北就成了国共两党争夺的战略要地，到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于是林楠同志报名参加干部团

到东北去！又是跋山涉水，徒步行军离开延安，有时一天行走90里，行军近两个月到承德，才乘上火车到达目的地北安。途经沈阳时，见到了彭真同志，他向干部团全体同志指出：国民党在大量收编敌伪残余和土匪，到处抢占地盘，要求大家迅速到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军队建立政权，迎接更加激烈的斗争。

1945年的北安原是抗日联军后方基地，曾是黑龙江省会驻地，当时已是黑龙江工委所在地，林楠同志是第一批分配到北安工作的。北安的斗争形势十分尖锐，外部斗争激烈，内部人员复杂，北安中心县工委成立后，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开展工作。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宣布接管伪政权、解散维持会。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打击汉奸特务敌对分子。取缔吸毒，解散妓院，举办感化院，教育受害人员。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克服日伪奴化思想，清除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影响。在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打击封建势力，培植农村、农民基础。整顿内部，培养干部，秘密发展党员，主办军政干部学习班，吸收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林楠同志时任北安中心县工委宣传部长，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将北安县建成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林楠同志在山东东平中学毕业，在济南女师二年肄业（因1937年日寇侵占济南），在当时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爱国知识青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曾参加开办抗日小学，举办抗战日报鲁西北妇女专刊，组织各种学习班、识字班、培训班等。她在建国前解放区妇救会、抗联、妇委会主要从事妇女宣传工作，为抗日救国做出优异成绩。1944年在延安参加了全国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筹备会，首次见到妇女运动的领导人蔡畅、邓颖超、康克清。1948年在沈阳参加了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

1950年在北京参加了全国妇女工作会议，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妇女代表会议。由此可见，林楠同志为发动妇女投身党的革命事业和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正在创建初期，倍加艰辛，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施工建设，林楠同志来校工作时，办公用餐住宿还在清华园，在新的岗位上，边建设边工作，从无到有，进入了艰苦创业的新领域，也开始了她人生的新阶段。

三、长期从事党务工作

我校1952年4月建校，10月成立临时党支部，12月中共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第一个党支部，直属中共北京市委领导，时有党员49名，其中学生党员16名，教职工党员33名。1953年3月召开中共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第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宣布中共北京市委批示的学院支部委员会组成，魏景昌任支部书记，杜若牧任支部副书记，7月批准增补林楠任支部副书记。1953年10月中共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支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总支委员会，林楠任总支书记。1956年4月召开中共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党委会，林楠任党委副书记。同时，被选为出席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四年来，随着党的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党的建制由党支部到党总支再到党委会，林楠同志历任党支部副书记、党总支书记、党委副书记。从1956年4月到1980年8月，由第一次至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连选连任党委副书记，历时24年，这在钢铁学院党建工作历史上也是仅有的，从34岁到62岁，28年一直在党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顺利还是困难时期，她总是坚持党性原则，忠实于党的事业，遵守纪律，

积极、主动地开展党建工作。

四、党建工作卓有成效

林楠同志工作踏实，认真负责，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专职专心从事党建工作。她经常约党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党员、积极分子个别交谈或召开座谈会，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对工作有布置有检查，深入细致，她经常拟定提纲，让工作人员下到基层调查研究，掌握党员思想动向和党支部活动的第一手材料，实事求是掌握第一手材料，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使党组织成为推动学校工作的中坚力量。到1966年，使党的组织，从一个党支部发展到十几个党总支，党员从33名发展到800多名（不包括学生党员），这都和林楠同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工作分不开的。还有一点值得提起，1956年3月，在北京市委批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成立党委会前夕，党总支召开全体学生党员大会，号召克服保守思想，以积极慎重的态度发展党员。增强党组织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会后各学生党支部先后发展80名具备条件的积极分子入党，说明学校党建指导思想正确，平时党建基础工作踏实。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党建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早在1956年3月就发展了顾静徽教授（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首位物理学女博士，曾培养了以吴健雄为代表的杰出物理学家）、方正知教授（1949年美国密苏里大学硕士毕业，1950年回国，1962年中央抽调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校敢为人先，首次吸收了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对稳定我校高级知识分子队伍，引导他们靠近党组织，认真改造旧思想，顺利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注重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林楠同志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自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她讲党课作报告，宣讲党员标准条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充分发挥党员、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在教职工中，组织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教育思想，学习“两论”指导教学，进行思想改造，促进思想革命化。要求党员“面向基层，面向教学”，团结党内外同志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既要教书又要育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她主管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在学生中开展“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三好运动，通过评选三好学生、先进集体，推动工作深入发展。进行又红又专的思想教育，要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树立崇高的目标理想，勤奋学习致力成才。号召毕业生“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她对文娱、体育工作也非常关心，多年来学校在这方面学生的基础好成绩突出，在高校有一定的声誉，参加北京市组织的比赛都要求进行充分的准备，如参加文娱汇演排练到深夜，林楠同志亲自去看望大家并给予鼓励：要提高要完善，也要谦虚争取好成绩。到1970年，学校已培养毕业生13500多人，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为冶金工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林楠同志功不可没。

五、关心群众生活

林楠同志性格沉稳、作风朴实，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1962年6月，学校处于生活困难时期，她得到教职工的拥护，当选为工会主席。她深入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密切了党群关系。林楠同志以身作则，把群众的安危冷暖记在心头，“文革”期间，学校1971年2月在河北安平筹办“五七”干校，1980年停办。第一年她组织领导

负责筹建“五七”干校，同时也是“五七”战士，同教职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在农村插队三个月。之后连续八年，她不顾路途远路难行，几乎年年都亲自去干校看望“五七”战士，问寒问暖关心大家的生活，还住在干校。干校停办时，她特别关心有困难的同志，当时有八名教师、干部、工人，爱人户口在外省市没有工作，两地生活，干校存在时，他们团聚在干校，干校停办后回京有很大的困难，在林楠同志的关怀下，经过多次多方联系，终于在离京不远的涿州大型国营企业石油系统，安置了这些教职工及其爱人的工作，子女同往，他们的困难得到了非常满意的解决。多年后，他们仍念念不忘学校领导的关怀。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给唐山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震后林楠同志不顾余震、疫情的巨大风险，不顾领导和同志们的劝阻，毅然决定让司机开一辆面包车到唐山探寻慰问学校职工的家属。当时唐山一片废墟还在抢救人员，她的食宿都在这辆面包车上，被探望的职工家属深受感动，在校职工也放心了，他们都从林楠同志的行动中感到了党组织的无比温暖和关怀。

六、始终不忘初心使命

林楠同志在“文革”中深受“四人帮”极左思潮、极左路线的迫害，她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正确对待。粉碎“四人帮”后，她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离休后，她仍然关心国家的“四化”建设和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林楠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坚持党性原则，对党忠诚，事业心强，坚定理想信念。始终遵守党纪，党性强，作风正；始终为党的事业奋斗，矢志不渝；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崇高信仰。她坚信：“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只

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她始终不忘初心使命，直到晚年仍向党组织郑重表示：“我入党时即抱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我现在已经年老离休，但要做到老有所为，永远忠于入党时的誓词，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她在入党50多年时再次向党表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就是一位革命老干部的心声。

七、革命奋斗的一生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林楠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95年7月13日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77岁。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抗日救国、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党的建设及党的教育事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斗一生，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忠于党忠于人民，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她一生兢兢业业为党工作45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她待人诚恳，谦虚谨慎，联系群众，平易近人，是我党的好党员、好干部，是我们学习的好领导、好榜样。

撰稿人：冯玉成 原北京科技大学人事处处长、校秘书长

2021年4月25日



卢焕云
LuHuanYun
(1904年—1976年)

卢焕云先生是一个有着正直廉洁清白的人格操守和庄严无畏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有丰博的科学理论知识和超强的科学研究能力的知识分子，一个有传统的仁爱孝悌礼义忠厚的知识分子，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却又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美德的知识分子

卢焕云简历

- 1920—1927年 上海中法国立工业专门学校 读书。
- 1927—1929年 北京温泉中学，河北省立八中 教师。
- 1929—1935年 比利时补习 比利时国立列日大学 采矿系获采矿工程师。
- 1936—1937年 上海光华大学土木系 教授。
- 1937—1949年 先后在云南大学、建设厅化验所、测绘室 任职。
- 1949—1950年 国立交通大学采矿系 教授。
- 1950—1952年 清华大学采矿系 教授。曾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政治协商委员、河北人大代表、河北省人民政府工业顾问等职。擅长采矿方法、矿山运输、通风排水等。
- 1952年—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采矿系任系主任 教授。

生平介绍

河北省易县人，生于1904年9月。1935年毕业于比利时国立列日大学采矿工程科。回国后，曾任云南省江新金矿公司总工程师兼经理，国立云南大学矿冶系教授兼系主任，华东钢铁公司总工程师兼马鞍山铁矿矿长，清华大学教授，华北大学教授，北京钢铁学院采矿系教授、系主任。

1938年，卢焕云教授曾对云南蒙自县江外一带金矿进行勘查工作，编写地质矿产报告。1957年将该报告交给云南省工业厅，对云南省的矿产开发做出了贡献，受到该厅的奖励。

在教学方面，卢焕云教授从1950年到1952年间，在清华大学和华北大学先后编写和讲授《画法几何》、《凿岩爆破》、《采矿学》、《金属采矿学》、《矿山排水》、《矿山运输》、《矿内支柱》等课程。1954年曾编写和讲授《矿山企业生产经济组织与计划》课程。

在科学研究方面，卢焕云被聘为河北省政府工业顾问，对河北省工矿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与他人合作调查河北省几个县的地质矿产，并对灵山煤田、邵明煤田、章村煤田的开发工程、开采方法、运输、通风、排水等技术问题提出了意见。尤以对邵明煤田的排水问题，“矿坑积水来源和防水措施”提出了有益的改善途径。

采矿系第一任主任：卢焕云

卢焕云，生于1904年，河北易县人，1935年比利时国立列日大学采矿工程系毕业。

自1936年起，卢焕云先生曾担任上海光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及系主任、云南省政府调查设计委员会委员、建设厅名誉技正、江新生矿公司总工程师兼经理、省地质矿产调查所所长、云南大学矿冶系主任、华中矿务局总工程师兼马鞍山矿长，唐山工学院、北洋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工学院采矿系教授，1952年8月来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任教，是钢院采矿系第一任系主任，河北省人大代表、政协常委。

1937年，卢先生在云南省开展了嵩明宜良两县煤田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对于燃料缺乏的云南省来说贡献甚大。同年，在云南蒙自县属头塘发现煤矿和在禹门发现石墨矿，这是云南省最早发现的石墨矿床。1938年，在蒙自县属江外一带发现金矿，蕴藏之丰、价值之大、世界罕见。1941—1944年担任云南省地质矿产调查所所长期间，在云南省开展了大量地质调查工作，1958年将自己整理的《云南省各种矿产分类编》初稿无偿献给国家，为云南省矿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选自石新明著《满井村》

北科大校园人物录

冶金工业出版社

做好工作，搞好教学

——一位受人敬爱的老教授

采矿系有一位面色红润、头发斑白、体格健壮的老人。起初，同学对他的讲课很有意见，感到重复、啰嗦，听不起劲，可是后来同学们都非常敬爱他。对他教的课也感到很大的兴趣，同学们反应说：“我现在才了解咱们系主任……真好”“非常认真”。这位老人就是卢焕云教授。虽然他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可是他的性格是年轻的，活跃的。他仍然象小学生那样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虚心学习。为了教好课，他曾到矿业学院向莫洛佐夫专家学习。他为了找材料，查了大量的政治性、技术性书籍，跑了很多地方才编成了一本内容丰富的讲义。他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教课质量，几乎把全部内容、公式和大量数据都记忆下来直接的连续讲授（这一套对于我们经常对功课内容和公式“记不住”的小伙子来说，真是惭愧）。卢教授为了能够帮助同学实际学会编制循行图表，他自己事先认真的做了一遍……。从许多方面，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和同学的平时接触中都可看到卢先生总是以身作则，严格认真的对待学生。他从不责怪同学，总是检查自己，批评自己，耐心地教导同学。

卢先生始终是把教学放在第一位。他除了在我院教课担任行政工作外，还要在矿业学院讲课；同时他又是河北省人民代表，要开会、视察，有时还要参加一些重要的技术会议等。但他从不

影响教学。在讲课中他很注意联系实际，很能解决目前矿山存在的劳动组织上的一些实际问题。所以咱们去矿山工作的老大哥们总写信回来向他要讲义和要材料，请教他许多问题。

卢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象他自己对我们所说的“不要吝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人，这样的好老师，我们都十分热爱和尊敬他。

周成浦 矿 57-4 学生

1957 年 1 月 11 日 《北京钢院》第四版

山高水长

——怀念三祖父

总是忘不了三爷。

三祖父卢焕云，字倬章，1904年出生于祖籍河北省易县小坎下村，1976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2岁。三祖父是曾祖卢延龄（字泽周）的次子，家族大排行是我的三祖父。

我小时候住在保定，1958年后来到天津，三爷总来开会，后来知道了，三爷是河北省人大代表、政协常委、政府工业发展顾问。那时还小，只觉得三爷和爷爷长得很像，有时总是叫错了。小小的我知道，三爷是个很了不起的教授。如果说我的祖父卢星文（名焕斗）在我幼时的印象中是慈祥并有威严，那么三爷的印象则是慈祥并更亲切。更多的时候，他像是一个亲切的朋友，温和平等的和我交谈。“治安，把你的功课拿出来让我看看好吗？”“谢谢你”，这样的话语六十多年来还一直回响在我耳边，亲和，温润，像轻轻的温暖的风。

听祖父和父辈讲述过许多三爷的事情。

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曾祖卢延龄（字泽周）的支持下，三爷离开河北的小山村外出求学，毕业于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校，曾任保定省立八中校长、河北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后到法国和比利时留学，周恩来总理也在那批留学生的队伍中。三爷攻读的是采矿地质专业，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多次获奖学金并获得比

利时政府颁发的金质奖章。

怀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志向，三爷学成回国。但面对的是满目疮痍和无休止的战乱。在昏聩肮脏污浊腐朽的社会现实中，三爷坚守着知识分子正直清廉的人格操守，耿介不阿的独立思想以及不妥协的抗争精神。

钰叔（堂叔卢钰，三祖父卢焕云之子）曾听地质学家袁复礼说过，三爷回国后先是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后又曾到云南任职，以其学识资历兼有八、九个教育研究机构的职位，如云南实业厅技正、云南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教授等，并且得到了“云南禁烟督办”的聘任。在他人看来，这是求之不得的大肥缺，上午刚发布，下午就有人巨资厚礼行贿。三爷像避瘟疫一样马上买了飞机票，将我三祖母（于轶凡）和只有六岁的堂叔（卢钰）母子二人送上经重庆到上海的飞机。那是架小螺旋桨飞机，三祖母在机上呕吐得死去活来，最后是被绑在座椅上才得以到达。随后三爷自己也择机离开了云南。由是，袁复礼很敬重三爷的人品，两家成为几十年的故交。



三祖父卢焕云、三祖母于轶凡

南京国民政府邀请三爷做政府土地资源委员会委员，这也是别人梦寐以求的肥差，三爷力辞不就。

国民党要员汪精卫非常欣赏三爷的才智，一心要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三爷，三爷闻讯，马上逃离南京。火车开车前，汪精卫派员赶到车站送行，从车窗外递上一个糕点盒，称几样点心请路上充饥。三爷用力将糕点盒推出车窗外，盒子掉在站台上散开，竟是一地的钞票。

日本投降后，三爷在马鞍山矿任总工程师，上方委三爷以矿长之职，三爷又推辞不就，并借故迅速离开马鞍山矿。

1949年三爷任天津北洋大学采矿系教授并兼任唐山交通大学采矿系教授，院方拟予以校长之职，三爷遂又立刻请辞。



三祖父、三祖母、堂叔卢钰、卢鑑、堂姑卢铃

新政权建立前夕，三爷曾到台湾省探矿，为祖国宝岛的矿业发展作出大贡献。国民党政府委以探矿厅厅长之职，三爷力拒，并火速回到大陆，迎接新中国诞生。

钰叔（堂叔卢钰）讲过这样一个细节：自1936年别后，解放初，爷爷和三爷自晋察冀军区和国统区重逢北京，已是十几年未见，悲喜交集，千言万语。开头几句爷爷就问三爷，你入国民党没有？你当了多大官？你存了多少钱？三爷坦然回答，没入国民党，没当大官，也没挣到钱。这就是我正直清廉清白的三祖父。是高高的山。挺拔。

三爷深受西方教育，同时也固守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品德。三爷与爷爷兄弟二人，真是“兄友弟恭”，三爷对爷爷又真是“事长兄如父”。我曾多次看到，吃饭时，只要爷爷放下筷子，三爷必然停箸，并关切的问“大哥吃好了？”之后再继续进食。走在路上，三爷会一会儿为爷爷整理一下围巾，一会儿又在爷爷身后为他掸掸衣服，尊敬之情是那样真切。

对子女，对孙辈，三爷极和蔼亲切，真是蔼蔼长者，和煦如风。在钢院那不算大的居室中，我多次感受到三爷的温情。吃饭时，不停地为我夹菜，只怕我吃不好。看着我吃，眼里饱含关爱之情。一次，我只是多吃了几口榨菜，三爷马上对铃姑（堂姑卢铃，三祖父卢焕云之女）说：“卢铃，治安爱吃榨菜，再切几块”，并非要看着我吃光，辣的我眼泪直流。

三爷对我的学习很关心，我小的时候，一见面就要看我的作业。他多次讲自己笨，不如你这个孙子聪明，鼓励我立志读书。还多次讲自己中文底子不好（当然是谦虚），有不少书想译，有本比利时的《球体力学》，译过来后由我来润饰文字。

三爷在生活上极为节俭，甚至到苛刻的程度。他上世纪二十

年代留学时的大衣皮箱一直用到病逝；蓝布中山装也都洗的褪色发白；吃水果尽量买处理的；火柴在点燃一个灶眼后火柴棍不会扔掉，以备再引燃第二个灶眼。但三爷对亲友却慷慨万分。据五姑（二姑卢锦，家族大排行五姑）讲，三年“度荒”时期，三爷将自己每月两条高知特供的纸烟按月送给爷爷，一直送了多年。对生活发生困难的亲属，出手就是数百元的支持帮助。在我的记忆里，三爷就多次给我家财物。也是在“度荒”时，三爷在津参加政协会议，会上发的一盒鸡蛋都送到我家，说让孙子们补补身体。

这就是我仁爱节俭忠厚的三祖父。是长长的水。仁厚。

三爷治学刻苦谨严，在学术上有极高的造诣和成就。

五姑（卢锦）在纪念三爷98周年诞辰的文字中引述了祖父卢星文（名焕斗）对三爷刻苦精神的评价：世上的人大都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之所以犯错误办蠢事，都在于此。只有他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笨，笃信“笨鸟先飞”这条古训，做任何事时，都比别人多花时间，多下功夫，多想办法。他在学习上，花费的时间最多，也特别认真用功。

钰叔（堂叔卢钰）在纪念文字中也讲到，三爷在国外留学时，坚持半工半读，打工挣钱。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主要靠获得奖学金，而按规定只有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才有获取资格，三爷刻苦学习，每次各科的考试成绩都是第一。

解放后无论是在清华还是钢院任教，三爷每晚都要认真备课，我经常是在夜半梦醒时还能听到三爷在书房轻轻的脚步声。他讲课时从不看教案，所有的公式、数据、资料及具体演算都是脱口而出，信笔写出，一气呵成。严谨，明晰，透彻，清楚。由于经常在书房踱来踱去，书房地板的红色油漆都磨没了，留下一条脚

步踏磨的痕迹，久而久之，这条磨白的地板条痕已经明显的低凹下去。



三祖父、祖母、堂叔卢钰、卢鑑、堂姑卢铃

三爷当年学成毕业时，正逢列宁在苏俄推行新经济政策，三爷也曾被邀去俄，但怀着“科学救国 工业救国”的志向，三爷还是毅然回到了国内。新政权建立后，来中国支援建设的大批苏联专家，都是当年三爷那些留在苏俄的同学的学生，三爷实际上是这些援华苏联专家的老师辈。惜旧中国黑暗腐败，新政权“运动”不断，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右斗争……，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三爷空有满腹才学报国之志却无从施展。“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三爷更是连教研的工作都全部终止。逆境中三爷选择了留学欧洲时曾深入过的数学研究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艰

难而广阔的研究天地。研究成果受到华罗庚的老师熊庆来及苏步青教授的赞赏和肯定，三爷有了难得的喜悦。但就是这个成果也未能发表，在红卫兵抄家后所有的文稿资料都无影无踪，只能空留遗憾。

可提及的还有两件事：新中国成立后，三爷在清华教书，院校调整后，到钢铁学院任教，任采矿系主任。时地质学家李四光任地质部长，力邀三爷到地质部做技术部门的领导工作，三爷婉拒，称做不了官，只能胜任教书。

周恩来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钢院参观，陪同翻译受专业限制，不能胜任，总理当时就说：“我的一个留法同学卢焕云在这里吧？请他来吧。”已回国数载很少使用法语的三爷被邀做同声翻译，极受好评。

我常想，倘赶上天青日朗的好年代，三爷该能为国为民做多少有益的事情啊。惜哉！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三爷被打成“国民党走狗”“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残酷的迫害。1966年寒假，凛冽的北风刮得正紧，在钢院露天冰场外，三爷指着远处的一座楼说：“他们在那斗我，硬说我是国民党，还打人……”，目光很凄然。虽然当时我已快二十岁了，但心里还真是不懂，“好人为什么挨斗呢？共产党为什么打击自己的教授呢？”三爷听后，紧拉着我的手，他的手特别凉。

1976年，三爷去世了。每当提起三爷，爷爷总是陷入深深的沉默叹息中。

三爷是个知识分子，一个有着正直廉洁清白的人格操守和庄严无畏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一个有着丰博的科学理论知识和超强的科学研究能力的知识分子，一个有着传统的仁爱孝悌礼义忠

厚的知识分子，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却又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美德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了。这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是我们民族的悲剧。三爷没有能看到“四人帮”的垮台，没有能感受到科学教育的春天。一想到这里，我内心很痛。

1978年春我到南开读书后，每有老教授上课，我都会马上想到三爷。有时真恍惚是三爷站在讲台上，但三爷过早的离开了我们，至今已经快四十年了。

2012年清明，在北京温泉公墓给爷爷奶奶扫墓后，在铸姑（小姑卢铸）鏞叔（小叔卢鏞）的带领下，我及家属来到了三爷三奶奶长眠的冷泉公墓。在墓碑前，我们献上了一束鲜花，深深的鞠躬。抚摸着墓碑上三爷的名字，我的耳边清晰地回响起六十多年前三爷的声音：“治安，把你的功课拿出来让我看看好吗？”“谢谢你”，是这样的亲和，温润，像轻轻的温暖的风。我的眼睛湿润了。

三爷，您不是说您的《球体力学》还要我润饰文字吗？

三爷，您不是说您还要和爷爷再回到易水河畔的小山村吗？

三爷……

唯有高高的山。唯有长长的水。

山高水长……

三祖父有二子一女：长子卢钰，现居京城，有一女；次子卢鑑，现居美国，有二女；女卢铃，已病故，有一女。

三祖母于轶凡，1910年出生于江南一名门大家，知识女性，2002年病逝于北京，享年92岁。

卢焕云之孙 卢治安

2013.09.07



钱振彭
QiangZhenPeng
(1917年—2001年)

我国应用化学光谱学家，光谱、化学分析老前辈。钱先生早年抱着一片爱国赤诚之心自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生产和教学第一线工作，是我国光谱分析这门学科初创时期学科带头人之一。他尤其在钢铁冶金分析、光电直读光谱分析以及光谱分析基础理论研究诸多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钱先生胸怀豁达，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生活俭朴。

钱振彭简历与生平

- 1934—1938 年 东吴大学物理系 理学士
1938—1945 年 昆明铁道局 昆明中央机器厂副工程师
1945—1947 年 上海机器厂 秘书兼总务组长
1947—1948 年 美国佛省理工学院 硕士
1948—1949 年 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 出纳（临时工作）
1950—1952 年 中央重工业部材料所 教授
1952—2001 年 北京钢铁研究总院，北京科技大学 教授

江苏苏州市人，汉族，生于1917年1月，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物理系，1948年于美国佛尼吉亚州立理工学院（VPI）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62年调来我校，任专业副教授、教授，曾任分析化学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重工业部上海材料试验所工程师、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分析室副主任及高级工程师和中国金属学会理化检验学会及光学学会光谱学会副理事长。

钱振彭教授一直从事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曾为物化专业讲授《发射光谱分析》课程，主编了《发射光谱分析》、《稀土元素光栅光谱图》、《稀土元素 ICP-AES 光谱图》等书。其主要研究课题有：采取多种技术联用解决痕量分析问题，重视新光源的应用、研究光源的作用机理等。四十年来，钱振彭教授为创始及推动发射光谱分析应用于我国工业生产，多有建树。

怀念钱振彭先生

编者按：自从我国光谱化学分析老前辈钱振彭先生过世之后，他的至爱亲朋，至亲好友和一些熟悉他的人都十分悲痛，以不同方式缅怀钱先生的一生。张锐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张锐，原核工业化工冶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分析室副主任、博士生导师、80年代《光谱学与光谱分析》常务编委。90年代退休后旅居美国，未退休前在国内就是钱先生的好朋友，退休后两人都在美国，联系密切。其对良师益友钱先生的过世特别怀念，下面是张锐先生从美国发来的信，可见一位移居国外的老专家还时刻怀念祖国、关注国内光谱分析事业的兴衰。

广政同志：

前托家弟智伯转达钱振彭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我目前寓美，钱先生逝世后他儿子钱圭白给我写信，告诉钱先生病逝过程：钱先生在去年十一月六日下午在家中跌了一跤，左腿不能移动，次日到医院检查，发现左腿股骨折断。医生建议手术，换一人工股骨，手术是入院后第三天进行的，手术过程很顺利，手术后一天就开始锻炼站立。但第三天忽然说话不清楚，同时吞咽食物困难，医生疑为中风。可能有食物误进气管，肺部感染，用抗生素控制。为解决营养问题，医生于十一月十九日在胃上开个小孔，把牛乳样营养液输入胃中。术后情况稳定，遂转入普通病房，做些锻炼体能活动。但十一月廿二日凌晨二时，钱先生忽然发烧，呼吸困难，

转入急诊，肺部于四时左右停止呼吸，随后心脏也停止了跳动。医生试用机械和药物激活心肺，都告无效，遂于五时十分左右宣告不治。

钱先生寓美期间，仍非常关心我国光谱事业。他常向我问起目前我国光谱工作现状，关心老同志的生活和工作，以及青年人的成长。更使我感动的是2000年间，他告诉我他家中存有多年《光谱学与光谱分析》杂志，问我在美的几位研究生有谁用得着。我说我的研究生林宇现正在纽约 Einstein 医学院做拉曼光谱和荧光光谱研究，于是他就将全部杂志寄给了林宇。林宇阅后认为我国光谱工作者在相关领域做了大量工作，该杂志对她很有帮助，收获颇丰。

钱先生非常关心我国光谱仪器生产，去年十月在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有如下一段话：“再说到我们光谱，我关心的是四个工厂：北京通县的北京光学仪器厂生产的二米光栅摄谱仪，北京二光造的光电直读仪及原子吸收光谱仪，上海厂的测微光度计，还有贵阳厂的光电光谱仪。这四家厂目前如何，你回去后请打听一下，再来时能否带我一些好消息”。这次圭白来信说：家父住院时，有时脑子中有幻觉，会讲起仪器厂的事情来，可能就是在想和您来往信中提到过的事情。

钱先生早年抱一片爱国赤诚之心自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生产和教学第一线工作，是我国光谱分析这门学科草创时期学科带头人之一。他尤其在钢铁冶金分析、光电直读分析以及光谱分析基础理论研究诸多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钱先生胸怀豁达，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生活俭朴。钱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感到无限悲痛。我在这里简略介绍了钱先生在美病情

及寓美生活片段，并希望您能在《光谱学与光谱分析》杂志或适当报刊发一讣告，以表达对钱先生怀念之情。

此祝

冬安

张 锐 原核工业部冶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2002年1月5日

深切怀念钱振彭先生

我国应用光谱学家、资深教授钱振彭先生因感染肺炎，医治无效，于2001年11月22日凌晨5时在美国加州医院逝世，享年84岁。遵照钱先生遗愿，将骨灰撒入旧金山外海。中国、美国一洋相连，他想游回中国，表现了钱先生满腔爱国之情。

钱先生1917年生于江苏无锡。1938年获东吴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应用物理学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先后在东吴大学、上海材料研究所工作，1952年冬调至钢铁试验所（钢铁研究院前身）工作，开始从事发射光谱分析工作，曾任化学分析室副主任。

发射光谱化学分析技术在当时是解放以来发展、应用最快的一种新技术，许多新建的特殊钢厂都用于作炉前快速分析。新技术上马急需培训技术人员，钱先生组织编写“发射光谱分析讲义”作为教材，以应开班教学急需，还为特殊钢厂组织工作组下厂交流经验、推广、提高光谱分析新技术（见物理学报15卷6期285页）。此外，钱先生还组织钢铁研究院的技术人员自己组装火花发生器，以应钢厂急需，努力从技术上、设备上，创造条件积极推广光谱分析新技术。

1962年2月调到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的前身）任化学系教授，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曾提出改进少用标准样品的部份曝光法为“连续曝光的分部曝光法”（1964年理化检验第4期10页及1981年理化检验第3期19页）。此外，为改进高温

合金中 Pb, Sn, As, Sb, Si 等五害杂质元素的分析, 曾发表“光谱痕量分析准确度的讨论”(1963年北京市物理年会上宣读, 见钢铁学院学术资料); 参考了当时苏联一些著作, 还曾组织编写“光谱分析光源对样品的蒸发和激发作用”(1971年在大冶钢厂举办的光电直读光谱分析会议上宣读, 见钢铁学院学术资料); 与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合作研制成 WZG200 型光电直读光谱仪, 分销在各特殊钢厂, 总共有 20 多台, 为使仪器尽早运转投入使用, 努力促成北京的两个特殊钢厂使用成功, 积极组织力量在北京钢铁学院及上钢五厂举办培训班, 力图推广新技术, 提高光谱分析水平。



钱先生主编的《稀土元素光栅光谱图》

为了进一步提高光谱分析的学术水平，又和黄本立、张功抒、张士通、高树桢、李玉珍等组织社会力量集思广义编写《发射光谱分析》一书，1977年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该书曾两次再版。结合实际需要，为珍贵文物的特种分析，开展研制新方法，曾发表“高频火花作少损毁样品的分析”（见理化检验1979年2期3页），又与王长庆等人合作编写《稀土元素光栅光谱图》及《稀土元素ICP-AES光谱图》（冶金工业出版社分别于1981年、1988年出版）。1981年在《原子光谱分析》1期上发表“激光与光谱分析”评述性文章，推进光谱分析的发展。

钱先生1988年退休，后旅居美国与其子一起生活。钱先生40年来始终致力于发射光谱分析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积极推广新技术，努力提高光谱分析学术水平，更致力于对年青教师的培养，甘为人梯、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求实学风受到众多学者的崇敬。他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知识的渴求精神更可贵，经常参加光谱学术会议，1993年曾从美国回来参加中国光谱学术报告会。钱先生培养的学生，现在都是各岗位上的技术骨干。

钱先生历任北京钢铁学院化学分析中心主任、分析化学教研室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成员、北京科技大学学位委员会成员；钱先生曾任中国金属学会理化检验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机械工程学会理化检验分会主任；他也是中国光谱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光谱学会副理事长，《光谱学与光谱分析》80年代第一副主编。钱先生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也是我国光谱化学分析学术领域的一重大损失。

撰稿人：孟广政、黄本立、鲁毅强、宋增福

北京钢铁学院钱振彭教授在五二所讲学

北京钢铁学院钱振彭教授4月24日在五二所作了《我国发射光谱分析工作的讨论》的学术报告。钱教授系统地介绍了光谱分析的历史,指出,在化学分析方面,仪器分析的比重愈来愈大,而在仪器分析中,发射光谱分析发展得最快,应用也比较普及。我国光谱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低,工作基础(仪器、标样、感光板、石墨电极等)比较薄弱,科技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不高等。这些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今后光谱分析的发展方向应朝着快速、精确、微(痕)量及自动化的方向发展。主要研究课题有:采取多种技术联用解决痕量分析问题,重视新光源的应用、研究光源的作用机理等。

李茂山报道



乔丕成
QiaoPiCheng
(1901年—1986年)

乔丕成同志是中国赴欧勤工俭学的首批学员，他与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等众多的后来的国家领导人相识，相处并共同战斗，并在后来的莫斯科东方大学、高级步兵学院与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共同学习、战斗。他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年代，他非常热爱教育事业，为我校的外语教育事业贡献卓著。他一生追随革命真理，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始终坚信党，坚信社会主义。

乔丕成简介

乔丕成，原名乔绍周，生于1901年，河北安平县人。

1919—1926年 在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并在1923年加入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团支部宣传书记、比利时中国留学生学会会长。

1926—1928年 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

1928—1930年 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任翻译。

1932—1933年 回国在西安高级中学和中山中学任教。

1934—1937年 杭州建设所化学肥料管理处技士。

1938—1940年 越南河内海防运输公司经理。

1941—1945年 云南昆明云南酒精厂、国立医药研究所工作。

1946—1949年 在昆明、杭州、安徽、上海等地时断时续就业。

1949—1952年 北京中国重工业部翻译。

1953年初— 调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任俄语教研究第一任主任

生平介绍

1919—1926年 在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并在1923年加入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团支部宣传书记、比利时中国留学生学会会长。



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旅欧留学生

——选自石新明著《满井村》

北科大校园人物录

冶金工业出版社

1922年2、3月间，中共旅法党员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相继迁居德国柏林，与中共旅德党员张伯简会合，组建了中共旅德小组；6月3日，经中共旅法支部精心准备，由旅德的周恩来，旅比的刘伯坚，旅法的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萧三、萧朴生、傅钟、郑超麟、尹宽、任卓宣等18名代表，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空地，召开统一的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大会，取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底，由旅法、旅德的中共党员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这些以拯救危难之祖国和人民的旅欧

党团组织及共产主义者们，不仅根据当时的形势，积极开展和参加了与无政府主义派斗争、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领导华工罢工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及实践；而且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出发，边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边利用欧洲的有力条件致力于干部的培养、提高和输送。



周恩来（左一）、邓小平（左三）、赵世炎（左四）等当时的青年，是在勤工俭学中诞生的“革命之星”。

乔丕成（左二）、杨杰（左五）则在学术上颇有成就。

乔丕成同志青年时代接受革命思想，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六年在法国及比利时勤工俭学期间，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敬爱的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与

聂荣臻、刘伯坚、李富荣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后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去苏联莫斯科东方社会主义劳动大学及步兵学校学习和工作。抗战时期，在越南海防工作期间，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与龙飞虎、邱南璋等同志密切联系，掩护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为党提供日军情报及运送物资，做了许多艰险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乔丕成同志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是教育战线上的一位老战士。他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刻苦钻研业务，积极改革教学，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做出了应有贡献。解放初期他在重工业部从事翻译工作，成功地翻译了“爆破工程”，是我国成型爆破方面的早期译作。直到晚年都孜孜不倦地学习，仍然关心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乔丕成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一生追求革命真理，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谦虚谨慎，团结同志，作风正派。虽然他在“文革”期间受到冲击，但仍坚信党，坚信社会主义。一九八四年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

编者收集整理

记俄文教研室第一任主任：乔丕成

乔不成，生于1901年，河北安平人，青年时代接受革命思想，1919年至1926年在法国及比利时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在巴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产生了书记局，由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负责宣传，尹宽任负责组织，傅钟、邓小平负责其他有关事宜，会上决定改《少年》为《赤光》。

1924年夏，周恩来从柏林到巴黎，路经比利时沙洛瓦时，曾到比利时社会党人创办的沙洛瓦劳动大学停留，检查旅欧青年团旅比支部的工作，听取了旅比支部书记江克明和支委乔丕成等同志的汇报，并应邀作了两次报告。这时，乔丕成正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担任比利时中国留学生协会会长。

1929年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顺利，以广东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急需大批领导干部。乔丕成与聂荣臻、朱德、邓小平等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优秀党团员百余人被中共旅欧支部分批派到苏联学习。乔丕成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后来到高级步兵学校工作。其中，在步兵学校担任翻译期间，帮助正在步兵学校学习的刘伯承等同志掌握苏联军事工程。

抗战时期，乔丕成担任越南海防左昌公司经理，接受周恩来同志指示，与龙飞虎、邱南璋、罗理实、连贯等同志密切联系，掩护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为我党提供日军活动情报及运送物资，

做了许多艰险的工作。

解放初期，乔丕成在重工业部从事翻译工作，他翻译的《爆破工程》是我国成型爆破方面的早期译作。1952年，乔丕成同志来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担任俄语教研室第一任主任，为我校外语教育事业贡献卓著。他非常热爱教育事业，一生追随革命真理，从不计较个人名利。虽然“文革”期间受到冲击，但仍坚信党，坚信社会主义。

1984年，83岁的乔丕成教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中这样写道：“我今年83岁了，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党哺育了我，教育了我，培养了我。反躬自问，我为党做的太少……目睹我们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不断提高。”

——选自石新明著《满井村》

北科大校园人物录

冶金工业出版社

耄耋之年遂一生心愿

——访新党员乔丕成老先生

“七一”前夕，在一片老式的红砖楼房的一套住宅里，记者拜访了新近入党的八十三岁高龄的乔丕成先生。只见乔先生银发许许，虽刚因病行动不很方便，但气色很好。落座后，乔先生风趣地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吗！”说着就开心地笑了。

乔先生为何这么高兴？按他自己的话说，“我遇到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事”——1984年5月14日，外语系第二外语教研室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通过了乔丕成老先生的入党申请。他对记者说：“那天我参加完支部大会回到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人世沧桑数十载，我这一辈子顺境逆境、沉浮坎坷，而最终能投入到党的怀抱，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归宿”。

“我出生在农村。清朝末年我看了一些梁启超的书，受到了一定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1917年在保定念书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这给我震动不小。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第二天我来到北京，听别人议论头一天北京的学生反帝、反封建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场面，我感到兴奋和激动。在当时举目国家千疮百孔、百姓穷困受欺，发生了这样一件震惊中外的事情，我似乎看到了一种希望。我决定去找新的出路，所以就于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在比利时上大学。这期间我多次聆听当时党的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使我开始接受进步思

想。后来，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巴黎投入了工人大罢工。1926年组织送我去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我越发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结束了国外十二年的学习、生活，1931年我回到了祖国，

后来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我见到了不少做过地下党工作的同学、好友，就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并尽力给予帮助。抗战初期，我在云（南）越（南）铁路工作。当时这是我党唯一一条与国外相通的运输线。这里有党的工作站，他们为党夜以继日的工作。我想自己虽然不是党员，但也要努力为党出力。于是就利用工作之便，从越南搞药品、汽油等物资支援抗战。新中国成立时，我跑回家乡，找到部队政治部，要求为党做点事。后几经辗转，我先是在重工业部作翻译，后来到钢院……”。乔先生一口气谈了他几十年的经历，接着像是总结似地说：“讲这些的意思是，我原来虽然未加入组织，但却一直在党的周围工作、学习和党同声相应，同气相投。”

乔先生还说他在写回忆录，“总结历史，对年轻人进行教育也是我晚年乐以所为之事”。

本文原载《北京钢院》第 670 期 1984 年 7 月 9 日

第五版

亲爱的党——母亲

亲爱的母亲，
我回来了。
你听见了吗？
我的声音。

拥抱我吧！
你温暖的胸怀。
你看见吗？
我的眼泪。

茫茫的原野。
苍苍的天，
有时明亮，
有时晦暗，
只有你的身影，
永远伴我的身边。

江南的原野，
绿草如茵。
北国的平原，
片片的羊群，

无论在哪里，
你牵着我的心。

风里雨里，
是北是南，
时时处处，
唯你是念。

我终于来了，
拥抱我吧！
吻我吧！
我的母亲。

本文原载《北京钢院》第670期（1984年7月9日）刊登了
乔丕成同志的一首诗题目：亲爱的党——母亲

走过沧海桑田 漫渡似水流年的感悟

乔丕成同志的入党申请书

[编者按]在乔丕成同志的入党申请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老教授的赤子之心，他端端正正的写到：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自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共产党和国际工人组织。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一个在俄罗斯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自1921年成立以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前赴后继，终于在1949年摧毁了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实际，集体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指导下，工农业及科技战线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坚如磐石，向预定的“四化”目标前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四化”，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我今年83岁了，在漫长的几十年里，党哺育了我，教育了我，培养了我。反躬自问，我为党做得太少了，我是有负于党的。抗

日战争爆发和1947年初，我都有机会投到革命洪流中去，但我从个人利益出发，踌躇不前。解放以后，经过党多年的教育，目睹我们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我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不断提高。缅怀我们老一辈革命家和先烈们的斗争业绩更使我向党靠近了，和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我愿在有生之年，为党的事业添一块砖一片瓦，做一支燃尽方休的蜡烛，把光和热献给党。

我个人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缺乏工人阶级的坚定性和战斗精神。我的弱点使我多年来优柔寡断，踌躇不前。我愿在党的行列中里，接受同志们的帮助，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还必须加强学习，提高思想水平。我愿做一些实际工作，务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要继续学习马列著作和我党的领袖们的著作。我要向周超学习。我的生命和一切都是属于党的。我终于回到党——母亲的怀抱，我一生已无憾矣。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履行党员的义务，严守党的机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鞠躬尽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永不叛党。

两位入党介绍人意见：

黄娟时：乔丕成同志早年起即思想进步，向往革命，曾作了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解放后积极靠拢组织，对党忠诚，政治坚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并能持之以恒。在“文革”期间，虽身处逆境，但他始终坚信党，坚

信社会主义。

他积极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虽年老体弱，但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对待工作和学习，积极争取入党。他多年来担任外语教研室主任并担任市民盟的工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认为他已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为此，我愿介绍乔丕成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他入党后老当益壮，在学习和工作中更加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984年5月

高捷：乔丕成同志几十年来，一贯积极要求入党。对党有较明确的认识。虽然历史上有过错误（已有结论），但在我党工作困难期间，曾帮助我党做过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三十多年来，一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在任外语教研室主任期间，还是作了一定的工作。尤其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后，乔丕成同志仍然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在党的三中全会以来能热情地拥护党、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再次提出入党。虽然他已年逾古稀，仍然抱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我愿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乔丕成同志今后能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党纲、党章，增强党性，成为好党员。

1984年5月15日

注：高捷同志时任外语系党总支组织委员、第一支部支部书记。

党支部会议决议：

经了解乔丕成同志本人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清楚。该同志几十年来一直积极靠拢党组织，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能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乔丕成同志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虽年逾古稀，仍积极为党和国家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并再次向党组织表示了他几十年来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

根据乔丕成同志一贯的表现和本人申请，我们同意接受乔丕成同志入党。希望乔丕成同志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知识等方面的学习，在有生之年，为我国的“四化”建设作出有益的贡献。

本支部正式党员六人，一致同意接收乔丕成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请上级党组织审批。

外语系第二外语教研室党支部 党支部书记刘芝琳。

1984年5月14日

党总支会议决议：

在总支部审查（审批）意见一栏中，时任外语系党总支书记的王文才同志是这样表述的：

乔丕成同志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追随革命，后虽脱离革命组织，但他也为革命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解放后，积极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决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关心国内外大事，要求入党的心情更加迫切。

根据长期考察和现实表现，到会五名总支委员同意批准乔丕成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员预备党员。

1984年5月28日

上级党组织审查意见：

上级党组织委派樊源兴（时任党委副书记）、赵文志（时任组织部部长）与乔丕成同志进行谈话。他们的意见是：乔丕成同志虽已八十三岁高龄，仍一直靠近组织，积极要求入党，他对党的性质、最终目的和现阶段的任务，有明确的认识。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并表示本人入党后接受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努力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有生之年为党的事业多做贡献。

乔丕成同志基本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同意接收为预备党员。

中国共产党北京钢铁学院委员会

1984年6月11日审批同意接收乔丕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以上材料选自乔丕成同志的《入党自愿书》



石心圃
ShiXinPu
(1893年—1975年)

中国现代冶金学家、科学家。石心圃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工作扎实，他一生致力冶金教育和科研事业，为国家培养了无数人才，其中许多学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科研方面，上世纪50年代他较早搞了氧气顶吹转炉炼钢试验，60年代搞了“中国古代冶金史”研究等等。作为1956年评定的三级教授，他为国家、学校做出了突出贡献，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热爱。石心圃为人忠厚，心地善良，视野开阔，学术精深。先生一生经历了新旧中国两个时代，遭际过顺利和坎坷。石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石心圃简历

石心圃，字集斋。

1893年 出生于河南省济源县东添浆村。

1908年 读完私塾后到怀庆府沁阳中学读书。

1913年 在北京汇文中学学习英文。

1915年 考入北洋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前身之一）矿冶系。

1918年 考取河南省公费留美，赴美国密苏里矿业学院学习。

1922年 毕业回国，在河南焦作福中矿务大学任教授。

1925年 到兰州任矿师养成所任教授和化验所所长，积极推进甘肃矿冶事业发展。

1934年 他又转到济南山东乡村建设学校任教授。抗战伊始学校停办，他转至焦作工学院任教。

1935年 到汉口煤气机制造厂任工程师。他用木炭作为燃料，将煤气机装在汽车、水泵上，用以解决能源匮乏问题。

1937年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七七事变”，神州大地掀起全民族抗日热潮。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的北洋工学院为骨干，成立西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北联大）。

1938—1945年 西北联大解散。西北联大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三校合并组成西北工学院。石心圃开始担任西北工学院冶金系教授。

1946年 石心圃随同西北工学院迁到西安，后又到咸阳。

1949年 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石心圃教授留在校内，和西工师生一起迎接解放的到来。

1952年— 调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生平介绍

1952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实施。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需要迅速培养出大批工程技术人才，高等教育部进行院系调整。在北京海淀区学院路组建了以“八大学院”为代表的一批单科性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即为其中之一。北京钢铁学院由清华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山西大学、西北工学院六所学校的采矿、冶金、金相热处理、钢铁机械专业合并组建。石心圃转入北京钢铁学院，成为首批建校员工之一。到北京钢铁学院后，石心圃加入炼钢教研组，主讲《普通冶金学》课程。普通冶金学课学时不多，没有助教辅导。加之课程涉及面广，包括矿石烧结、还原熔炼、氧化精炼、还原精炼、钢液铸锭和凝固等诸方面，而且听课学生包括不同专业、人数较多。石心圃当年已年逾六十，按现在标准应该退休。当年没有退休制度，石心圃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取得不错的教学效果。石心圃学识渊博，治学严谨，除讲课外还开展了一些中国古代冶金史的方面研究。石心圃为人正直，敢说真话，不善逢迎，为广大师生和同事们所尊敬。1956年，石心圃被评为三级教授。（注：全校共评选一级教授1人，二级4人，三级17人）。

1954年，北京钢院聘请苏联专家陆续到校。他们在苏联是不

同高校的教师，来钢院后讲授各自擅长的专业课，还各指导一组研究生。另外，他们又分别给中国师生做报告，介绍苏联的高等教育情况。1955年专家组长斯克罗霍多夫对全校师生作了“关于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报告，报告中特别介绍了苏联高校中的学生科研小组的情况；指出科研和教学互相配合，学生也是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之后，钢院三、四年级学生组织了58个科研小组和59个学科小组，在教师指导下参加科研活动。其中，石心圃指导的氧气顶吹炼钢科研小组，是有突出成绩的一个。吹氧炼钢小组由钢57级七、八名学生组成，他们学习成绩好，工作能力也较强，在科研小组中阅读了一些技术文献（大多是外文的），并且在实验员陈恩普的协助下，动手准备实验仪器和设备，最终用顶吹氧的方法把生铁炼成了钢。使用氧气和高温冶炼都有一定的困难和危险性，他们都能正确无误地操作，没有出现安全事故。这种研究也需要较多的费用，由于成绩明显，经费支出得到了系主任林宗彩的支持。该小组的研究课题在当时是前沿技术，在我国冶金技术发展历史上有一定意义。20世纪50年代世界钢铁工业以平炉炼钢法为主体，我国钢都鞍山和一五计划建设的武汉，包头等都是采用平炉炼钢。我国科学家叶渚沛极力呼吁发展氧气转炉炼钢，限于条件和有些人的认识，到1964年我国才建成第一个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工厂。50年代只有三家正在做吹氧炼钢的实验：科学院化工冶金所、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和北京钢院该科研小组。该组学生毕业后，多数人在之后的建设和发展我国氧气转炉炼钢工业中做出了贡献；石心圃指导的氧气炼钢科研小组在该领域迈出第一步。

1957年随着国际（波匈事件）和国内（整风运动）形势的演变，崇尚西方民主政治的言论在我国有所散布。1957年夏季开始了以

群众运动的形式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反右运动，结果反右运动扩大化：有一些对一般性工作有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平时常发牢骚说怪话的人也被批成右派。不幸的是石心圃也在运动中被错误判成右派，成为钢院炼钢教研组唯一的一个右派分子。被剥夺了教学资格，受到降职降薪处分，由三级教授降到五级。虽然因为年老未被下放劳改，但教授职称被取消，工资待遇下降，教学工作资格被剥夺。到了1966年“文革”时期，名为阶级敌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成为更加严厉的专政对象，石心圃的日子更加不好过，最后生病卧床，于1975年离世。去世三年多，1979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主持对大批冤假错案平反，石心圃家属收到“改正通知”，撤销了他为右派分子的错误决定，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石心圃离开河南济源东添浆多年，自从20世纪30年代回去过之后就再没回去，但他一直关心惦念着家乡：抗战期间家乡闹灾荒，他接济了许多亲戚；刚解放时东添浆小学得到了他的捐资修了楼房；他把亲戚家的孩子接到自己家上学，一住就是许多年；60年代饥荒时，他在北京接济了大批家乡人和困难群众。

石心圃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工作扎实，他一生致力冶金教育和科研事业，为国家培养了无数人才，其中许多学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科研方面，上世纪50年代他搞了氧气顶吹转炉炼钢试验，60年代搞了“中国古代冶金史”研究等等。作为三级教授他为国家、学校做出了突出贡献，深受人们的尊敬和热爱。

石心圃为人正直，敢讲实话，不善逢迎，因此在后来的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反右”中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冲击迫害，年近八十还到外地参加“夺钢大战”。



1952年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任职时全家人合影

石心圃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他的一生让后人怀念。他有4子1女，其中两人是部队的师职干部，还有高级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在孙子、孙女几十人中有成就者也很多很多，有市政协副主席、处长等等。石心圃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石体信 石心圃四子供稿

2012.4

(曲英补充) 注：曲英原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一张 73 年前的毕业照

在我家的老照片里，有这样一张毕业照，那是我父亲石心圃（字集斋）还有另外 4 位教授在 1945 年 6 月 6 日和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 26 名毕业生的合影，珍贵的照片记录了那段艰苦年代的历史。

1937 年 7 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沦陷，为挽救教育，保存文脉，北大、清华、南开和中央研究院等南迁设立长沙临时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大、北洋工学院、北平研究院西迁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不久随战局变化，长沙临时大学迁徙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西安临时大学 1938 年 4 月再迁陕西城固等地，合组“西北联合大学”。1938 年 7 月教育部决定成立“国立西北工学院”，地址在城固县城南 20 公里的古路坝。西北工学院由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而成，设 9 个系，在抗战 8 年里招生 2330 人，培养了 1457 名本科毕业生。学校教师授课认真，学生考试升级严格，毕业生都很优秀，大批科学工程巨匠在这里诞生，其中“两院”院士就有 15 位。

这张矿冶系 1945 年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教授是：张伯声、石心圃、任殿元、李善棠、关绍宗，前 4 位都是河南官费留美的，张是著名地质学家，1980 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石、任是北京钢铁学院教授，李是北京矿业学院教授，关教授后来回到东北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1946 年统计

132 位教师中有教授 46 人，副教授 16 人，胡庶华、魏寿昆、马载之等著名学者都曾在这里任教。



集高老师留念： 矿冶系三十四年级全体学生 获赠 民三十四年六月六日（1945）
（学生杨若先A-014-1图）

1945 年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毕业照

照片中的学生后排右 1 是师昌绪，毕业后留美回国从事金属学研究，成为中国材料学界泰斗，两院院士。矿冶系其他届的毕业生，有成就者也非常多，仅以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为例，林宗彩、方正知、于学馥、杨让等著名专家教授都是西北工学院矿冶系的毕业生。

照片里的老师都已去世多年，学生是否有健在的也无法考证，只是最前面列席的小女孩，我的姐姐石体仁如今 77 岁退休在家。她 1959 年考入北大生物系，毕业后在中医研究院做研究员，成果颇丰。

这张毕业照可以告诉我们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段历史：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一样，都在抗战时期创造了奇迹，而且西北工学院等五校以 505 名教授、副教授的师资队伍，培养了 9527 名毕业生。

摘自 2018.11.10 《北京晨报》



杨让
YangRang
(1922年—2014年)

中国共产党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著名的冶金和金属材料学家、金属材料和钢铁冶金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的一代名师、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他的科研成果丰硕，曾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全国科技大会科研优秀等多种奖励。他淡泊宁静、不计名利、踏实做事、坦荡为人。在工作中认真严谨、注重深入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对同志坦诚直率、作风民主、对学生循循善诱、关怀备至，深受学生爱戴。被称为“执教一生 桃李满天下，奉献一世 功德炳千秋 风范长存”。

杨让简历

1942—1946年 西北工学院矿冶系上大学。

1946—1949年 西北工学院矿冶研究院研究生。

1949—1952年 陕西咸阳西北工学院任教。

1952年— 北京钢铁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业特长：熟悉冶金、金属材料及热处理，懂英语、俄语。

重大成果：1963年成功研制不含镍的特大型轴承用钢及热处理工艺。

1970年成功研制固体火箭发动机机壳材料，低合金超高强度钢用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

生平介绍

杨让 1922年生，陕西乾县人。1946年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1949年西北工学院矿冶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1952年调至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金相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副主任。在国内外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并与人合作编写了材料专业用的《金属热处理及合金钢》等教科书。1959-1963年与洛阳轴承厂合作研究成特大型轴承用钢及其热处理工艺；1963-1978年研究成功低合金超高强度钢；1983-1988年研究成功低合金超高

强度钢的强韧化理论及其它高级钢材料。其科研成果曾获全国科学大会优秀科研成果奖、国防科委及冶金部科技三等奖、国家级特等科技进步奖。

他曾担任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金属学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相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金属学会特殊钢学会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热处理学会名誉理事、中国《钢铁研究学报》顾问。

主要研究方向为：力学冶金及强韧化，他曾承担“微合金化控轧、控冷、高强度耐磨重轨的研究”（国家“七五”攻关项目）、“非平衡态金属粉末、陶瓷粉末以及难烧结的高硬度高脆性材料的爆炸烧结技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等课题。主要研究成果：“无Co低镍马氏体时效钢”，1987年获国家发明专利；“32SiMnMoV低合金超高强度钢的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7年获国防专用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固体火箭发动机壳体用低合金超高强度钢”，1987年获国家技术进步特等奖；“特大型轴承渗碳用钢”，1963年通过技术鉴定。

主要著作：

《合金钢》（合作），冶金工业出版社1982年出版；

《金属热处理原理》（合作），冶金工业出版社1982年出版。

主要论文：

《急冷凝固高速钢粉末在冲击波作用下的固结》，载于《选矿、冶金、材料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87年；

《急冷雾化粉末的结晶形貌与溶质原子的偏析特征》，载于《第5届国际急冷会议论文集》1987年；

《回火马氏体晶界脆化机制》，载于《第5届国际材料热处

理大会论文集》1986年；

《金属粉末爆炸烧结机理的研究》，载于《强劲载荷及其效应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86年；

《含硅钢中贝氏体相变及贝氏体组织形貌和微细结构的研究》，载于《第4届国际材料热处理大会论文集》1985年；

《淬火和低温回火条件下Si—Mn—Mo—V钢的脆化与韧化》，载于《国际高强度低合金钢会议文集》1985年；

《合金元素对Si—Mn—Mo—V钢强韧性的影响》，载于《第1届国际材料热处理大会文集》1982年；

《SiMnMoV钢低温回火脆性的研究》，载于《第18届国际材料热处理会议论文集》1980年（美国）；

《高合金渗碳钢中残留奥氏体的转变》，载于《第1届全国热处理学术会议论文集》1963年。

1980、1983、1985、1986年分别参加了在美国、德国及上海举行的国际材料热处理，高强度低合金钢及国际强劲载荷及其效应的多次学术会议。

曾获得：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科研科技工作者。

编者收集整理

青年时参加党组织 建校时艰苦奋斗 科研中硕果累累

1936年9月杨让考入陕西省西安市省立二中学习。该校校长是地下党员江隆基同志（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该校学生运动极为高涨，是当时学生运动的中心。国民党为了压制学生运动，遂解散了省立二中。杨让因参加学生运动积极，被二中开除了学籍。1937年9月，杨让转入省立一中学习，后又转至西北农学院附属中学学习，1942年在该校高中毕业。

1942年9月，杨让考入位于陕西省城固县的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学习，1946年于矿冶系毕业。工作一年后，1947年杨让又回到西北工学院矿业研究所作研究生，同时兼作助教工作。当时，杨让的中学同学、地下党员吴鸿翰同志也在西北工学院学习。在吴鸿翰同志的影响和帮助下，杨让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对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当时的革命形势渐渐有了认识，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后来，吴鸿翰介绍杨让与地下党员张光庭认识，建立了联系，并于1948年底，经张光庭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协助张光庭同志做一些群众宣传工作。1949年初，张光庭同志不幸牺牲，杨让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9年5月，咸阳解放，解放军代表进驻西北工学院。同年6月，国民党胡宗南、马步芳部队进犯咸阳。为躲避战乱，西北

工学院军代表向全院师生作了动员报告，提出愿随军撤离参加革命者，可随军撤离，除随身必须用的物品外，其他东西一律不要带，并要有过黄河、返延安的准备。杨让自愿随军撤离到咸阳以东的三桥镇，后又转撤到临潼县，生活上由解放军负责，吃大灶、发给衣服、享受供给制待遇。在临潼，杨让参与了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为解放军伤员服务等，投入了紧张的革命工作。1949年6月13日，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击退后，杨让随解放军返回咸阳西北工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

为了适应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对人才的需求，1952年全国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1952年7月，杨让从西北工学院调到新成立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金相及热处理系工作。由于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新建校舍尚未建设，所以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干部、教师和学生暂时在清华大学居住、学习和办公。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是按照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的模式建设的，中央政府教育部要求学校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组织教学活动。由于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苏联教材和中文教材差异较小，所以低年级学生就在清华大学上课。而高年级同学因为苏联的俄文专业课教材尚未翻译出来，经高教部批准，就组织同学到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和抚顺钢厂实习，同时组织教师突击学习俄文和翻译俄文教材。杨让到北京后，参加了翻译俄文金相热处理专业课教材的工作。1952年底，他曾去鞍山钢铁公司检查金相热处理专业（相54）学生在鞍山的劳动和学习情况。他穿上工人工作服在平炉上与同学一起劳动、了解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他的朴实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

1953年9月，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在学院路满井村校址的部分教工与学生的宿舍、教室、实验室落成，全体学生和多数教工遂从清

华大学迁往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新校址。从1953年开始，北京钢铁学院开始招收新生，所有学生从此全部在新校址进行教学活动。

1953年至1966年期间，杨让主要的教学活动是带领学生下厂实习、指导学生毕业设计、讲授《金相热处理》和《合金钢》等课程。毕业设计的内容涉及冶金厂和机械厂，如东北、华中和上海的特殊钢厂、一汽、拖拉机厂、齿轮厂、轴承厂、汽轮机厂等。杨让的足迹几乎踏遍了这些工厂，为他以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后，杨让主要讲授金相热处理专业的热处理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他还培养了一批年轻教师，同时参加了《热处理原理》及《合金钢》等专业用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活动，为了解决国家建设中的问题，学校开展了大搞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当时，鞍山钢铁公司半连轧机使用的轴承是用含镍的渗碳钢制造的。由于苏联的禁运和我国镍矿资源缺乏，所以杨让就带领青年教师和学生开展了不含镍的渗碳轴承钢的研究。他和年轻的教师、学生一样，从查资料、设计成份、冶炼钢锭、加工试样，不分昼夜地进行金相组织观察、力学性能试验的研究。经过几年的研究奋战，终于在1962年研制成功不含镍的特大型轴承深层渗碳钢及全套热处理工艺，被洛阳轴承厂采用。1963年起在鞍钢半连轧厂使用，取代了一直靠前苏联进口的20Cr2Ni4A轴承钢。

为了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章守华教授从1958年开始带领部分师生开始了超高强度钢的研究。因为我国当时还没有找到并开发镍铬资源的矿体，所以当时研究的方向是寻找无镍铬的超高强度钢的成分设计。经过师生的日夜奋战，终于设计并冶炼出了硅锰系列的超高强度钢的成分系列并投入了冶炼和试样的加工。由于工作需要，章守华教授转移到其他科研课题组工作，杨让便

领导超高强度钢教研组继续进行了艰苦的试验研究工作。为了保证科研的进度，杨让带领教研组的教师、实验人员，加上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不分昼夜、严寒酷暑，除了在学校试验外还要常常去工厂做试验。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奋斗，他们所研制的不含镍铬、适合我国资源情况的硅锰超高强度钢终于在 1969 年研制成功。



杨让教授负责研制的新型高强度钢应用于我国第一颗“东方红”
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壳体

1970 年，原七机部四院采用这种新钢种制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壳体。包括此超高强度钢在内的整个项目，1987 年获国防专用国家技术进步特等奖。之后，杨让又成功研究了无钴节镍马氏体时效钢，该项成果于 1985 年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杨让还与粉末冶金专业合作，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非晶态、亚稳态粉末材料爆炸固结技术和新型材料，并获国家高技术专家委员

会给予“A”级评分，居于国际领先水平。杨让还领导教研组教师和学生开发和研究了铁路使用的高强度耐磨重轨钢和矿山使用的重型钎杆钢，分别获得国家进步奖。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杨让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百余篇论文。

杨让的教学科研成果和事迹，先后在《共和国功勋人物》、《中国传统文化大典》上发表，并获入选荣誉证书。



特殊津贴证书

杨让教授自 1952 年调入北京钢铁学院以来，在工作上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认真负责、注重深入实际和理论的实际应用；他对同志坦诚直爽、热情帮助、平等待人，善于团结同志共同克服困难做好工作；他对学生循循善诱、平易近人、作风民主，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受到学生的普遍爱戴。

杨让教授可称得上是一位品德高尚、精通业务、善良宽容、深受教师学生拥护和热爱的好教授。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提供

坦率真诚、宽厚热情的良师益友

杨让老师默默地走了，我们失去了一位敬爱的师长、同事和朋友。十月十七日上午，我去看望杨老师，他用右手握着我的右手，轻轻的左右摇动，一会睁开眼睛看看，很快又闭上了，似乎是在说：老李啊，你来了，我们要再见了、再见了！十一天后，杨老师在医院走了。他没有说什么话，默默地走的。我与杨让老师相识于一九五二年鞍山钢铁公司的平炉上，至今已经六十多年了。杨老师的离去，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哀思。他的认真、坦率、真诚、包容和平易近人的品德，使我从内心里对他产生无比的敬仰和崇高的敬意！



杨让老师在工作中一贯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无论是在鞍钢

的平炉上，还是在洛阳拖拉机厂、轴承厂的车间里，他与学生一样劳动不怕脏、不怕累，与工人打成一片，虚心向工人和实际学习，身体力行教育学生。在科研工作中，他和教研组的老师和学生一起不分昼夜辛勤工作。无论是在严寒酷暑、还是在假期里，总能在主楼南门内 120 房间看到杨老师的身影、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在杨老师的率领下，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将超高强度钢用于制造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壳体。该成果一九七零年获国家国防科技进步特等奖。



杨让老师是一个性格坦率、待人诚恳的长者。在六十多年的相处中，我深深感到杨老师胸襟坦荡、率真直爽、光明磊落、大度做人性格对大家的无形感召力。这些凸显出他为人的特色和品德，受到师生的高度敬重。杨让老师是个包容性很强的人。中国古圣贤老子说：“上善若水”，是说人的高尚品格的最高境界如

水一样的坚韧、灵活和包容。杨老师的包容性格表现在他承认自己也承认别人，绝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能够灵活对待不同性格和意见的同事和学生。杨老师是以善良和爱心来感受生活的，这正是杨老师几十年来在工作和生活中得到师生赞赏和尊重的重要原因。杨老师的包容品德还体现在对人能平等相待，平易近人，无论教师和学生都很容易与他沟通谈心。在教学科研中，他与同事有“苦”同当、有福共享；在科研组中，他对教师和实验人员平等相待、一视同仁。所以他们科研组能够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共同奋斗，最后取得辉煌的成果，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为学校 and 集体争得了巨大荣誉！

回忆杨老师的往事、追思他的优秀品德，用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杨让老师的宝贵精神和优秀品德将鼓励我们继续前进！

李静波 原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忆恩师杨让老师

杨让先生是北京钢铁学院建校元老之一。自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曾专任或兼任金相教研组主任二十余年。建校后，凡我本专业毕业留校工作的同仁几乎均为杨先生的学生。我是 1964 年金相热处理专业的毕业生，留校后分配到金相教研组当助教，自诩为金相教研组的遗少。我正是在杨先生和诸位学长的栽培、帮助下，成长为教研组辈分最小的主讲《钢的热处理》课的人。2000 年教改，我还讲了《金属热处理和合金钢》最后的一课。

我们金相 -64 年級的《钢的热处理》专业课是由杨让先生主讲的。同学们都反映，杨先生的讲课内容严谨求实，言词却生动有趣味，因此常会从课堂里传出欢快的笑声。杨先生在讲到钢中的各种相变时，基本概念清楚、重点突出，令同学印象深刻；而讲授钢的热处理工艺时，现场操作过程又能与基本概念紧密联系、有机结合，让人有亲临现场的感觉。杨让先生的讲课，不仅提高了同学们对学习《钢的热处理》这门专业课的兴趣，更是提高了同学们对金相热处理专业的认识，巩固了同学们的专业思想。许多同学毕业后，在本专业的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

杨先生不仅对教学认真负责，对学生的课余学习活动也非常重视，并且给予极力支持。记得在学习《钢的热处理》课期间，我们年级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自己组织了一个兴趣小组。第一次小组会时邀请了杨先生参加，并请杨先生指导我们如何学好专业课，杨先生欣然答应。他给我们指出学习方向，甚至细致到给我

们列出了参考书的书目。后来小组成员进行准备讨论的分工，并确定了下一次活动讨论的主题。第二次活动时又邀请了杨先生参加，并请杨先生对我们的自学心得给予点评。杨先生听同学讲完后，心情特别高兴，当场表示下次活动一定还要通知他，他一定会来。兴趣小组的同学们非常兴奋，一致反映收获极大，不仅对专业的认识更深刻，更满意的是自己的自学能力有明显提升。兴趣小组活动最现实的结果是同学们在期末考试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964年夏，我毕业留校工作。这一年按中央教育部和冶金部的规定，毕业生须先到工厂或农场参加一年劳动后再分配工作。起先我被分配在本校修配厂钳工组劳动，主要工作是跟随工人师傅维修实验设备及上下水管道等。后来有人反映在校工厂劳动锻炼强度不够，对思想改造不利，应去工业生产第一线。于是，校

人事处让我们自己提出去向，由他们去联系安排。我的专业是金相热处理专业，因此想去热处理厂。那天，正巧在马路上遇见杨先生。本来我刚毕业，还没去教研组报到，平时见到杨先生也仅行个礼，叫一声杨先生而已。但这次见面，我突然鼓起勇气向杨先生提出关于我的去向问题。杨先生听后沉思了一下，对我说：“热处理车间以后机会很多。我们搞钢铁材料的人，你最好去冶金厂。在冶金厂多了解冶金产品的生产过程与质量控制，也好为以后的工作做好储备”。听了杨先生一席话，我于是申请到了北京特殊钢厂的冶炼车间。该车间为电炉炼钢车间。我在电炉工作台上与工人师傅一块摸爬滚打了近十个月，对电炉炼钢有了深刻理解。与此同时，在厂里的学友很多，通过互相交流，从而对炼钢原材料的准备、钢水浇注、锻钢、轧钢、甚至拔丝生产均有所了解。正是这些冶金知识储备对我日后的教学活动，如实习、讲课、甚至以后的科研工作均有较大的帮助。

1966年初，我们带相-70年级到太原钢铁公司进行认识实习。实习结束回到学校时，杨先生一行人到校内原来大饭厅前的广场迎接。当一切安排好后，杨先生把我叫到一边，嘱咐我说，一，寒假不要出去。下学期后半期铁-68的《金属材料》课中热处理、合金钢部分，20多学时由我来讲，要我寒假中写好讲稿。二，让我下学期好好听任怀亮先生给轧-68主讲的《金属学》。课后，给阿尔巴尼亚、越南留学生答疑由我负责。三，当时学校正大搞现场教学活动。杨先生希望我有空去机械厂的热处理部门参观、学习。最后，杨先生加重语气叮嘱我说：“你要给学生一碗水，你就要准备一桶水”。作为一名教师，这句话让我牢记了一辈子。这就是作为教研组主任的杨先生，对刚入队的青年教师的严格而清晰的要求。那年，开学后，我认真听了任怀亮先生主讲的课

程、仔细阅读了教材，多方面向任先生请教，并得到任先生非常细致的帮助，帮我努力向“一桶水”的方向前进。而就在此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虽然停课、老师靠边站，但留学生的课不能停。经校工宣队特批，竟然让红旗下长大的我去接替任先生完成本学期的教学任务。现在回想起来，我所以能完成这场教学任务，实在就是杨先生“一碗水”、“一桶水”的教导带来的结果。对杨先生提到的第三点，我也深有体会。那时，我利用课余时间专门参观了汽车厂、齿轮厂、第二机床厂等工厂的热处理车间，了解他们车间的设备、产品、工艺等现状，增长了许多这方面的实际知识。



上世纪70年代初，金相教研组组织金相实验室内各热处理设备有关负责人成立了一个热处理车间，并专门接受校外单位的

工件热处理任务。由于我们的热处理质量好，在市里逐渐小有名气。几年后，教研组委派我负责管理这个车间。我因曾在不少热处理厂见过世面，又有热处理车间前期学长们管理经验的基础，车间办的越来越红火。当年，接收外加工也为学校赚了点钱。此外，还做了另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我们在这个热处理车间办了两届、半年一期的热处理技工短训班，为北京一些工厂培养了多名技术工人。短训班不仅给他们讲解热处理工艺与操作的基本理论，而且手把手地教会他们实际的操作过程。学员反映收获很大。他们回厂后，大多数人成为车间骨干，有的还成为车间领导。我想，这也是金相教研组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实例，也可以说这是现场教学的另一种方式。正是经过这样的锻炼，也为我主讲《钢的热处理》专业课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和经验。

杨让先生在工作中对我们一贯严格认真要求，但在生活中却是一名平易近人、可爱可亲的长辈。相处之中也有一些令人捧腹的趣事！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陪杨先生去包头钢铁公司参加钢轨生产的座谈会。趁会议休会日，我陪杨先生去逛商场。到商场后，杨先生突然问我带钱没有，并向我借了X元。中午，我们到饭店吃饭。吃毕我要去买单时，杨先生突然揪着我不放，坚持要用我刚借给他的钱付款。这就是借我的钱请我吃饭的趣事。杨先生对我的态度让我深深感觉到，我这晚生后辈在杨先生眼里好像还是孩子，只有听吃听喝的份儿，倒是感到很亲切。另一件回忆起来非常美好的事，是上世纪的70年代，杨先生家添了一件当时极为稀罕的电器——12英寸黑白电视机。从此每逢周六或日，杨先生必然邀请我们去他家看电视。杨先生和师母每次都一起热情接待。在二栋、杨先生家不大的客厅里，摆满了大小不等的座位，我们与老师家人一起看电视，杨先生好像特别享

受这种欢聚。数年后，电视慢慢普及，我也不去杨先生家里蹭看电视了。后来谈起此事，杨先生还感慨地说：“那种热闹的局面没有喽！”

如今杨先生仙逝五年多了，我们会时常谈起杨先生的工作成就，也常常回忆起和杨先生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种种美好时光，真是回味无穷。

杨先生，我会永远纪念您——我的恩师！

马世才 原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教授

杨让教授——我一生的楷模

1973年至1982年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九年，也是我美好难忘的九年。此间我有幸师从杨让教授，三次加入杨让教授所带领的《低合金超高强度钢》专题科研团队。在杨让教授的指导下，顺利的完成了我的大学和研究生的学业，为我以后事业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用终生。

我们的大学学业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完成的。当时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老师不能正常授课，学生不能正常上课，然而杨让教授对此并不在意。他亲自带着我们到图书馆查找文献资料，指导学习各种相关知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杨让教授为了让我们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专门请来余永宁教授给我们讲述晶体缺陷位错理论。要知道当时杨先生的处境并不乐观，有时还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点名批判。可是无论外界条件如何恶劣，杨让教授从未放弃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职责——为人师表和教书育人。在这一阶段的实习过程中，在杨教授细致耐心指导下我们完成了炼钢、制造样品、实验到出报告的每一过程，杨教授为我们耐心详细解读了实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一点一滴的培养我们作为工程技术人员最基本的动手能力。

感谢恩师，没齿难忘。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杨让教授对我们谆谆引导，精益求精。把重点放到培养我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启发和指导我们制定实验方案，反复讨论实验的可行性，严格的要求我们独立完成整个方案的过程并全面实施。两年

多来，在杨让教授的严格要求下，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顺利的完成了对硕士生的全面培养。在此期间，有一件事影响我的一生，当时我们做实验，正常的程序是在某一个特定实验条件下由三个实验原始数据取平均值作为最后的数据点并根据设定的实验条件画成曲线，以观察各种不同的实验条件对材料性能的影响。在做数据分析时，杨让教授要求我们对任何一个背离曲线过大或反常数据都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绝对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否则整个实验必须重新来过。杨让教授这种求真求实一丝不苟，对待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敬业精神对我影响至深，并贯穿我的整个职场生涯。这件事我也曾向我所能接触到的理工后辈们反复讲述，可喜的是这样的思维模式确实引导他们走向了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成功。杨让教授虽然不在了，可是他老人家的影响和精神还在晚辈中持续并发扬光大！



杨让教授是恩师，更像慈父。他性格幽默，语言生动有趣。虽然在工作学习中对我们严格要求，可在平时日常交往上平易近人。我们都愿意接近他和他交流工作学习思想和生活上的各种问题。他身处逆境可却鼓励我们积极靠拢党组织。他就是那种浑身充满正能量常常引导我们奋发向上的人。杨让教授喜欢孩子，他把学生们都当成自己的孩子。记得那时我们学生业余生活很匮乏，于是就经常呼朋唤友的到他家看电视，有时还赶上了杨师母包的包子，热腾腾的大包子一口下去满口留香。在这种时候，杨让教授总是笑咪咪的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一脸的慈祥。浓浓的关爱为我们清苦的求学岁月增添了许多乐趣，让远离家乡的我们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记得那是2014年6月初的一天。我做梦在给杨让教授做寿。梦中醒来，想起不日即是杨让教授的生日，拨通电话前去问候。师母惊喜地问“你回来了？”我说还在工作没回国。师母告诉我这几日杨先生午饭后一改平时的午睡习惯。独自坐在客厅沙发一言不发。问他为什么不午睡，他说梁丽雅回来了，她说要来看我，我在等她。听闻此言，我放下手头工作即刻订了回北京机票。与几位系里的老师们陪着他老人家吃了一顿中午饭。分别时，杨让教授告诉我他病了的一些细节。我请他安心养病并告诉他说年底，我还会与上海的夏菊琴和包头的刘洪娟等同学们再来看他。没曾想11月就接到杨让教授离世的噩耗。这真让我痛心不已。6月份的拜访成了我永久的回忆。

杨让教授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了，但是每当想起他老人家，我心里就无限的感慨和感动。杨让教授为师如父，不但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他老人家用毕生诠释了踏踏实实做事，坦坦荡荡做人的原则，是我终生的榜样。他老人家一辈子谦虚谨慎，平易近

人，甘为人梯；他淡泊宁静，不计名利，崇高修养和境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有时我常常想：作为一位人民教师，除了把我们培养成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最大的成就莫过于能常留在学生心间，用他们的真知灼见指导我们、警戒我们直到永远。杨让教授在天有知，看到我们怀念他，把他放在心中最尊贵位置上去崇敬去爱戴，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欣慰的微笑。

敬爱的杨让教授我们永远怀念您！

梁丽雅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生
现就职于美国

泽水长流，福祉永驻

——深切缅怀恩师杨让教授

我的恩师杨让先生走完他92年辉煌的人生历程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今天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撰文纪念恩师的丰功伟绩，缅怀恩师的道德情操，承传恩师的精神风范。

“执教一生桃李满天下先生精神永驻，奉献一世功德炳千秋大师风范长存”，这是恩师谢世的时候我们海内外学子敬撰给他老人家的挽联。这幅挽联真实地反映了作为新中国冶金高等教育的先驱成员，先生毕生献身于祖国的高等教育和材料科学研究事业，为我国冶金高等教育和材料科学的发展奋斗不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光辉一生；同时挽联也字里行间地向世人展示作为我国著名冶金和材料学家，金属材料和钢铁冶金高等教育与科学研究一代名师的高尚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

恩师杨先生是我的材料学硕士和博士导师，更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没有恩师便没有我学术生涯的今天，也没有我们全家的今天。他老人家对我在学业上的教导、指引、关爱和恩助远远超过一个学术导师对他的学生的付出。我前进的每一步都渗透着他的关爱，倾注着他的心血，恩师对我的恩重如山，令我刻骨铭心世代难忘。

七十年代初，恩师成功研制的新型高强度钢用作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和第一枚洲际运载导弹的壳体材料，被

誉为国防材料的研发功臣，蜚声材料学界。1981年我慕名报考并
有幸被录取为杨先生的硕博连读的研究生，1982年从中南工业大
学（现中南大学）来到先生执教的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
学）就读，如愿从事金属的快速凝固研究。当时国际材料界快速
凝固技术的研究如火如荼，材料学家们试图运用激冷技术得到具
有亚稳相和特异组织结构的微晶以获得材料的特殊性能。那时候
我们国家这一研究才刚刚开始，就我所知，只有我们北京钢铁学
院和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两家，恩师课题组的快速凝固研究当
时在国内是最领先的。



恩师治学严谨，对我的要求十分严格。硕士研究生修课阶段
每学期结束，杨先生都要去研究生院查看我的成绩，然后满意地
告诉我：“我看到你这学期的成绩了，很不错。”我硕士研究生的
研究方向是《激冷雾化马氏体时效钢》，研究的宗旨是通过激冷

来提高马氏体时效钢的强度同时改善其韧性。先生让我将我的硕士论文规划为文献检索，设备调研，开题报告，实验与测试，撰写论文及准备答辩等六个部分来完成，让我写出详细的计划和时间安排，经他修改补充后我按计划照章实施。由于快速凝固是项新的技术，研究的关键是实验设备。当时我们学校粉末冶金教研室吴成义、解子章两位教授自制研发了激冷雾化喷粉设备；恩师便亲自领着我去拜见了解教授和吴教授，并请他们两位作为我课题的指导老师。同时恩师还全力支持我到外地做快速凝固的设备调研，评估当时国内快速凝固技术设备的水准以及国内同行们所使用的实验设备。尽管课题经费十分紧张，他仍千方百计地支持我去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和中南工业大学粉末冶金研究所做设备考察。那时候个别地方的社会治安有些不尽人意，为了我的安全起见，先生还特地让我的师弟吴俊安陪同我一起出差，并鼓励师弟选择我的研究方向，给了我以极大的支持。我和师弟外出考察收获累累，更坚信了我们自己课题组的快速凝固喷粉设备的领先性。

恩师对学术研究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对我的课题研究极为操心，每当我们做喷粉实验的时候他都亲临现场指导。在解教授和吴教授的全力支持帮助下，我的材料激冷雾化实验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成功获得了快速凝固的粉末。当时对此类新材料我们自己的检测手段有限，做材料的各种组织和性能测试基本上都要求助于外单位，而杨先生早就已经为我搭好了桥铺好了路。凭借先生的特殊人格魅力和人际关系，当时我可以随时去科学院金属所、物理所、621所、钢铁研究总院、地质研究院和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等单位做试验，不用提前预约也不用排队，随到随做，有时候甚至连实验费用都不收。实验工作全部结束后，我花了三到

四个月的时间，整理数据图片撰写论文。我每写完一章，恩师就修改一章。当我将全部论文交给杨先生后，先生又从头到尾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师母告诉我，恩师在为我修改论文期间，时常夜里两三点从床上爬起来，好像来了什么灵感似的，翻开论文写一段话，然后再睡，此情此恩终生难忘。

一九八五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经考试后继续跟随杨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为确定我的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恩师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会加速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而宇航事业的发展，对特殊性能的铝合金材料的需求量更大，因此研发高温高强铝合金材料要比研发高温高强的钢铁材料更具社会价值。因此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就定为快速凝固高温高强铝合金，激冷马氏体时效钢后继研究工作将由我的师弟和师妹们继续完成。我在做文献检索时发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Grant教授有一个庞大的快速凝固研发团队，正在做高温高强铝合金的快速凝固，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实验设备在世界上都属一流的。先生听了我的汇报立即鼓励我追踪Grant教授的研究动向，并积极准备在钢院实施该方向的开拓研究工作，给了我极大的支持。

1987年国家教委决定选送首批优秀的在读博士研究生作为联合培养的对象送到国外名牌高校做博士论文。恩师知道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亲自找到系领导和校领导极力推荐我，有幸得到系主任陈国良教授和王润院长的全力支持，为我争取到了这个出国名额。继而恩师又千方百计地筹划送我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他想起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的师昌绪先生和钢铁学院理化系教授张兴铃先生都是从MIT回国的，而且张先生还是

Grant 教授四十年代的博士生。尽管恩师和师先生早年是国立西北工学院的同学，但他们平时工作繁忙疏于联系，可为了我出国的事，恩师不顾66岁的高龄骑着自行车亲自去找师先生；师先生当场就为我写了推荐信，向Grant教授强力推荐了我。当天晚上师先生又亲自来到钢铁学院和杨先生一起去找了张兴钤教授，张先生也十分乐意地为我写了推荐信。三周后我便收到了Grant教授的接收信，欣然接收我为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同时还寄来了MIT为我准备的美国签证申请表格，让我感动万分。

我临行前，恩师又听说Grant教授的研究是极其保密的，他的快速凝固设备尤其是核心部件是不让外国人接触的。为此恩师又找柯俊先生商量，看有什么办法能得到Grant教授首肯让我进入他的实验室做实验。根据Grant教授喜爱中国文化的特点，他们俩一合计，柯先生送Grant教授一套《中国冶金史》，杨先生送Grant教授一套《红楼梦》，让我带给Grant教授作为见面礼。1987年10月30号我如愿来到MIT，第二天就拜见了Grant教授；我呈上杨先生和柯先生给他的礼物和私人信件，Grant教授非常高兴，当晚便请我在MIT教工俱乐部吃饭，并送我两百美元作为见面礼。席间我问Grant教授我什么时候可以进实验室，他回答说：“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进，明天你就去我办公室拿一套钥匙”，令我惊喜不已，不得不佩服恩师杨先生运筹帷幄。

我在MIT博士论文研究方向是快速凝固液体动态压实高温高强度铝合金。在我做博士论文期间，恩师曾多次写信给我和Grant教授，询问我的研究进展，并对我所研究的材料合金微量元素的添加提出指导意见。每当Grant教授收到杨先生的来信，总是告诉我说：“杨教授来信了，很关心你，快来看看。”恩师对我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十分关心，李静波校长来美国访问，先生还特地

请李校长到MIT来看望我，关切地询问我在美国学习生活和工作情况，令我难以忘怀。杨静云校长赴纽约探亲和谢锡善教授几次来MIT访问时，也都受恩师所托来看望我，令我十分感激。我在MIT所从事的快速凝固微晶材料的研究，在Grant教授的指导下，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经过五年的努力，我成功地发展了“2024-Fe-Ni”和“7075-Fe-Si”两个新型的高温、高强铝合金；与此同时，我还为美国航空航天部研发了新型的Mg-Li-Ca-V航空材料；为美国能源部研究和开发了新型的Fe-Si软磁材料；为美国国防部研究和开发了新型的不锈钢和低碳钢材料（这些研究均不公开发表专利），这些成就的取得都归功于Grant教授和杨先生两位恩师的前瞻引领悉心指导。

1992年我博士研究生毕业，受恩师的邀请，78高龄的Grant教授亲自陪我到我的母校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院学院），出席我的论文答辩会。令我感动万分的是，由于Grant教授的到访，我的论文答辩成了我们在京期间母校的一件大事。李静波校长代表校领导亲力亲为全程参与，中科院资深院士柯俊先生代表校方全权负责答辩事宜，学校成立了以中科院资深院士张兴钤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系主任、工程院院士陈国良教授具体负责我们在京期间的日程安排，对我的论文答辩做了精心筹划，邀请在京的材料界老前辈出席我的论文答辩会，其中包括师昌绪先生、柯俊先生、张兴钤先生、章守华先生和刘国勋先生等，并邀请材料系的教授们都参加。我在母校准备答辩期间，受恩师所托，谢锡善教授、孙静远教授、吕反修教授、解子章教授和吴成义教授，还有师妹唐昱荟等都为我的答辩竭尽全力，帮助我做了大量工作，这些恩情我将永远铭记。



杨让教授（右三）与外国专家合影

Grant教授在京期间受到恩师和母校的盛情款待，就我的去留问题，两位恩师几次促膝长谈。柯先生受李校长所托，代表学校专门与杨先生及Grant教授一起开会商讨这一事宜，为我的未来再铺新路。Grant教授极力提出要我跟他回MIT，从事博士后研究，继续完成后续的研究工作；而柯先生则提出让我留下来，做钢铁学院副院长主管外事工作；柯先生执意让我留下来的理由是，学校急需一位主管外事的副院长。最后柯先生和Grant教授俩看着杨先生，等着他拍板表态。恩师沉思良久然后说：“我的本意也想让她留下，接我的班帮我指导研究生，但是Grant教授如此器重她需要她，我还是支持她回MIT继续完成她的研究，将来学校需要时再回来吧。”最后三位先生一致同意，上报学校审批，支持我跟随Grant教授重回MIT。那次我能顺利地随同Grant教授返

回MIT，除了母校的大力支持外，还得感恩时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参赞徐敦煌先生和时任国家教委科技司司长左铁镛院士的恩助，由于他们二位的鼎力斡旋，我才能得到国家教委的首肯，为我豁免了J-1签证必须回国两年的服务期，使我能破例地跟随Grant教授重返美国做博士后研究，这些在MIT留学生中一直都被传为佳话。

我回到MIT后，继续从事我课题的后继研究工作。1994年我做博士后期间被破格应邀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与组织和领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西点军校召开的快速凝固国际会议。会前恩师专门从北京来信，喋喋不休地嘱咐我要认真地向大会主席Grant教授学习主持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会议期间要多跟与会科学家进行交流，开拓视野，造福世界。恩师的谆谆教导音犹在耳，永不遗忘。

美国高校的学科建设适应社会的需求及时更新，九十年代中期，微软问世，预示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那时候MIT所有老牌的传统冶金专业随着社会的进步都有待转型。这也是Grant教授急切地希望我能回MIT完成我手头研究工作的原因之一。一九九五年，我完成快速凝固领域的课题研究后，征得恩师的同意，在Grant教授的精心呵护、安排和帮助之下，我成功地转入如火如荼的光电半导体领域，从事再生能源的研究至今。我们课题组所从事的硅基发光、导光和探光整个系统的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现代集成电路向未来的光电集成过渡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为使人类摆脱能源危机，本世纪初我率先进行再生能源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指导博士生成功地将光子晶体引入太阳能电池，将光电转化效率提高了50%；这一成果被美国科学报、自然光子杂志和麻省理工学院学报等作为首要新闻予以报

道，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这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都与恩师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杨先生是我的恩师，更是我的慈父。作为学术导师，先生不仅关心指导我的学业，对我的家庭更是关爱有加，十分体贴。我到钢院读书的时候我丈夫留在中南工大，先生看到我们夫妻分居两地很不忍心，就写信给我的丈夫让他报考章守华先生或刘国勋先生的研究生。每当我丈夫来北京出差，恩师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并支走自己的孩子们，在家里设宴招待我们并请组里的研究生作陪；师母一盘一盘地做，先生一盘一盘地端，我们一盘一盘地吃，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恩师对我任何时候都是无条件支持的，只要是对我的事业、对我的家庭有帮助的事，他都竭尽全力为之奔走。2000年北京工业大学邀请我去做材料学特聘教授，同时邀请我丈夫王生启去北京工大工作，进校领导班子。我将这件事报告给恩师，想听听他的意见，恩师听后尤为高兴。他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积极支持。他希望我们夫妇回国后，在北京工大党委和校务委员会的领导下以麻省理工学院为模式，将北京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办成多材料学科为一体的综合性教学科研基地。当时已经79高龄的他还多次打电话给师先生，商讨此事，并请师先生尽力帮助我们。尽管我们回国的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成行，但是恩师对我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我们终生铭记。

恩师和师母对我女儿王渊的恩情更是世代难忘。八十年代，外地孩子没有京城户口是不能进北京上幼儿园的，然而恩师和师母却让我的女儿破例进了钢铁学院幼儿园，终于了却了我几年的思亲之苦。1982我到钢院读研的时候将刚满一岁的女儿王渊送回安徽桐城爷爷奶奶家，1985年我和丈夫将四岁的女儿从安徽老家

接回中南工业大学上幼儿园，住在丈夫的导师家。由于长沙天气炎热，孩子水土不服经常生病。恩师知道后十分着急，马上就让时任钢铁学院幼儿园负责人的杨师母想办法，与此同时先生又找时任钢铁学院材料系工会主席王玉山老师商量，得到王老师全家的鼎力支持，让我立即将女儿接到北京，住在王老师家里。女儿晚上和周末跟姥姥（王师母），白天大舅送她上幼儿园。杨奶奶（杨师母）就工作之便每天都到班上看望她的小孙女，这让小朋友们十分羡慕，让小王渊非常自豪，初来乍到的她幼小的心灵得以极大的慰藉，使她心情变舒畅，性格变开朗，自信心增强，遇事敢作敢为，全身都充满了正能量，这对她一辈子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我们最为感恩的。杨奶奶和王姥姥为小王渊费尽心机，为她做了最好的安排即让她周末去师大参加幼儿打击乐学习班，每周日小舅陪她去上课；与此同时杨奶奶又在钢院幼儿园安排她参加幼儿舞蹈班，每周六由舞蹈家夏青的高徒、职业舞蹈演员宋产玉老师亲自授课。名师高徒，宋老师精心指导打造了一个远近闻名的钢铁学院幼儿舞蹈队，并带领她的幼儿舞蹈队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全国少儿健美操比赛，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在北京的这些经历让小王渊受益终生，让她在幼小的心灵深处爱上了北京，爱上了钢院，以致于1989年让她来美国与我们团聚时，她哭着闹着就是不肯登机。来美国多年后，她在一篇怀念北京亲人的文章中深情地写到：“飞机载着一个泪流满面的小姑娘盘旋在北京的上空，她俯视着那块她所熟悉的热土，对北京说，我还会回来的。”读来感人泪下。

一九九八年王渊来美国后，努力学习积极上进，荣获各种大奖。一九九五年她以美国东部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美国排名第一的私立高中菲利普学院，获得全额奖学金。一九九九年她高

中毕业，被哈佛大学以全额奖学金提前半年录取，同时荣获美国总统奖。但由于王渊非美国公民，领取美国总统奖必须填写入籍申请；然而她不愿意放弃中国国籍，拒绝填写入籍意愿表，与美国总统奖失之交臂，传为“不拿国籍换大奖”的美谈。这些都与小时候恩师和师母、王老师和王师母及母校对她的辛勤培育是分不开的。

出国以后我和丈夫只回北京看过恩师两次。2011年6月恩师九十大寿，母校为他九十华诞举办了隆重的庆祝会。遗憾的是当时我正忙于学生毕业答辩，没能赶回参加他老人家的寿辰庆祝会。事后孙静远教授给我寄来了一些先生的照片，并告诉我杨先生的身体不怎么好。我听了十分难过，就给恩师打电话，但他老人家在电话中以铜铃般的声音告诉我：“你放心吧，我现在身体很好，每天围绕校园走四圈，一根白头发都没有，以致于外单位的人来家里找我，见我便问，我是来找杨让教授的，你爸在家吗？”。他在电话里极力阻止我回去看望他，并说如果他身体不好了，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北京去看他。我便深信恩师身体硬朗，将会健康长寿。从那以后尽管我和先生的通话较之以前频繁多了，但是每次通话但凡我们的话题涉及到他老人家的健康，他都避重就轻，故意岔开，所以每次通话的内容仍旧多是我的学业和工作，我竟从未怀疑过恩师的身体会有任何的不适。2014年10月的一天，我打电话给恩师汇报我主持召开的IEEE UV 2014新型智能国际会议的成果，他拿起电话就说：“段小曼，可能是我老了，最近突然很想你。”放下电话我便立即与丈夫作安排，决定尽快回北京去看望恩师。然而不曾想到，11月初我突然收到李静波校长来电，告诉我恩师谢世的噩耗，令我悲痛万分，痛哭不止，后悔不已。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恩师和师母怕影响我的工

作，一直向我隐瞒着恩师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我和丈夫匆匆赶回母校为先生追思，那种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成了我终生的伤痛。

恩师一生功劳卓著，功德无量；他虚怀若谷，低调做人；他谦虚谨慎，严谨治学；他对学生关怀备至，甘当人梯；他博爱大度，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受益终生。恩师杨先生的精神时时激励我奋进，鞭策我不懈地努力。我定以先生为楷模，潜心治学，立志为光电半导体和再生能源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让恩师杨先生的精神代代相传。

段小曼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硕士、博士毕业生
现就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我深深敬仰的老师

——忆杨让老师二三事

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我的导师——杨让，就是以他满腔的热情、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承担了我国开发硅锰系列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的重任，呕心沥血地带领着他一届一届的学生投入国家新材料的研发。

他告诫学生要热爱自己的专业，要有责任感，有担当，要承担起祖国的重托，要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他谦逊严谨，兢兢业业，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凭借着对教书育人的无限热爱、对学术科研的执着追求，深深影响着身边的学生。

他培养学生的概念理解能力、逻辑思考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致力于开放型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教导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鼓励学生用发散思维进行实践和创新。

他平易近人，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做试验时，研究单位的实验室里接触的大多是他的学生，他对曾经的学生态度谦和委婉探讨。他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他用无限的师爱，开启学生的心智远航。

1975年底，我有幸跟随杨老师参加用于火箭发射架，《30SiMnMoV 超高强度结构钢》课题研究。杨老师是我仰慕已久的教授，这个课题又是国家重要的课题，心中暗喜，我太幸运了，可以近距离聆听老教授的教导，还可以参与国家重要课题。

但又有点惧怕，自己一个毛丫头什么都不懂，怕教授不接纳。那时我们差不多每天在一起对新材料进行“透射电镜、扫描电镜、电子探针”的试验、探究。刚开始我们同学对测试结果小声讨论，不敢让杨老师听见，怕提出问题太幼稚，被老师瞧不起，但杨老师从未说过我们，慢慢我们的胆子越来越大，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响，有时是大声争论。杨老师每回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笑嘻嘻的看着我们，又好像在细细的想着。当我们胆怯的问他说得对不对时，他就会说：“你们说，你们说，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只要你觉得有道理，就可以说。”



夏菊琴与杨让老师夫妇合影

在我看来，杨老师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教授，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师长、一位慈父。他是那样的爱护学生的

“首创精神”，从不打击学生的研学积极性，还不时地鼓励我们光明磊落、据理力争，这种对科学的敬业精神一直贯穿在我们学习、研究的始终。他还引导我们大量查阅期刊、资料，特别是外文资料，并教导我们把常用的单词分别记录，有助记忆。在他的鼓励下，我们提出了我们的研学观点，常得到杨老师的肯定。

在校时，从杨老师这里学到的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探究的作风、敢于表述的精神，在我今后一生的专业工作中受益匪浅，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我深深地感激他！

我是一名学生党员，在校时就得益于杨老师的爱护和包容。记得毕业后的一次书信交流中，杨老师曾兴奋地告诉我，经过他的努力，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说是当年在我的影响下，就有了入党的心愿，我听了有点惭愧，但我真为他感到高兴！一个老师竟然对他的学生说出多年埋藏在心底的愿望，可想他对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多么的渴望！对党是多么赤胆忠心！我深深地敬佩他！

1976年一个夏天的夜晚，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我们课题组当晚刚从鞍钢回校，一天旅途劳顿，当晚又遇地震，可想有多疲惫不堪。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有同学就冒着余震的危险帮杨老师家搭起了简易的地震棚。杨老师家住一楼，我记得那天我和另一位同学正上杨老师家探望，突然余震袭来，房子一阵抖动，杨老师赶紧推托着我和另一位同学从他家窗户里往外送，然后他自己再从窗户里跳出来。他把生的第一希望送给他的学生，然后再是自己。惊险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这就是我们深厚的师生情谊。我深深地敬仰他！

愿我的母校永远是祖国的钢铁摇篮！

夏菊琴 原上钢三厂中心实验室高工

杨让教授和他的团队

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的中国还很穷，工业落后，科学不发达，又受到先进国家的技术封锁。在这样残酷的条件下，为了奋起直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中央拟定研制太空飞行器的目标，并把其中研发“超高强度钢”这一项任务通过国防科委和冶金部委托下属单位开展研究，为未来人造卫星推进器和火箭发射器的研制打下坚实的材料工程基础。

任务下达至冶金部管辖的三个主要科研单位：北京钢铁研究院，东北工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三个单位都热切地奋起应聘，相互竞争，并且在规定限期内各自交出研究成果。经过分析和评比，由北京钢铁学院举荐的“32 SiMnMoV低合金高强度钢”以其低廉的生产成本、优异的机械性能、良好的工艺参数和符合国家资源而被与会者一致评定为最佳成果，准予进一步开展工业试产。

领导这项试验工作的正是北京钢铁学院金属材料系杨让教授。

杨让教授，陕西省人，出生于1922年，青年时期，怀着实业救国的一股雄心就读于西北工业大学矿冶系。勤学苦读的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解放后在院校调整中顺利进入北京钢铁学院任教。

杨教授自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组织起一个团队。由于课题要求严格，完成期限急迫，教授不得不步步为营，风餐露宿，亲自督导每个环节。从试验方案的设计、每一步生产过程、样品的

委托加工、数据的处理等等，一丝一毫都细致过目，不敢稍有松懈。他除了严以律己外，还对团队每个成员不断循循善诱，严格要求，令大家都明确肩负的重任，团结一致，共同投入到这神圣的事业中去。虽然团队人数不多，但工作不分彼此，事无巨细，只要是需要，都同心协力，共同完成。

试验期间，一位成员患了乙肝，理应休养，但他仍然坚守岗位，顺利完成本职工作。另有一位女团员刚刚分娩，就接到任务要上东北出差。她以其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二话没说，抱起嗷嗷待哺的婴儿就去赶火车，车上人挤，做母亲的不得不把孩子躺在茶几上而自己贴身站在一旁保护，就这样完成了14个钟头的旅程。

在“文革”风暴的日子里，一位团员受命到沈阳某飞机制造厂开会，这是一个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重要会议。那阵子市场物质匮乏，整个沈阳市的零售柜台上除了纽扣别无他物供应。会议成员报到后，每人发给捡来洗净的冰淇淋棍两根，说明是当作吃饭筷子用的，还特别声明遗失不能补发。果然，三天会程过后这位老师也只能饿着肚子返回北京。

课题中有一项试验，要求制备缺口半径为0.05—0.1mm的试样。当时北京的机械行业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团队成员到处奔波而都没有结果，又是教授亲自出马多方联络，说服了老师傅深入钻研才解决了难题。

就是这样，教授每每在工作中迎难而上，迎苦而上。比如钢锭的锻造成形，由于人手缺乏，不得已教授身先士卒，每次锻造都亲自值夜班看守加热炉8个小时，直到天明才交给锻工接手。类似事例不止一起。

教授的年龄比团队任何人都大得多，身患肠胃等毛病，但他

经常忍隐不发，每每带病出差，远至重庆、西安、包头等地，在外地遇病又不求医，直至回校才休息。

一生淡泊功名，勤恳敬业，生活俭朴的杨让教授终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迎来了绿色的春天。国防工办取得了合乎标准的合金后，立即加工成样品，进行点火试验，首次试验时还邀请教授前往爆破点视察。测试的结果充分证明了新的合金能坚定地接受实战的考验。这时候，无数双手向教授伸来，无数对眼睛闪烁着赞许的目光，教授的脸上终于露出幸福的微笑！

何肇基 原为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师
后调到广东工学院（现广东工业大学）



赵锡霖
ZhaoXiLin
(1913年—1992年)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北京钢铁学院民盟主任委员。金属材料专家、翻译家、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建校元老。在校工作的四十年，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对同志直率坦然，诚恳相待；对青年平易近人，热情关怀。无论是工作中还是在蒙难时，始终保持乐观积极态度，坦荡度人生。他为北京科技大学改革开放后与国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作出重大贡献。

赵锡霖简历

生于1913年5月，河北乐亭县人。

1925年—1931年 入学北京汇文中学理科。

1931年—1935年 保送北京燕京大学化学系。

1935年—1937年 赴日本帝国大学工学部学习日语及收集日本工业情况资料。

1937年—1938年底 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留学，期间参与宣传、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1943年 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金属研究所工作、任教。

1944年—1947年 赴瑞士，在EscherWy 33工厂工作。

1947年—1948年 回到北京，应聘天津北洋大学工作。

1948年—1952年 受邀在北京清华大学化工系任教。

1953年— 全国高校院校调整，调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金相热处理系任教。

生平介绍

1925年，小学毕业后从哈尔滨来到北京，同年夏，考入北京汇文中学理科，在此学习期间接近进步组织，思想上受到进步影响。

1931年中学毕业，由汇文中学保送北京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在校期间曾组织俄文学会，帮助同学学习俄文。

1935年夏，燕京大学毕业，后于1935年8月赴日本帝国大学工学部学习日语，同时搜集一些日本工业情况的资料。1937年2月回国。

1937年6月赴德，留学柏林工业大学。刚到德国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爆发，赵锡霖与乔冠华（曾任外交部长）、陆达（曾任冶金部副部长）等一起参加抗日联合会工作，联合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宣传支援国内抗日工作，同期在柏林工大做论文至1938年底。

1939年9月至1943年8月，转至该校金属研究所继续研究工作，撰写论文并任助教。在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时，为了提高德语水平，该校专门为中国留学生组织德语语言课，并聘请了在哥廷根大学获得哲学、语言学博士学位的林克悌（Kaethe Linke）女士为他们讲语言课。林克悌博士在此期间，认识了在该校留学的赵锡霖先生。林克悌对中国一直怀有同情友好的感情。她与赵锡霖邂逅，渐渐发生了感情、相爱，并于1941年在柏林结婚，先后育有一对儿女。

1944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柏林遭遇大轰炸，他们离开柏林在克劳斯塔尔矿业学院任教。

1945年10月赴瑞士，在瑞士Escher Wy 33工厂做材料试验工作。

1947年3月赵先生夫妇携一双年幼子女回到中国北京。之后，于1947年8月至1948年8月双双应聘到天津北洋大学工作。赵锡霖先生讲授《金属材料学》。夫人赵林克悌精通多国语言，在北洋大学开设了德、法、俄三门课程。她自编教材，用从德国带来的打字机打印讲义。她重视课堂练习和朗读，深受学生欢迎。

1948年底，赵锡霖教授夫妇受邀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赵锡霖在化工系任教，赵林克悌讲授俄文。她也是清华大学俄文学习

委员会委员。



北洋大学



1947年赵锡霖教授夫妇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赵锡霖教授从清华大学转到新成立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任金相热处理系金相热处理教研室主任。建校初期，因学校教学执行苏联高校的教学计划、使用苏联教材。一、二年级学生在清华大学学习基础课，三年级学生因无专业课教材，只能安排到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钢厂等厂矿实习。故赵锡霖教授于1953年参加并组织金相教研室教师翻译了苏联的专业课教材。

1953年9月，在鞍山实习的同学结束实习后回到了借住的清华大学。这年10月，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在海淀区满井村建成了部分宿舍，钢院全体学生和部分教师从清华迁至新校址。1953年入学的新生此时到新校址报到。新生入学后，金相及热处理系在东饭厅召开了迎新大会。会上，赵锡霖教授代表金相及热处理教研室讲话，欢迎新同学加入专业队伍。他把金相及热处理专业比喻为“钢铁大夫”，要求新同学克服困难、搞好学习、全面发展。赵锡霖教授像谈家常似的浅显风趣的讲话引起一阵阵掌声，受到同学的热列欢迎。

1954年春季，赵锡霖教授为金相-54届班级主讲专业课《合金钢》。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每年都利用暑假到德国克鲁伯等工厂去实习，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在讲课中经常列举一些实际例子，说明合金钢在实际中的应用，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各种合金元素在钢中所起的作用。

1954年夏天，相-54届学生毕业。系里为毕业学生在东饭厅举行欢送会，赵锡霖教授在会上讲了话。他勉励学生积极参加我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作为教研室主任，赵锡霖教授负责组织全教研室的教学安排以及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在“向苏联学习”的要求下，组织全教研室的教师和进

修教师听苏联专家的“热处理车间设备与设计”讲课、安排每个教师补作热处理车间设计、给每个教师安排讲课、实验和带同学下厂实习的任务。他对青年教师也总是热情关怀、尽力给予帮助。



赵先生（后排右2）与教研室同仁及相-54届毕业

1957年5月，全国开展助党整风运动。赵锡霖教授作为北京钢铁学院民盟主委，经常参加院党委召开的助党整风座谈会，并在会议上发表了一些意见。1957年7月，全国开展所谓反击“右派言论”的反右运动，对赵锡霖教授的言论也进行了批判。主要批判他，诸如说院党委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不能平等对待民主党派等等。赵锡霖教授坚持自己是诚心诚意帮党整风，并无恶意，但院党委认为他态度不好、拒不认错，并于1957年末，将赵锡霖教授定为右派分子。

1958年初，赵锡霖教授被调离教研室，到图书馆被劳动锻

炼、工资降低5级。他半天打扫卫生，半天做图书馆外文资料的翻译工作，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文革”中，赵锡霖教授又一次受到冲击与批判。之后，送他去学校在河北安平县的干校参加劳动。在干校，所有所谓有问题的人被组成一个“专政对象”劳动组。他也被编入其中。期间，往往白天劳动之后，还要求他们晚上加班劳动。1971年，赵锡霖教授的夫人、北大西语系赵林克悌教授将赵锡霖犯青光眼的眼疾一事反映给了领导，此事反映到上级领导，钢院接到通知，为照顾其家中困难，将赵锡霖从干校调回到学校。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1957年反右中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甄别改正工作。在讨论赵锡霖教授右派问题时，大家反复讨论，认为他在1957年的助党整风时提出的意见，虽然比较尖锐，但本意是希望党委改进工作作风，更好地团结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把学校工作做得更好，把赵锡霖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改正。

1978年7月，经北京市委正式批准，正式摘掉了赵锡霖教授右派分子的帽子并赔礼道歉。此后，赵锡霖教授又回到了金相教研室。

1978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学校也面临着与国际上发达国家开展教学、科研、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工作。为了学习发达国家教学、科研方面的理论和实验技术，许多教师都在为准备出国学习外语。期间，赵锡霖教授除了为学生开设英语专业课外，还为许多教师辅导英语和德语，帮助他们提高外语水平。一些教师在赵锡霖教授的辅导下，提高了外语水平，先后出国留学。

1979年到1988年期间，在教学方面，赵先生先后指导了三名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后因身体欠佳，就很少担任教学科研任务

了。

1979年5月，我校派代表团赴德国访问。鉴于我国开放后，两校间开展学术交流较早，我校又有教授在三、四十年代曾在亚琛工大留学，故在德国亚琛访问期间，签订了两校合作协议。这是我国、也是我校改革开放后，与外国大学签订的第一个合作协议。此后一段时间，赵锡霖教授继续多次参与德国大学教授来访的接待与翻译工作，起了重要的桥梁与沟通作用。德国亚琛(Aachen)工业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是最早与我校建立联系的大学。1979年春，柏林工业大学欧特斯(Oeters)教授与亚琛工大的达尔(Dahl)教授先后来我校讲学，赵锡霖教授都积极参加了接待和翻译工作。



赵锡霖教授（左4）等接待亚琛大学达尔教授（右4）与柏林工大欧特斯教授（右2）

1981年9月至11月，赵锡霖教授夫妇应德国洪堡基金会的邀请赴德国访问。期间，专门访问了亚琛工大，畅谈两校合作的成绩与友谊，并且与我校在亚琛留学的教师见了面。

此外，赵锡霖教授继续积极参与《百科全书》冶金卷和《钢铁》期刊的编辑、外文翻译、审阅、修改等工作。他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冶金卷》（1984年版）编委副主任、《钢铁》期刊编委。

赵锡霖教授的翻译工作内容十分广泛。1981年，为德国Petzow教授在沈阳金属研究所讲课翻译课本、为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Petzow教授讲课的中文翻译本作校对、为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共析共晶复合材料》的中文译本做校对、受石油化工部委托翻译德文书《煤的气化》。1982年受德国亚琛大学Dahl教授委托为北京科技大学翻译亚琛大学冶金课程计划、冶金系炼钢、轧钢、材料、企业管理系工程师学位规划、博士学位规划；为德国柏林工业大学Oeters教授来北科大报告的炼钢学、钢铁技术工程、高炉数学模型的中文课本作校对；下半年参加接待多位从德国柏林工大、亚琛工大等单位来科大讲学的教授（如Oeters、Dahl、Buehler、ElGammal等）、参加会谈工作并做翻译。除此之外，他还为德国Leiz和Buehler两公司在钢铁学院展览撰写协议、翻译和接待工作，为特殊仪器写说明书；为许多单位撰写德文协议书、为洪堡基金会翻译德文稿件等。

赵锡霖教授回金相教研室后，虽身体欠佳，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病症和眼疾，但他仍坚持努力发挥他的专业知识以及精通多种外语的专长，为学校培养人才、为学校的对外交流和改革开放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1986年12月，根据学校规定，赵锡霖教授办理了退休手续。

经冶金工业部批准，赵锡霖教授享受离休司局级待遇。

总之，赵锡霖教授自青年时期即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在国外留学期间参加抗日的爱国活动。1952年加入民盟，曾任民盟北京钢铁学院支部书记委员。担任金相热处理教研室教授、主任。他多年来一贯兢兢业业从事教育工作，为培养青年教师和各类专门人才努力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绩。他讲授专业课、指导研究生，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矿冶卷冶金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之一。他还参加了《钢铁》期刊的编辑工作。在年老体弱的情况下，他仍满腔热情的投入教学工作和社会工作，编辑和翻译了大量资料，做了大量与国外学术交流的翻译工作，为加强学校与国外大学的学术交流和友好交往做出了很大贡献。

编者收集整理

赵锡霖教授和夫人林克悌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去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留学的中国学子不少。到异国学习，首先要学习掌握该国的语言。因此柏林工大也为外国留学生开办了德语学习班，并聘请了林克悌女士担任学习班的教员。



赵锡霖夫人赵林克悌与一对儿女

说起林克悌女士非常不简单。年轻时，为帮助家庭、补助家用，早在她12岁时就已经开始利用课余时间给富家子弟补习功课。直到读大学，她也一直坚持勤工俭学、担任语言辅导、口译、笔译等工作。她曾先后在柏林、海德堡及著名的哥廷根大学学习日耳曼等语言、历史学与哲学等课程并早在1935年已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她一度担任中学教师。那时，正值希特勒法西斯统治并疯狂迫害犹太人的时期。林克悌女士是个特别善良、正直的人。她坚持正义的立场、反对法西斯暴行、不顾自己的安危，竭尽所能营救犹太青年逃亡英国，自己却因此获罪，被盖世太保抓入狱中，受尽磨难。幸得友人相救，她才得以逃离虎口。此后，她开始为当年在柏林工大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教授德语。然而，此时，纳粹间谍仍继续对她进行迫害和骚扰。为使她从这种情况中解脱出来，她的友好同事建议她考虑嫁给一个来自中立国家的男子，以便获得中立国公民的身份，从而受到保护。林克悌女士接受了这个建议。在与众多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中，她认识了正在柏林工大留学的赵锡霖。他们从相识到相爱、相恋，最终于1941年在柏林成婚。

从此开始，林克悌女士不但成为赵锡霖的妻子，同时，也开始了林克悌女士与赵锡霖患难与共、并与中国无怨无悔地结缘70多年的一生！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赵锡霖夫妇及两个可爱的儿女终于回到了中国。起先，夫妇二人在天津北洋大学应聘任教。1948年下半年，赵先生夫妇转到了清华大学任教。

1952年，赵锡霖先生因院系调整，调到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金相及热处理系任金相及热处理教研室主任，而赵夫人继续在清华大学外语系任副教授。1952年赵夫人还曾作为清华大学先进工作

者代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54年赵夫人由清华大学调至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并成为赵林克悌教授，直至1987年退休。

几十年来，赵林克悌教授在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工作一如既往，不论在教学中还是翻译等工作中，一贯地严谨、热情、勤奋、极端认真负责。她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工作受到任何干扰。她的工作态度，不论是同事、还是历届学生、朋友中众口皆碑、人人称道！然而她的内心也曾承受过巨大的压力和痛苦！

1957年，全国那场反右运动，使赵林克悌的家挺突然遭受巨大的政治劫难。赵林克悌的丈夫、赵锡霖教授在钢铁学院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不仅遭到降职、降薪的处分，而且还被迫离开教研室，失去了从事教学工作的资格。他们子女的前途也因此受到无端的牵连，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环境虽然要求赵夫人与丈夫脱离关系，但她坚决拒绝了。她勇敢地面对严峻的现实，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家庭重担、尽可能地照顾丈夫和子女，努力保护这个家庭。

1966年，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家庭又一次地受到巨大的打击。赵林克悌虽早已在1953年加入中国国籍，却仍被看作外籍老师，同样遭到了红卫兵不止一次的抄家、打砸抢和批斗。她的丈夫也继续背负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更让她十分痛心的是丈夫失去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然而，再大的磨难，也未能动摇她的意志。她一方面没有像有的右派妻子那样，在政治灾难临头的时候、在自己的配偶正需要家庭温暖和精神慰藉的时候、赶紧与丈夫划清界限甚至回到德国，而是坚定的要与受难的丈夫及孩子们留下来，用自己的爱心安抚丈夫，在危难中不离不弃。另一方面，她不仅没有因心中的委屈和不解而懈怠自己的工作，而是

一直坚持积极作她力所能及的工作。1967年开始，她应邀在国家外文局兼职，无偿为外文出版社和《北京周报》担任翻译工作，并先后为《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以及《中国基本情况》等丛书的绝大部分翻译、修改和定稿等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78年，赵锡霖教授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彻底改正。他回到了教研室、恢复了教授的职称，又可以重拾教职。赵林克悌的心情也重新开朗起来，显得格外兴奋，并郑重地把亲密伴侣介绍给朋友。得到改正后的赵锡霖教授也重新热情百倍、争分夺秒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70年代末摄于家中

1981年，夫妻俩还应德国洪堡基金会的邀请重返德国进行访问。

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时，赵锡霖教授曾无比激动地说过：“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帮助我从最艰难的困境中走了过来。我坚信，无论何时何地，我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炎黄子孙的血！”相信，赵锡霖教授最终是幸福的！他的妻子、一个外国人、一个出色的奇女子、抛开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祖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热爱中国，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艰难曲折和苦难，却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渝热爱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学生！她保住了自己的家庭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所热爱的中国！

撰稿人；孙静远 原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与工程学院教授

坦荡度人生——忆赵锡霖教授

赵锡霖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几年了。每当回忆起他，他的音容笑貌和直率热情、豁达乐观的性格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一九五二年九月，北京钢铁学院师生在清华大学集合。当时北京钢铁学院是汇集了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工学院、山西大学和西北工学院的材料、矿冶学科的师生而成立的。在清华期间，一、二年级学生在清华上课，我们三年级，由于苏联教材尚未翻译出来，所以在教师带领下，全部到鞍山钢铁公司和抚顺钢厂实习。赵锡霖教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清华大学化工系调到北京钢铁学院金相热处理系任金相热处理教研室主任的。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们在鞍山实习结束后回到了清华大学。这年十月，北京钢铁学院在海淀满井村建成了部分宿舍，钢院全体学生和多数教师从清华迁至新校址。一九五三年入学新生也在此时到新校址报到。新生入学后，在学校东饭厅召开了欢迎一九五三级金相专业新生大会。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赵锡霖教授。他个子不高，胖胖的、带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有点卷曲向后背，宽宽的额头、脸上总挂着一丝微笑，一个慈祥长者的样子。在会上，赵锡霖教授代表金相教研室讲话，欢迎大家加入金相专业队伍。他把金相专业比喻为钢铁“大夫”，简单介绍了金相专业的任务，要求大家克服困难，搞好学习，全面发展。赵锡霖教授像谈家常似的，浅显风趣的讲话受到同学的欢迎。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我们升入四年级，开始上专业课《金相学》、《热处理》。一九五四年春季，我们进入四年级下学期，专业课《合金钢》由赵锡霖教授主讲，在讲课中结合他在德国克虏伯工厂实习的情况，经常举一些例子说明合金钢的不同品种和用途。我记得很清楚，赵老师在讲到铌钢时，说含铌钢可以制造反坦克炮弹，炮弹击中坦克后可粘在坦克上，然后爆炸，摧毁坦克。

一九五四年我们毕业，系里在东饭厅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会。会上赵锡霖教授讲了话，他勉励我们要积极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



赵锡霖教授在欢送会上讲话

之后，我们班同学按分配工作性质，分别与老师们在理化楼前照了像，赵锡霖老师与我们一起合影。



赵老师与我们合影（赵老师在第一排右四）

我毕业后留在钢院金相专业工作，与赵锡霖教授接触多了，在教研组会上经常听到他的讲话。赵老师对青年教师总是热情关怀，尽力帮助。那时苏联专家索罗基辛来到北京钢铁学院讲授《热处理车间设备与设计》。为了对苏联专家表示尊重，全教研室的老师不管教什么课，都去听苏联专家的课。赵锡霖教授作为教研室主任，自始至终参加了听课。苏联专家讲完课后，要求教研室的年轻教师都要做一个课程设计。我被分配在赵锡霖老师指导下做设计。苏联专家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设计一个年产三百万吨薄板热处理车间。我觉得，作为课程设计，这个题目太大了。于是，就去请示赵老师。老师说：苏联专家出的题目也不一定都合适，可以调整一下。与赵老师商议，把课程设计题目改为一百万吨，从这里可以看出赵锡霖老师实事求是处理问题的精神。

一九五七年五月，全国开展了整风运动。赵锡霖教授当时任民盟北京钢铁学院负责人，经常参加院党委召开的帮党整风座谈

会(即大鸣大放会),并在会上发表一些意见。到了一九五七年七月,全国开展了所谓反击,赵锡霖教授在座谈会上发表的一些意见遭到了批判。一九五七年末,赵锡霖教授被定为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赵锡霖教授被调离教研室,派到图书馆劳动锻炼。后来听说赵锡霖教授在图书馆一边打扫厕所卫生,一边作外文资料文献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赵锡霖教授又一次受到了冲击。一九五七年反右中的所谓问题又一次被揭发出来进行批判。一些老教授,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也受到了批判,并与赵锡霖教授一起被惩罚做扫厕所等体力劳动。即使是扫厕所,赵锡霖教授也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柯俊教授曾说过,全校最干净的厕所就是赵锡霖打扫的那几个。一九七一年我去河北安平干校劳动,曾见到赵锡霖教授,他在一个所谓专政对象劳改组中劳动,什么活都干。赵锡霖教授后因眼疾调回北京。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后,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要拨乱反正。一九七八年又提出对一九五七年反右中错划的右派进行甄别改正。当时我任材料系党总支副书记,主持全系改正工作。我们对全系划的右派逐一进行了讨论。在讨论到赵锡霖教授时,有人提出,如果赵锡霖不是右派,全院就无右派了,意思是赵锡霖的改正要慎重。后来经过大家反复讨论,认为,赵锡霖教授在一九五七年整风中提出的意见,虽然比较尖锐,但他的本意还是希望党委改进工作作风,更好地团结民主党派和广大教师知识分子,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把学校工作做好。因此,认为一九五七年把赵锡霖划为右派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改正。由于赵锡霖是高级知识分子,对他的改正,需要报党委转市委批准。

我记得是在一九七八年七月,学校党委通知说,赵锡霖教授

的改正已经北京市委批准，要我们总支与赵锡霖教授谈话。一天下午，我约赵锡霖教授到总支办公室来。我说：“经过党委讨论，报北京市委批准，认为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您对党委提了些意见，本意还是要帮助党委改进作风、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学校工作做好。因此，将您划为右派是错误的，给以改正并向您赔礼道歉。您对此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希望听听您的意见。”在与赵锡霖教授谈话前，我心里曾准备着他向我大大地发泄一番，甚至骂一顿。但出乎意料，这二十年的冤屈，他不但没发火、“骂人”，反而心平气和地向我说：“老李，我没什么意见，最后终于改正了，恢复了我的原来面貌就行了，没什么其他要求。”我说：“这二十年使您蒙受了冤屈、影响了您的工作、牵连了您的家庭，很对不起！”他说：“老李，别这么说。这些年来我也思考了许多问题，参加了一些劳动，身体得到了锻炼。你看我的身体多结实！”说着，他露出结实的手臂肌肉。赵锡霖教授不计前嫌、心胸宽阔、乐观厚道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使我热泪盈眶。我心想，多么好的一位老人啊！受了这么大的冤枉，竟然一笑了之，“相逢一笑泯恩仇”。

一九七九年我调到院教务处，后来又到学院工作，赵锡霖教授已回金相教研室工作。改革开放后，学校的对外交流渐渐多了起来。我听说，当时冶金部副部长陆达三十年代曾留学德国，早年与赵锡霖教授相识。八十年代，陆副部长接待德国朋友时，常常请赵锡霖教授参加并做翻译工作。有时学校外事活动遇有德国朋友，也请赵锡霖教授参加。可以说，赵锡霖教授为我院开展与德国大学、研究机构的交流和合作做出了很多贡献。

我到院里工作后与赵锡霖教授很少见面，有时在校园里见到他，总是见他骑着自行车来去匆匆，我们只是打个招呼。有时他

会下车说几句话。记得有一年夏天，在主楼前，我见到赵锡霖教授，他下车，摘下墨镜片，对我说：“老李，要注意身体呀！”我说：“赵先生，您年事已高，以后不要骑车了吧！”他说：“我已七十八岁，骑车也是个锻炼。你看我，由于经常活动，多结实！”说着就弯起手臂，露出他上臂凸起的肌肉。走时他还嘱咐我说：“老李，注意锻炼身体啊！”根据赵锡霖教授的精神面貌和健壮身体，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年近八十的古稀老人。好像是过了几年，听金相教研室的老师说，赵锡霖教授在一天午夜，突发心脏病仙逝。我听了之后心里十分悲痛！我心中的赵锡霖教授，仍然是那个健壮、潇洒、乐观、快乐、慈祥的、骑自行车的老人。

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赵锡霖教授一九五三年从清华大学化工系调到北京钢铁学院金相热处理系工作，历经近五十年。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因为给学校党委提意见，赵锡霖教授被划为右派分子，蒙冤二十年。在这样沉重打击下，赵锡霖教授仍然保持乐观主义态度，坦然以待。赵锡霖教授对工作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对同志直率坦然、诚恳相待，对青年平易近人、热情关怀。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蒙冤过程中，他都保持了乐观、积极的态度。赵锡霖教授的一生是在乐观、积极、直率、诚恳中度过的，是坦荡的一生。赵锡霖教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撰稿人：李静波 原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2021年5月

纪念赵锡霖教授

赵锡霖教授在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建校初期即由清华大学调来我校，担任金相与热处理系的金相教研室主任，所以也是我校建校元老之一。不幸的是，赵先生于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从而被迫离开了教研室的教学与科研岗位。直至“文革”之后的1978年，错划右派被平反改正，赵先生才从图书馆回到了离别多年的教研室。那时他已由44岁的中年人变成了65岁的老者！



赵先生（后排右起第四人）在图书馆“改造”期间

赵先生虽背着右派身份长达20余年，但长期在图书馆，所谓劳动改造期间，除了出色完成劳动任务之外，还一直认认真真地用他熟练掌握多种外语专长完成各种外文资料（德、英）的翻译、编辑等任务，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赵先生回到教研室的头几年仍有许多广泛涉及外文，尤其是德文的工作任务。那时，赵先生是我们学校全面掌握德语的第一人，正是赵先生，此时也大有用武之地了。1978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我校即率先与西德亚琛工业大学签定了两校合作交流协议，并开始定期互派专业人员进行广泛交流。而交流的重要前提首先就是要掌握德语。那时，我校内能流利地运用德语进行日常的、以及冶金等专业方面全面交流的人就是赵锡霖先生。他用娴熟的德语发挥了很大的桥梁沟通作用。如，他积极参与西德亚琛工业大学等代表团来校访问时的接待工作、担任会谈及访问期间的全程翻译；还积极为西德诸教授来校讲学担任专业翻译；他受亚琛工业大学两校联系人Dahl教授之托，翻译亚琛工业大学冶金系的炼钢、轧钢、铸工、材料学等各专业，以及该校企业管理系的学习计划、工程师学位规则及博士学位规则等重要办学文件，帮助我校更深入具体地了解亚琛大学的办学情况及各种标准和要求；他还接待了头几批由我校负责安排来华实习的亚琛工业大学学生实习团等……。赵先生不仅在校内，而且在校外，与德语有关的业务工作也相当广泛、繁重。如，为赴沈阳金属研究所讲学的德国Petzow教授翻译讲课教材，并帮助落实中国科技出版社协议出版Petzow教授讲课教材的事宜；受机械工业出版社、化工部等部门委托，校对德语有关专业书的译文，等等。

1980年，赵先生还担任从事过“中国大百科全书”（1984年版）冶金篇的编辑工作。他也是冶金编委会的副主任之一。



中国大百科全书冶金卷编委会在我校开会（前排左六为赵先生）

又如，受本校冶金系之托，为柏林工业大学冶金系主任 Oeters 教授来校讲学的讲稿作中文译稿校对；为《钢铁》期刊做审稿、修改稿件、编辑等工作；又积极支持我校外事办事处的工作，做了众多的来往信件的翻译工作等。总之，赵先生始终以饱满的热情，认真完成了许多与德文有关的事情，在促进、加深两校、两国互相了解的文化交流中，几乎是来者不拒、倾其所能、十分忙碌，默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此，我特别想提及的一件事是我亲身经历、并有深刻印象和体会的事。那个时期，赵先生还担任了帮助本校老师补习、辅导德语的工作。根据两校合作协议，我校将于1981年秋公派四位教师赴亚琛工业大学进修，我很荣幸地是其中之一。但当我突然得知要担负这个任务时，内心是很担心的，心里实在没底、担心自己到了亚琛大学后，什么也听不懂、话也说不出来，怎么办？

小时候，我虽在德国上到小学三年级，但回国以后，也没有人和我讲德语了。很快，就把德文几乎忘光了！可这时，需要我迅速地掌握大量的日常用语、尤其是更大量的专业词汇！而我却几乎都是空白，真是困难不小！但我对学习德语却始终是感兴趣的。“文革”中，没什么事干的时候，我曾按外国语大学的基楚课本自学过一段德文语法，自感收获不小，可张嘴说话和人交流，尤其是专业德语，还是完全不行的！就在这个时候，我有机会向赵先生请教、做赵先生的学生，学习德语！赵先生选用赵夫人、北大西语系的赵林克梯教授等编写的著名《科技德语课本》为基本文，反复教我学习如何分析德语文章中的复杂句子、句法结构……，对我帮助真是太大了，给我极深的印象，让我终身受用！并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

赵先生知道我将赴亚琛工业大学进修，非常高兴！多次鼓励我要学好德语，珍惜时间，不断提高学习效率。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学习外语要坚持不懈，细水长流的重要方法。要我每日严于律己、尽量多练德文，多看各种期刊、多看参考书。要听、说、看同时并进。遇到有妙句、格言及难句，并要养成随时专门记下的好习惯。要勤查字典，最好背诵、日积月累。到德国后，不必要时，不要讲中文。赵先生认为，在德国讲中文很不合算，以30分钟计，中国人围聚讲中文，半年会损失100学时讲德语的时间！故彼此应约法三章，不用中文。在食堂要多和德国朋友在一起，尽可能多交德国朋友。……我想，这也是赵先生教我学好外语的重要经验之谈吧！

1981年9月到11月，赵锡霖教授夫妇应洪堡基金会的邀请重访德国。10月16日这一天，我们竟在亚琛的大街上巧遇赵先生，十分高兴！当晚，我们五个人即去了亚琛的Lousberg Hotel看望

赵先生。赵先生对我们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了解我们的近况、鼓励我们在亚琛好好学习，做出成绩！

1992年，八十来岁的赵先生，仍老当益壮，身体、精神一向不错。那年春天，老先生还从北京大学住处骑着自行车前来参加校庆活动。



1992年校庆，在主楼前合影，赵先生坐在中间

遗憾的是，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赵先生。赵先生不幸于六月份、女儿回来探亲的那天夜里，突然发病去世。转眼，赵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九年！但赵先生的音容笑貌却仍然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赵先生曾经如何热情地指导我、帮助我、鼓励我认真努力学好德语的情景，将永远留在我心中！

撰稿人：孙静远 原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与工程学院教授

斯人往矣

——记赵锡霖教授二、三事

1952年经全国院系调整，北京钢铁学院应运成立，建校之初寄校清华大学一年。1953年赵锡霖教授由清华大学化工系调整到北京钢铁学院，任金相教研室（组）主任。

赵教授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同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37年至1939年在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柏林高工）学习，科研题目是，用热分析方法测定Al-Cu-Zn三元系相图。1939年至1947年在柏林、瑞士等地工作。1947年回国，在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任教一年。1948年受聘清华大学化工系。院系调整后，来北京钢铁学院，1987年离休。

由1953年至1987年他在北科大工作34年间，大体可分解为三个时间段：1953年至1957年任教学工作及教学行政工作；1957年至1979年在图书馆工作；1979年至1987年重返教学工作。

在第一时段，他曾进行的主要工作：1. 亲临鞍山钢铁公司，关照当时在鞍钢进行现场教学的相-54同学的学习，以及“物理检验”专业的教学方向问题；2. 为金相专业高年级同学讲授了一门专业课：合金钢学。他以合金元素为主线分析各类钢种问题；3. 参与解决生产问题。50年代初期，鞍钢薄板厂的薄板轧制出现了表面黏结的质量问题，冶金部邀请了一些专业人士齐聚鞍钢，研讨解决此质量问题，赵教授是被邀的其中一员。

写到这里，插补一段与合金钢课程内容有关的小故事。约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笔者有机会参观了位于慕尼黑的一个科技博物馆，内容丰富、世界有名。在某一馆中偶遇一展品，它是一个重型坦克被一穿甲弹击中后的实体展品，穿甲弹以接近90°的角度击中坦克甲板，弹头被阻挡于前进的途中，弹头的一半已进入钢板后被卡住了，甲板未破碎，在受击孔的周围，也无裂纹产生。展览方企图用此实例来宣传德国钢种的优越性能，即为高强度高韧性的合金钢种。在赵教授的课中也曾讲述过类似的例子，看来并非夸大虚构，而却有这类钢种。

第二时间段，赵教授的工作场地，由教研室转换到了图书馆。这段时间的工作内容很庞杂，概括起来，主要是文字工作和保洁工作。文字工作是指外文的翻译工作，翻译工作很繁杂，涉及不同类型的外文（德、英）资料，专业杂志的段落、仪器说明书和操作规程等等。相加起来总共翻译了多少印刷符号，现在已很难统计了。在这段时间的末期，编撰了冶金词典。

与此工作同时，他担负起卫生间的保洁工作。赵教授对此工作很认真负责。笔者偶尔曾遇到过这种情景，他手持拖布站在马桶或便坑边，等待使用人出来后，他立刻进入冲洗，打扫的干干净净。在他负责保洁工作期间，出现了图书馆卫生间的最佳清洁期。

第三时间段，应该说是一个春风得意马蹄急的年代。赵教授的工作场地，由图书馆回到了教研室。此时间段的工作可简化为：1. 指导一位研究生毕业；2. 为教研室教师开设了一门英语课；3. 为将去德国研学的教师开授了一门德语课；4. 校对由德文翻译过来的《共析共晶复合材料》，此书原作者待查。5. 受化学工业部委托，翻译了《煤的气化》。（该书原作者待查）；6. 翻译Petzow

教授在沈阳金属所的讲学课本；7.除文字工作外，又添加了口语工作，如接待Leitz与Buehler两仪器公司、接待Aachen工业大学学生实习、与Dahl等多位教授开会交谈。

赵教授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冶金篇”的编委、也是《钢铁》杂志的编委，时有审稿工作。

恢复了国际学术交流，应洪堡基金会的邀请，曾赴西德访问，促进两国科技学术交流。

赵先生长期患有眼疾（青光眼），骑车上班途中，多次莫名其妙地就掉到路旁的排水沟里，造成工作的不便。晚年患了十二指肠溃疡。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赵教授辞世已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为我国冶金教育事业做出过贡献，是爱国的民主人士。

撰稿人：刘国勋 原北科大材料与工程学院教授

纪念赵锡霖先生

我原来在北京钢铁学院图书馆工作。1958年反右运动后，组织上把赵锡霖先生由教学单位安排到了图书馆。赵先生半天劳动、搞图书馆的卫生工作，半天搞外文翻译工作。那时，我在图书馆搞编目，赵先生在编目室搞翻译。由于在同一个办公室，就认识了。不过，赵先生当时处于所谓劳动改造阶段，他非常谨慎、从不讲话，埋头做他的翻译工作，我们也不接近他。我只是在打水之后，轻轻告诉他，有热水可以泡茶了。他也示意，表示感谢。“文革”之后，落实党的政策，赵先生才重新回到了久别的材料系金相教研室。主楼二楼有一间赵先生的办公室。

1980年，我因工作调动，很巧，也来到金相教研组，担任教研组的干事，忙于很多事务工作，如接收、分发各种文件、信件、通知等等。赵先生回来了，自然联系就多起来了。又因为在编目室共过事，接触起来感到很熟悉，讲起话来也多了。回忆起在图书馆工作时的情景，感慨很多。少数人对赵老师的态度不好，用语言压力表明自己划清了立场。而赵先生只是一言不发，埋头工作。我看在眼里，总感到不舒服，心想组织上已经给他定了右派，就是一种处罚。他在认真的劳动改造，又老老实实在地工作，何必这样对他施加压力！我一向尊重知识和有知识的人，讨厌这些人的这种态度，所以天天打水时对他有所关照。

现在，通过在教研室的接触我更感到赵先生原来是个很平易近人的人，有时还很风趣，也很客气、友善。又过了一段时间，

赵先生除了开会、接待外宾等事以外，大部分时间改在北大朗润园的家里工作。我的业务工作内容也随着时间变化更加多样了。比方说：给不住在学校的老师送东西、信件、工资等。我因此多次去过赵先生家。赵先生总是很客气，每次去的时候，总是用桔子水或茶水来招待我。交谈的内容也更多了。从中我知道了赵先生会做菜，谈起做菜的手艺非常有经验和体会，他还教会了保姆如何做西餐；赵先生爱种花，说到应该如何给花施肥也是一套一套的。他在家前边的空地上种了许多花，花开的都很茂盛，让我看到赵先生也是个非常富有生活情趣和多方面爱好的人。有时也谈到教研组和学校的一些情况。一次，谈到图书馆内的一些情况、说到共识之处，不觉都笑起来了。他是个眼光敏锐、心中有数的人。他得知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不易的情况后，很关心地问我钱够不够花？这使我非常感动。他鼓励我好好工作，可别犯错误，否则孩子们都会受到影响，态度极其诚恳。有一回，工会发了一些新年过节的物品，赵先生坚持说不要了，一定要转送给我。后来我享用了部分，把另一部分送给了教研室其他人。我想这是赵先生照顾我的，不在于东西多少，从中看到了一颗体贴人的心。这一切都使我感到赵先生是一个真诚关心人的、可敬的长者，他的态度和语言让我感到亲切和安慰。

1988年我退休离开了教研室。我和赵先生的联系也就停止了。得知赵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心里非常难过。参加赵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时，不禁回想起许多往事，忍不住哭了。我后来向孙静远老师要了一张赵先生的遗容照片作为永久纪念。

2000年后，有一次和同事去北大，我特意来到朗润园赵先生的家。那时，赵林克悌老师也已经重病在身。我走到她床前向她表示问候，并问她还认不认识我？起先她说我姓孙，后来又想起

我姓李，她还认识我。

赵先生故居依旧，人却已远去。回忆起当年，告别时赵先生像老人送孩子似的慈祥目光和身影，心中说不出的感伤。

撰稿人：李秀卿

原北京钢铁学院工程系金相教研室职工



朱日彰
ZhuRiZhang
(1930年—1996年)

朱日彰教授在金属腐蚀专业建设和腐蚀与防护中心的创建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培养腐蚀与防护专业高质量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是深受广大师生爱戴的良师益友。朱日彰教授治学严谨，重视教书育人，成绩卓著。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贡献突出，他被美国腐蚀工程师协会(NACE)授予高级会员，获1994年杰出贡献奖，并被选为NACE科研发展委员会委员。

朱日彰简介

1949—1955年 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留校。

1955—1959年 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 研究生，获副博士学位。

1959—1972年 国防科委九院 助理研究员。

1972—1975年 钢铁研究总院 高级工程师。

1976年— 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专业技能：金属材料和金属腐蚀。

1978年 研究彩电玻壳模具钢获国家科委创造发明二等奖。英、俄语均可听、说、写、读，并熟练掌握。曾任：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及秘书长；中国金属学会理事。

1981—1988年 曾赴英、美、澳、法、苏等国家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曾获优秀教材奖，写作专著五本，学术论文百余篇。曾获冶金部高等学校先进工作者称号。兼任北京化工大学、燕山大学、山东矿冶学院教授。获国家发明专利三项，主编了“高温腐蚀及耐高温腐蚀材料”等六部讲义和书籍，其中《金属腐蚀学》获国家教委全国优秀教材奖。

1994年 获美国腐蚀学会工程师协会高级荣誉会员及杰出贡献奖，并被选为NACE科技发展委员会委员。

1996年 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朱日彰生平介绍

朱日彰教授1930年9月25日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朱家庄。1945-1949年在烟台一中、青岛扶轮中学、北京市汇文中学学习；1949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金相热处理专业，1955年5月毕业，同年11月留学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攻读研究生，1959年2月获苏联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同年3月回国。

朱日彰教授从1959年3月至1972年4月先后在国防科委九院、青海二机部211厂、解放军总字819部队工作，直接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与试验。他十几年如一日，在西北草原与新疆戈壁滩的艰苦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为打破霸权主义的核垄断、为发展我国核材料科学技术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与智慧。核工业部为表彰他长期从事我国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成绩卓著，特授予荣誉奖章和证书。

朱日彰教授1972年5月至1975年12月在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六室从事新材料的研制工作，他参加的“彩电玻壳模具钢的钢种及工艺研究”获得1978-1979年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的重大技术改进二等奖。

朱日彰教授1976年1月调入北京钢铁学院理化系金属腐蚀与防护研究室，先后担任过教研室主任，表面科学与腐蚀系副主任、主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科技大学腐蚀与防护咨询培训中心项目主任、中心主任，系学术、学位委员会主任，校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等工作。1986年被聘任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兼任北京化工大学、燕山大学、山东矿业学院教授。

朱日彰教授在金属腐蚀专业建设和腐蚀与防护中心的创建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培养腐蚀与防护专业高质量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亲自指导并已获得学位的博士生18名，硕士生17名，是深受广大师生爱戴的良师益友。他治学严谨，重视教书育人，成绩卓著，多次受到冶金部、学校的表彰，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对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他长期从事高温腐蚀与防护领域的科研工作，先后承担过国家科委“六五”基础研究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七五”重大项目，“八五”重点项目等研究工作，先后在国内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110多篇论文。他参与的“12SiMoVNbAl耐高温腐蚀钢的研制”1982年获冶金部重大冶金科技成果三等奖，他主持的“金属材料的热腐蚀机理研究”1988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又获冶金部科技进步三等奖。此外，他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三项。他曾担任国家计委表面工程中心专家评审组副组长。朱日彰教授主编已出版的专著有“高温腐蚀及耐高温腐蚀材料”等六本，其中“金属腐蚀学”获1992年国家教委全国优秀教材奖。

朱日彰教授1978年任国家科委腐蚀科学学科组常务秘书，直接参加了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的筹备与组建工作，学会成立后，先后担任过理事、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工作。他在出色的完成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前提下，长期以来致力于学会的组织管理与领导工作，为学会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在推动国内国际学术交流、腐蚀与防护的培训与咨询、组织腐蚀与防护手册和《腐蚀与防护全书》的出版等方面充分发挥了他的智慧与才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学会的每一步发展都留下了他的汗水与足迹。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

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积极维护学会的团结，在病危期间仍念念不忘如何把学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开成团结的大会。

朱日彰教授重视国际学术交流，曾多次参加国际腐蚀科学与工程学术会议，参加并主持亚太地区腐蚀控制学术会议，出访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日本等国，进行讲学、交流。由于朱日彰同志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的突出贡献，他被美国腐蚀工程师协会（NACE）授予高级会员，获1994年杰出贡献奖，并被选为NACE科研发展委员会委员。

朱日彰同志一生为党的事业辛勤奋斗，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把全部精力与智慧都放在了我国材料科学研究、腐蚀科学与工程的教育及学会的工作。

我的父亲朱日彰

我的父亲朱日彰，1930年9月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叫朱家庄的农户家。据我姑姑朱日维回忆，当时我们家祖上住在烟台的乡下，虽然我的曾祖父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我的曾祖母是读过书的，家里主要是曾祖母主事，她也十分重视子孙的文化学习和教育，因此我们家从我祖父那一辈到我父亲这一辈所受的教育，在当时来说都算是相当好的。我父亲和他的兄弟姊妹们到了读书的年纪，都被送到当地较好的学校读书。我父亲他人很聪明，读小学时，每天上学都要翻过一座山，走很远的路，他学习很勤奋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很好。我父亲小的时候虽然个头不是很高，但身体很壮实，能吃苦，喜欢体育，跑、跳、游泳、足球、篮球等都是他喜欢的项目。

我父亲为人正直、热情，动手能力强，并且交际广泛，不但亲朋好友都喜欢他，家里的长工、短工等也都跟他成为好朋友。一次不知因为犯了什么错误，我祖父生气，把他好不容易用积攒下来的压岁钱、零花钱买的跑鞋扔到了井里，父亲坐在井边哭得非常伤心，家里的长工们就瞒着我爷爷，费了好大劲，才帮他打捞上来。我父亲小的时候就常常自己动手扎风筝、做木枪、模型等玩具。据我姑姑回忆，他从小就有很强的爱国情，立志将来要当工程师，用自己双手建设国家，让国家强盛起来，不再受日本的欺负。我父亲中学时期，为了让他受到更好的教育，祖父送他到烟台城里的辅仁中学读书。当时（算起来应该是1944年）正是

抗战后期，烟台城里还在日本人统治下，学校也是日本人控制的，学生进学校被要求向日本国旗鞠躬敬礼，我父亲因不愿意向日本国旗鞠躬敬礼曾多次被训斥。后来因不堪忍受日本学生欺负，独自一人与几个日本学生打架，并且打伤了一个日本学生，日本人说：“一定是‘老八’指使的”，即认为他背后一定有共产党八路军指使，要来抓他，幸亏一位好心的工友把他藏在一个废弃的锅炉内，才没被日本人抓走。之后我爷爷连夜把他送回乡下，才免于难。此后我父亲不能继续在烟台的学校读下去了，幸好有我的一位在铁路上工作的叔爷爷（我父亲的叔叔）的帮助，让父亲跟随我姑母（我父亲的二姐，当时我二姑父正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来到北京（当时叫北平）。



中学时期父亲（右一）和校篮球队的同学们合影

我父亲到北平后考入北京汇文中学，虽然他考入汇文中学时年龄偏小，但他学习刻苦发奋，因此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经过几年的学习，于1949年7月毕业，完成了他的高中学业。据我父亲跟我们回忆起他在中学学习时的一些事情，可以知道，在汇文中学读书的几年里，受进步思想影响很大，积极接近思想进步的同学，于1949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也更坚定了他学好知识，报效国家的信念。1949年年初北平和平解放时我父亲正在北平，我记得他曾多次跟我们讲起，他和同学们一起去城门口，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情形，每次说到此，他的兴奋之情都溢于言表。

1949年9月，我父亲从汇文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迈出了他立志当工程师的第一步。解放初期的哈工大，大多数课程是由前苏联的老师直接用俄语授课的，所以入学后首先要学习2年俄语。49年之前我爷爷和伯父曾在青岛做生意，与外国人接触较多，英语水平都相当高，可能是受我爷爷和伯父的影响，我父亲的语言能力也相当强，俄语学得也很好。当时的东北，生活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平时主要是吃高粱米，但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课程都没能影响乐观的父亲，他在大学学习期间仍然喜欢体育，坚持锻炼身体，夏天游泳，冬天滑冰，还是学校篮球队的组织后卫，并且学习成绩也一直非常优秀。入大学不久（1950年1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时起父亲时时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之后的岁月里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为国辛勤工作。

父亲在哈工大读书时，我祖父曾专程去哈尔滨看他。

1955年我父亲以优异成绩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同年11月由国家选派去前苏联留学。最初我父亲被派送到圣彼得堡（当时

叫列宁格勒)，但不知哪个环节的失误，列宁格勒的学校里并没有合适的专业，与国内联系后又被安排到莫斯科钢铁学院，并在那里结识了也在同一学校学习的我母亲。父亲在苏联留学时主攻金属材料学，专业是金相热处理。在前苏联留学期间，除学习优秀，热爱运动外，我父亲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也比较突出，当时还担任过莫斯科钢铁学院中国留学生的党支部书记。留苏期间最令人难忘的事是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苏联访问期间接见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我父母均在现场见到毛主席和参与接见的邓小平、彭德怀等我们国家其他领导人，并亲耳聆听毛主席对留学生及整个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的这段话激励着我父亲这一代人为国家的建设和富强奉献终生，我父亲也用他的努力回报了国家对他的培养和期望。在苏联留学时他成绩优异，毕业论文和答辩也非常精彩，曾经登在1959年的中苏友好杂志上。

1959年年初他完成研究生答辩，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副博士是苏联，俄国的一种学位，是制式学习中，最高的学位了，因为更高的全博士学位是没有导师的，是独立研究在某领域取得突破，才授予的，因此一般来说，副博士相当于博士学位，全博士相当于博士后），并于当年3月回国。



哈工大就读时，父亲与祖父的合影



父亲拍摄的毛主席接见留苏学生的照片



父亲在莫斯科红场



与留苏同学合影父亲（右三）王润（左三）（后任北科大校长）



父母与同学们的合影 父（后排右一）母（后排中）

父亲回国后迫切希望尽快投入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以回来马上去高教部报到。当时国内正在轰轰烈烈搞社会主义建设，“钢铁元帅”升帐，先期回国的同学都已经到冶金系统报到工作，自己专业也对口，因此我父亲也满心希望尽快加入到“钢铁元帅”帐下，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干一番事业。但报到后他收到的派遣通知却是被分配到刚刚组建的二机部（即核工业部）九院工作，当时他根本不知道二机部九院是干什么的，也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学专业与核武有何关联，带着满腹疑惑，他去找了相关领导。据我母亲回忆，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曾三次找我父亲谈话，二机部九局的李觉局长也曾找我父亲谈话，钱老在谈话时明确告诉我父亲，国家的核工业需要各种专业人才。与钱老和李觉局长谈话后我父亲表示：服从组织安排，到国家最需要的

地方工作。就这样他到二机部九院报到了。并在之后的工作中直接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工作。

既然参与到两弹研制的队伍中，按照国家规定要严格保守秘密，因此，家里人，包括我母亲在内，只知道他的工作单位是保密单位，谁都不知道他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根据我母亲的回忆，最开始他在北京和青海基地两头跑，后来（60年代初）就调到青海221厂去了（我想那时应该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期），以后的每年只有探亲假才能回来看看。当然了，家里人也是后来才知道他在青海221厂，但221厂是干啥的，我父亲在厂里具体做什么工作，家里人也谁都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们全家人包括我母亲在内，也只知道他在221厂参加了两弹的研制工作，我父亲当年具体在221厂的哪个分厂，做何工作，对我们来说仍然是完全的空白。2019年11月初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9频道），连续几天播出了大型纪录片《代号221》，讲述中国核工业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看了这部纪录片，我从一个侧面略微了解了一些我父亲他们那辈人当年在青海，是在一种怎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研制成功了我国国家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略微知道了一些中国核工业在起源、研发和试验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请母亲仔细回忆，再根据父亲当年的老同事告诉我的一些事情，并查阅了一些资料（近几年国家大力宣传两弹一星精神，当年参与两弹研制，目前还在世的一些老同志撰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才知道，我父亲在221厂是102车间涂层组的组长，而221厂的102车间负责的具体工作是原子弹研制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岗位——核材料的研制。有资料介绍说：“参加两弹研制的很多人都是从苦难的旧中国走出来的，他们懂得旧中国曾经遭受长达数百年的欺凌，更加懂得来之不易的解放意味着什

么，他们明白人民当家做主，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必须要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他们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一心希望我们的国家尽快强盛，他们用最朴实的一颗心表达着对国家的一份情愫”。“五十多年前，在中国的核材料研制还是一片空白的情况下，中国制造核弹第一个铀部件加工车间——102 车间科技团队平均年龄 30 岁左右，他们服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进入了核材料研制的崭新领域。团结一心克服万难，练就了不惧怕技术难关，一些人甚至有了喜欢迎接挑战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完成了核材料及关键热核部件研制的攻关任务。在核材料的控制，核材料的工艺、同位素交换方法等方面，进行开创性的研究，解决了许多极其复杂的实验与工艺问题，最终研制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他们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部件关键技术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核材料的科学研究事业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圈内的人称 102 是核材料领域的开拓者、先锋队。为国家培养出了一批核材料科技人才。借用 221 厂保卫部门的口头禅：‘102 是核心中的核心，要害中的要害！’ 102 车间从开始成立就定为‘绝密’级，可见在核武器两弹研制中的重要性。”当时所有的研制工作，从人员、场地、实验室到试验设备、材料等等都需要白手起家，从零开始。

我父亲在 9 院和 221 厂工作期间因为保密的原因，没有留下任何照片等影像资料，是我们的一位发小，最近在查阅资料时找到的一张合影，这张照片是我们看到过的父亲在九院工作期间，与工作相关的唯一的照片。据父亲的老同事回忆，这是我父亲（前排左三）和他的同事们去草原参加第一颗原子弹研制会战前夕拍的，但不知为何我们全家，包括照片中现在还健在的人，都说是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照片中是我父亲和涂层组的同事们。涂层



首枚原子弹研制会战前夕，221厂涂层组职工合影
(前排左三为父亲)

组的工作是制造核弹的轻材料经过加工后，要经过涂层组进行处理，因为轻材料性能十分活泼，非常怕水，空气中的湿度都能令其产生化学反应，使材料变质。涂层组的工作地点在70平方米的密封空间里，这个空间的空气湿度要控制在1%以下，所以专门修建的干燥空气站通过专用管道将干燥空气输送到密封空间。轻材料的加工从压制成型组开始，都必须在密封的手套箱里进行操作，产品加工时需将手套箱抽成真空状态，才能被吸盘吸住，才能对产品进行加工。抽真空之前先要经过涂层组在密封间里进行处理，控制轻材料的活性。加工好的产品还要进行涂层处理，此程序不能再放到手套箱里进行操作，只能在密封干燥的环境下进行。在干燥的环境里和氢材料打交道，必须戴口罩、戴手套、

穿白大褂，工作时大家的耳膜就会有“轰、轰、轰”往外鼓的感觉，鼻腔、咽喉部位接触空气比较直接与集中，就会出现严重缺水的情况，但大家却不能喝水，因为喝水会增加空气湿度。为避免外面的空气进入密封间环境遭到破坏，必须要工作6个小时，还要减少开关密封间门的概率。涂层组实验室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研究轻材料跟环境的适应性，研究它在不同环境下的储存情况等。为了把前期的工作做好，大家到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地做调研，并从原理上严格筛选出近百种油漆，千百次地反复进行试验。

我父亲刚到九院工作时我还没有出生，他调去221厂时我也只有3岁多一点，我弟弟还不满2岁。当年他们离开北京去青海时九院派了一辆大轿车，来送他们这些要去青海基地的人去火车站，我妈抱着我弟弟牵着我到院门口送他。我现在也不能完全断定自己的记忆是否正确，但不知为什么，那天送他走的情景，几十年来一直有一个画面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不能忘记。记得那天天气阴沉沉的，很冷，我爸穿了一件蓝色的棉军大衣，现在想那件大衣可能是统一配发的，因为似乎大家都穿着这样的大衣。大轿车载着他们沿着当时并不宽的马路，往花园路3号开去，在那里还有一部分人也要同去青海。大轿车开走了，我还追着跑了几步，被我妈厉声断喝，叫了回来。多年以后，我也说不清为何，当我第一次读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两句古诗时，那天送我爸他们去青海的画面就立刻浮现在脑海中。

我父亲调到221厂以后与家里的联系就只有书信了，寄信的地址也只有一个信箱号。我记得是2019年国庆期间看了一个关于两弹一星的回忆记录片，其中王淦昌老伯的儿子回忆说，当年王淦昌离家参与两弹研制的工作走后，他问自己的母亲：“我爸到哪儿

去了?”，母亲回答说：“你爸到信箱里去了。”这位老阿姨的回答还真是幽默。回想起来，我们家住在塔院（二机部九院的家属宿舍）的时候，很多家庭，常年都只有母亲在家，很多在一起玩的小朋友、同学我们都只熟悉他（她）们的母亲，似乎完全不知道他（她）们的父亲长什么样子，对于我那些小朋友、同学们来说我父亲也是“谜”一样的存在。不过这种情况在我们院里是普遍现象，因此大家也就见怪不怪了。当年我们家居住的塔院1号家属院，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只是北京一个普通的居民住宅小区，那时我年纪还小，不懂事，当1964年和1967年中国西部的两声巨响和升腾冲天的蘑菇云引起全世界瞩目时，我和我周围的小伙伴们完全不知道，这巨响的研制者就是我们的父母们，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平时熟悉的那些伯伯、叔叔，如邓稼先、于敏、王淦昌、朱光亚、吴际霖、周光召、宋家树、何文钊、陈宏毅等等都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大家和两弹研制工作的重要领导者，这其中也包括我父亲他们这些普通的科技工作者们，他们为我国的核武器、核工业的研究、发展默默奉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他们这一代人的负重前行，才有我们国家今天的强大，才让我们中华民族在今天能够挺起胸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张照片拍摄于1967年天安门广场，我觉得那次我父亲回来探亲，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研制成功后，带着成功后的巨大喜悦，拥着一双儿女，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老爸当时心情是多么喜悦和幸福！但是这次重返221厂后，却迎来了我们家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我印象中他这次回到221厂就遇到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由于运动的扩大化，221厂成了“重灾区”，我父亲也因为曾在苏联留学的缘故，被打成“苏修特务”，无端受到迫害，被隔离审查。我记得他被隔离审查的那段时间，家里忽然间完全没有了他的任何



首颗氢弹研制成功 父亲和我们在天安门合影

信息，过去他每月发工资后都要将大部分工资寄回家中。那时他的工资也被停发了，因此我印象中大约有半年多或者更长的时间，家里既收不到他的信，也没有收到他寄回家的钱，给他写的信也如同石沉大海，完全没有回音，真不知他人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我妈急得不得了，只能在院里各处打听，知道全院不只是我们一家处于这种状况，才略微放下一点儿心。我也不记得过了多久，我们忽然收到了我父亲寄回家的汇款，从汇款单的简单附言上，我们才知道：他人还在！记得我母亲拿着汇款留言的小小纸条，心情非常激动，我现在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形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她手都是颤抖的，这张小纸条很久以后她还保存着。从这以后我们可以跟我父亲通信了，还是原来的信箱号，但是无



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二十周年，
核工业部颁发的荣誉证书和纪念章

论他写回家的信或家里寄给他的信都必须经过专案组审查，认为没有问题才能交到他手上，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会写信了。为了不让专案组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我妈常常让我写信给我爸，信中的内容无非是：“家里都很好，我在学校学了什么，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等等内容。这样的信可以保证交到我父亲手中，知道家中一切都好，对正在接受审查的老爸也是一种心理安慰。我爸回信时也不多写什么，有时只把我信封上的邮票剪下来再寄回来，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他收到信了，人也算平安。记得当时我妈每次收到他的回信也把邮票剪下来，与他寄回的邮票一起，收藏在我和我妈一起动手做的集邮册内，我就是从那时起养成了集邮的习惯，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

文革中后期，我父亲虽然结束了隔离审查，但仍不让他进试验室，无法接触工作，这让父亲不能忍受，后来我父母商量后，经过曲折努力，父亲调离221厂。因为户口暂时无法进京，作为借调，我父亲先在冶金部和钢铁研究院工作了一段时间。1976年1月正式调入北京钢铁学院理化系金属腐蚀与防护教研室，担任教研室主任，后任系主任。

父亲调入钢院后不久，赶上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国门的开放让他的眼界也更加广阔，他曾多次去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做学术访问，主持和参加了许多国际学术会议，还推荐他的许多学生出国留学。在他多方努力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腐蚀与防护咨询培训中心项目落户在北京科技大学，成为世界三大著名的腐蚀中心之一。在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同时，他还完成了数本学术著作。在教育理念上，父亲不只教学生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我曾几次听他说过，教学不是生硬地灌输给学生多少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在实践中的学习能

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我印象中父亲一直非常忙碌，他说过许多次：“等我退休了，有空了，我要好好抓一抓我孙子和外孙的教育，特别是英文和书法。”但直到最后，他也一直都没空……



父亲与张文奇院长



在北京钢铁学院大门口

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如您所愿，我们的祖国正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繁荣富强，老百姓的生活也更加幸福、美好！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我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朱日彰之女 朱青

2021年6月8日



朱耀中
Zhu YaoZhong
(1931 年—)

朱耀中是北京钢铁学院从无到有的亲历者和贡献者，是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的首任团总支书记。他始终坚持和广大的青年在一起，引领和帮助他们树立“一切为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朱耀中说，青年团是在党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它始终坚持与广大青年在一起，引领青年们，响应党的号召，“背靠党委，面向青年”，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帮助青年树立“一切为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朱耀中简历与生平

朱耀中，汉族，1931年出生。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第一任团总支书记。曾任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团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工艺系党总支书记、政治教研室主任、宣传部部长，自动化系党总支书记，为学校团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1952年 从东北工业干部学校调至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1953年—1956年 任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团总支书记、团委书记。

1953年4月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总支委员会经批准成立。4月18日，朱耀中被任命为第一任团总支书记。建团伊始，钢院共有团员402人（包括候补团员8人），学生团员占全员同学近半数。为适应工作需要，团总支设立了组织、宣教、联络、统计四个工作组，每周二、四、六轮流到团总支办公室开展日常团务工作。

1956—1957年 任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工艺系党总支书记。

1957年 下放至昌平中滩村任下放干部领队。

1958年 下半年，院党委整顿并重建了马列主义教研组，朱耀中为教研组主任。

1958—1965年 任北京钢铁学院政治教研室主任、宣传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时期下放“五七”干校。1972年返校后任北京钢铁学院印刷厂厂长。

1979年—1983年 任自动化系党总支副书记，期间参与过授课，并一直工作至1983年调离学校。

1983年—1992年 任冶金部信息标准研究院党委书记。1994年离休。

朱耀中是钢院从无到有的亲历者和贡献者，尤其是团委的发展。每每讲到团委刚成立时的点点滴滴，朱耀中总是激动万分。当回顾起建团初期的时光，朱耀中说，青年团是在党的教养下成长起来的，它始终坚持与广大青年在一起，引领青年们，响应党的号召，“背靠党委，面向青年”，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帮助青年树立“一切为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无悔耕耘三十载，诉尽一生钢院情

——访北京科技大学老团干朱耀中

难忘满井岁月：于建校初期的艰苦环境中学习工作

朱耀中的家里十分简朴，零零散散的老家具，很少见花花绿绿的摆设，客厅里面，摆放着一张略显破旧的老式木椅。朱耀中介绍，这是在钢院工作时的家具，调离学校后，老物件没剩下什么，唯独将这个满载回忆的“老朋友”保留下来，新家具不如它用着“心里踏实”，而且能想起很多人、很多事。随后，朱耀中回忆起了建校初期的艰苦岁月。

1952年，为适应国家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寄托着中华民族“钢铁强国梦”的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随之诞生。

建校伊始，由于学校还未完全建成，没有合适的办公和教学楼，钢院临时在清华大学生物馆办公，钢院的团总支委员会也在清华大学团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1953年8月下旬，钢铁工业学院搬离清华园，钢院的团委也开始了在满井村中的艰苦创业。

建校初期的条件十分艰苦，“无风三尺土，下雨两脚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就是那个时期学习和工作情况的生动写照。满井村因为一口“满井”而得名，这口百年古井当时供养着

同学们的部分生活用水。朱耀中回忆，建校初期的钢院，校园中初建了教学楼（现为办公楼）和几栋教工和学生宿舍，整个校区远没有现在这么大。全院学生每天早晨洗漱都要拿着脸盆去“满井”旁边打水，“满井”不大，大家只好耐心的等待。寒冬时井水冰冷刺骨，不少同学排队的时候都打着哆嗦，但是丝毫没有影响大家为钢铁事业勤奋学习的热情。正是这苍苍“满井”，才润泽出钢院学子的钢铁脊梁。



清华园中的钢院师生（左一为朱耀中）



朱耀中（左）和张柏生在天安门

建校初期，钢院的教室同样不宽敞，设备也不齐全。为了不影响教学计划的顺利实施，广大师生就在临时搭建的工棚中开展教学。上课没有黑板来写板书，老师就从工地找来木头，自己锯成木板来写字。上课桌椅不够，同学们就三两个一组，在一把有扶手的椅子上读书、学习。当时的教材也是没有的，老师们就自编讲义，边传授知识，边丰富自己的授课内容。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洋蜡”成为学生们的必备学习用具。阴天下雨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同学们就点着蜡烛读书、上自习、学政治、谈理想。

特别的是，每周六晚上大家还点着蜡烛在走廊上跳舞。朱耀中回忆，发源于学生宿舍走廊的“钢院舞会”是学生们课余时间最好的消遣方式，那个时候学校没有好的操场，也没有完善的体育器械，大家除了跑跳之外，慢慢的自发组织起了舞会，后来发展到餐厅举行，吸引了魏寿昆、王祖成、陈国良等一大批教师和学生的积极参与。老师们的加入，使得舞会受到了更多人的欢迎，参与其中的人也越来越多，渐渐成为了当时钢院每周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舞会也就成为教师和学生在学习工作之余的重要活动。钢院人天生的浪漫和乐观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每天校园里都有工人和机械穿行其中，到处的施工尘土飞扬，相当影响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但是校内的活动却稳而不乱，这都要归功于钢院团总支在学院党总支、上级团委的领导下，进行的整顿，建立了工作制度，健全了组织体系，让青年团逐渐走上了正轨。根据第一届团总支的历史资料，建团初期，青年团主要做了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展组织工作，培养了青年积极分子，发展了青年团员，在“五四”举行入团宣誓仪式，让更多的青年们了解青年团，加入青年团，热爱青年团，鼓舞了青年的学习热情，影响了更多身边的青年们。二是贯彻“计划性”，围绕清华大学“教学、政治、健康”三大计划，发动团员制定个人计划，合理的安排自己的生活作息。三是整顿纪律，转变部分青年学习上的不正确思想，提高青年的自觉性，教育青年要主动认识到自身的问题，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改正自身的缺点。四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让团员带动全院青年学习普希金《学习好，必须独立工作》的演讲，启发青年改变学习方法，不唯书，只唯实，在学术上善于发现问题，敢于质疑，长此以往，学生们不仅能将知识更好的融会贯通，更是帮助老师在授课的时候

对自己讲义的错误进行修改和订正，进而推动教学改革。

回忆建校初期的青年团工作，朱耀中说，虽然环境艰苦、条件简陋，但是大家热情高涨、意志坚定。钢院青年团紧密围绕党的领导，结合学校当时的特点，扎实开展各项工作，为我校团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深入团员青年：在党委领导下开展青年团的工作

1954年9月19日，青年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钢院党总支、团市委的领导亲切关怀下召开，大会明确了钢院青年团的指导方向——深入进行“一切为社会主义”教育，响应毛主席“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伟大号召。

时至今日，朱耀中依然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团代会的场景。大会上，朱耀中代表钢院团总支作了工作报告，铿锵有力的陈述着团总支的工作成果，并诚恳地请与会代表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在“肯定成绩，揭发缺点，发扬民主，开展批评，改进工作”的精神引领下，在场的团员青年们真诚的对青年团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议。大家认为，团的思想教育工作不够深入、不够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得不够，团的指导思想还不够明确，没有能够把“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贯穿在各项活动中，很多团员和青年也没有能够将“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思想贯彻到日常学习生活中。特别是领导与青年学生们的交流不够，许多政策得不到具体的落实。有团员提出，学校中爱护国家财产做得不够好，本来就少的可怜的桌椅，很多人还不爱惜，抢饭吃、抢座位的风气较为严重，因为争抢而引发的同学矛盾时有发生，最恶劣的是仪器的损坏，科研院校仪器既昂贵又重要，如果不爱惜仪器，谈

何学习科研，这些学校中出现的不好现象都值得警惕。很多人建议，团的工作一定要依靠群众，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到共青团，只有这样，学生们才可以把团组织存在的问题反馈回来，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改进工作，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团组织进步了才能更好地服务学生。

面对青年团员的诚恳建议，朱耀中做了认真的记录，随即向大家表态：团总支一定会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在今后的的工作中明确青年团工作的指导思想，改进工作作风，保证团的各级领导同学生相结合，接受学生监督，倾听学生呼声，大力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扎实地开展青年团工作。

大会后，朱耀中与团总支的同志们深刻总结了青年团的工作，发现了根本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法：要求全体团干部深入到青年群众中，走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路线，只有走到青年学生身边去，才能真正了解青年学生。此后，团委会专职干部们建立了基层联系制度，每名团干部都与一个“重点班团支部”建立了长期的联系，参加他们的班会、团支部会，探讨班级的发展与团队的建设，给出相应的建议，并总结发生的问题和反馈的意见。专职干部们经常到学生宿舍中交流、谈心，了解班级发生的事情，对同学们发生的矛盾进行疏导，熟悉班级里的每一位同学，向同学们了解学校中还有哪些设施设备有问题，并认真记录向上反馈，积极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方式，认真改正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获得了青年团员的一致好评。朱耀中回忆，他当时与铁56班建立了联系，参加了班级和团支部组织的活动，与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使他能够及时地了解同学们的心声。时至今日，他仍与当年铁56班的成员们保持着联系，足可以看出其深厚的友谊，这份经历也让他认识到了要让青年团的工作真正走

到青年群众中间。

针对青年团员的意见，钢院青年团重点围绕学生的基本任务——学习，扎实开展了一系列工作。首先是做好宣传动员，团干部向青年学生提出倡议，学习是青年在祖国有计划建设时期的突出任务，一个好团员的评价标准第一就是功课好，尤其是在钢院这样的培养工程师等高科技人才的院校，青年们更要努力学习，大家要勇于向科学进军，获得丰富的科学知识，为今后学习专业知识打下基础。其次团干部要带好头，有些团干部总是拿工作当借口，逃避学习，还有一部分团干部确实愿意为组织和同学们服务，但投入工作的同时忽视了学业。这次共青团着重要求团干部们在学习中发挥带头作用，平衡好工作和学习的时间分配，扭转了过去“说大话，放大炮，只会工作不会学习”的作风。很多团干部学习成绩显著提高，成为了班级中学习比较优秀的学生，也在广大青年中树立了威信，证明了我们的团干部是既能工作又能学习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最后要充分注重思想教育，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共青团的主要工作，青年学生只有思想正确了，未来才能更好地为祖国建设出力，因此团干部教育全体学生牢记原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同志提出的“一个新型工程师必须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在勤奋学习知识的基础上也要关心和学习政治，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在团总支的努力下，全院青年的学习热情和成绩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青年团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指导学生开展校园活动。朱耀中回忆，当时虽然学校的各种硬件设施还不齐全，但依旧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学生会组织的新年晚会、体育运动，都由团总支提供指导和帮助。因此，共青团也成为了连接学校和学生的桥梁和纽带。

朱耀中说，青年团干部要跟青年学生搞好关系，紧密联系青年，深入青年群众，这是青年团的“看家本领”，也是青年团干部不变的作风。

倡导体育运动；带动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在毛主席“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下，钢院深入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成为那个时期钢院青年的最响亮口号。

钢院青年团号召青年学生们参与体育锻炼，让同学们知道，一个新型工程师必须具有善于劳动的身体，懂得自己的一生将要献给祖国的钢铁事业，没有钢铁般的身体，就不能更好地献身于轰轰烈烈的钢铁工业。

朱耀中介绍，共青团在全民体育工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团总支号召青年学生每天早晨自觉地起床锻炼身体，每天下午积极地参加各类体育活动，还特别提出，团总支的日常工作要为同学们的体育锻炼让路，不要用工作的借口来逃避体育运动，保证每一名青年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的时间。每年冬季，团总支都会邀请清华大学的马约翰教授来校作报告，教导学生们要有“不怕寒冷，坚持到底，决不放弃”的体育精神。朱耀中说，北京的冬天很冷，经常会有大风，但是同学们的热情没有丝毫的减少，没有因为寒冷而产生畏难情绪，依旧每天按时跑操。另外，团干部也带头参加体育锻炼，朱耀中、张柏生等人每天都在大操场坚持5000米长跑，为广大师生树立了模范和典型，不少师生也跟着他们的脚步，慢慢形成了一个跑步团体。在团总支的引领下，团员们都十分重视体育锻炼，八成学生达到了劳卫制标准。朱耀中

说，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让自己终生受益。

重返校园工作，继续为校园奉献自己的力量

1972年北京钢铁学院在因“文革”而停止招生5年后，再次迎来了新学员。此时，下放到“五七”干校的朱耀中也被调回了学校，任北京钢铁学院印刷厂厂长。当时印刷厂主要负责学校书籍、讲义、文件、展板等的制造、加工、印刷、排版、装订等工作。

再次回到学校的朱耀中发现，学校样子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到处都有荒废的迹象，回想到当年生机勃勃的校园，朱耀中百感交集。但是这些年的经历磨练出来的意志，让他下定决心在印刷厂埋头苦干，踏实为学校出自己的一份力，这一干就是7年。回想当时奋斗的情景，朱耀中说，再苦再累，能看到学校再次恢复生机，感觉也值了。

1979起朱耀中来到自动化系任自动化系党总支书记，在工作期间，他充分运用其在团委工作时的经验和总结的教训，积极和学生交流，带领党总支干部走访各学生组织和团体，了解需求和意见，进行总结，制定改进方案，更好的为学生服务。朱耀中回忆说，自动化系应该是59年前后成立的，那个时候我还是政治教研室主任，见证了自动化系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过程，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自己来到了自动化系，就更应该为这里多出力多办事。

访北京科技大学老团干朱耀中

朱耀中待人十分和蔼，家里的装修也十分朴素，艰苦岁月让他养成了勤俭的作风。他还每天坚持锻炼，听说这也是在钢院工作时留下来的好习惯。朱耀中看着钢院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所以每每谈到钢院，他总是激动不已，当年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他很渴望和我们分享这曾经的故事。

朱耀中对钢院充满感情。他回忆，钢院非常重视青年团的工作，党委书记亲自抓青年团工作，团市委大学委员会和学校党总支经常召集会议，专题研究青年工作。钢院的干部们能力很强，政治工作经验丰富，团总支班子很团结，每个人都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中，整个学校的工作干劲十足、积极向上。

朱耀中对青年团工作充满感情。谈起青年团的话题，耄耋之年的他非常激动，深情地说，共青团是青年的学校，也是青年干部的学校，是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我们这代人虽然已经离开团的岗位四、五十年，但是每一个人都对团组织充满深情。希望新一代团干部们珍惜大学时光，在社会工作的大舞台上锻炼能力素质，成长为堪当大任的人才。

朱耀中对钢院的孩子们也充满感情。他与铁56班包括当时许多在团内工作的学生们，至今仍有联系，大家虽然在天南海北，但都怀念当时校园的工作和生活。工作时，为了深入了解青年需要什么，朱耀中亲自去同学们中间，了解大家最想要什么，最要改进什么。同学们也因为他的举动，而一直很敬重他。

当谈到1983年调离钢院时，朱耀中的眼眶湿润了。经历了下放劳动和在学工作近30年的他，已经年近半百，自己也知道很难再回到熟悉的校园和同学们中了，因此才特别的不舍。当然，他

很快调整好心态，收拾好行李离开了熟悉的校园，在冶金部信息标准研究院又工作了近十年，直至退休。

朱耀中一直关心着钢院，也一直参加着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2013年北京科技大学举办了纪念建团60周年的主题团会。朱耀中受邀回到了久违的校园，看到当年的教学楼变成了办公楼，曾经的学生食堂建起了教职工礼堂，以前的操场变得更大、器械更多，他不禁感慨万分。在团代会上，朱耀中代表了老团干上台领奖，接受了北科大青年代表授予的，表彰老团干们为学校辛苦付出的特别贡献奖。

当问及对母校共青团的希望时，朱耀中沉吟片刻，在纸上写下了八个字——背靠党委，面向青年。

——摘自《铸梦青春——北科大共青团干部青春纪行》

编后

校史是对一所学校发展轨迹的真实记录，体现的是办学特色和精神实质。历时八年，弦歌不辍。本套《校史资料》（人物篇）于2013年9月正式立项，截至目前，本丛书已发布四辑，记载了我校自1952年建校伊始至1991年40年间，45名优秀校友的成长历程和为学、为师的点滴故事。他们中，有学术界的权威学者和专业翘楚，有业界开疆拓土的创业者，有对学校教风、学风和校园文化的形成和积淀做出突出贡献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党政管理干部。^①

初心如一，使命荣光。这批学校的先行者，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纵使落满岁月的灰尘，依然时时散发着灼灼光芒。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人品，造就了栉风沐雨、不畏艰辛、崇尚实践、鼎新前行的精神——即被后来者誉为“生生不息”流淌在每个北科人心中的“北科大精神”。

假如将每一个在北科大学习、工作过的人比作天上的点点繁星，那么毫无疑问，本丛书记载的人物必是这星辰中较为灿烂的一群。

他们分别是：

顾静徽：中国首位物理学女博士，曾培养出被誉为“世界原

^①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现在已出版有详尽自传或现成完整传记资料的我校资深中科院院士、学术大师级的人物，如魏寿昆、柯俊、肖纪美、张文奇、张兴钤等，暂未列入本丛书的采编范围。

子弹之母”的吴健雄、中科院院士肖纪美等人。

徐宝陞：被美国钢铁学会誉为《二十世纪制钢技术》中连续铸钢的先驱者。

刘之祥：世界最大磁铁矿——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首位发现者和报矿人。

朱 觉：中国电冶金学科和电渣冶金技术的开拓者，学校担任全国人大委员的第一人。

杨 让：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固体发动机机壳材料的研制者。

林宗彩：中国转炉炼钢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先驱者，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钟廷珍：全国著名轧钢专家，为轧钢事业贡献非凡，对轧钢企业的进步居功至伟者。

杨尚灼：中国早期的留学冶金博士，钢铁冶金和轧钢的前辈，建校元老。

章守华：为材料科学技术和教育做出卓越贡献，具有国际、国内盛誉的材料科学专家。

马如璋：中国穆斯堡尔谱学在冶金和材料科学应用的方法研究和教学的开拓者。

……

他们积极投身国家高等教育和钢铁冶金事业，他们的奋斗精神永远值得后来者铭记和传承。

八年跨度，时不我待。挖掘和抢救这些尘封了近半个世纪且濒临丢失的校史资料的历程，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历史是“打捞不起”的一杯文化汁液，“抢救性文化工程”是如此不易，我们的这份工作是如此弥足珍贵。

八载春秋，时光如梭。学校关工委校园文化组历任陆国市、陈世禄、孙铁三位组长。带头人虽有变更，但不变的是每位组长对项目的悉心指导，他们亲自参与、多方协调，为该项目得以顺利完成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校园文化组的各位成员倾情投入，实现了立项初衷——为未来编写《北科大百年史》或《北科大名人名师录》尽心，为加强学校史料记载及解读尽力，为继承和弘扬北科大独特校园文化尽责。

本丛书的成功编撰，离不开学校党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参与，也离不开党办、校办、人事处、离退休职工工作处、档案馆、图书馆以及很多学院二级关工委负责同志和干部的大力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四辑的编撰过程中，我校的一些老教授、老领导克服了自身多方面的困难，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给予了我们巨大支持。这其中有：李静波、赵续生、冯玉成、曲英等。为第四辑提供了重要素材的老同志还有：秦明达、王月、鲁毅强、孙静远、刘国勋、马世才、李秀卿等。在此我们向他们深深地鞠一躬，道声谢谢：“您辛苦了！”

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编人物的家属和亲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和照片，使得本书图文并茂，可读可视，增色颇多。还有就是党委宣传部的领导于成文、彭庆红、李洁，干事董强、孟涛、学生助理李权洲、杨宇宸都为本书的收录、编写提供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对此，编辑组向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每一次回眸学校历史，都是一次精神洗礼；每一次聆听先驱心声，都是一次精神激励。在本丛书第四辑即将付梓之时，我们倍感欣慰，同时也由衷感到：由于本丛书涉及人物众多，历时久远，且内容繁杂，加之我们的编辑水平有限，故而书中难免有一些疏

漏、错误和不妥之处，还望知情者不吝赐教。

附：北京科技大学关工委校园文化组《校史资料》（人物篇）
第四辑编辑组成员

孙 铁 段凤英 刘向军 陈 捷

刘月娥 田 实 吴世培 毕惠芳

电话：62333341

邮箱：ggw@ustb.edu.cn

2021年10月28日

附录：《校史资料》人物篇

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



第一辑目录

高芸生

纪念高芸生同志百年诞辰，回顾我校教育改革历程
深切怀念高芸生同志
我们爱戴的老首长
怀念我们的好领导
纪念我的父亲高芸生

耿步蟾

“优级举人”赴英伦，树“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之志
返国后厌倦“政治”兴办“实业”，从事教育几起几落
战乱四处奔走不忘著书立说
解放后教书育人爱家乡捐书籍受后人赞扬
耿步蟾与家乡的那些事
回忆我的父亲

顾静徽

巾幗经历
学术生涯
顾静徽在北京钢铁学院的三十年
同事眼中的顾静徽

李文

辛劳永不休无怨亦无求
少年立大志
走上革命路
开拓在关东
转业到鞍钢
京华育桃李
晚霞更灿烂
李文同志的往事
无尽哀思李文
怀念我的父亲

刘之祥

三部著作三个全国第一
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
桃李满天下
我的父亲
学生怀念恩师刘之祥教授
有关是谁最早发现攀枝花钒钛铁矿的探讨
忆刘之祥先生
放开、创新与“关门弟子”
恩师永在我心间
主要论著

徐宝陞

求学生涯

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

主要论著

于学馥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的成就

高度负责的社会责任感

科学理论著述和成就

主要论著

朱觉

我国电冶金学科和教育的奠基人

中国电渣冶金的开拓者

深入实际、服务社会……

为而不害、利而不争

主要译著

主要论著

第二辑目录

马如璋

我敬佩的马如璋先生
心底无私天地宽
我心目中的马先生
记三伏天里马老的一件事

王润

成长经历和学术成就
送别北科大首任校长 盛赞其治学严谨
追思王润老师

方正知

辗转求学路
在北京钢铁学院的教学和科研
参与第一颗原子弹、导弹核弹头、氢弹的研制及后续工作
到中国科学院从事空间物理研究工作

孙一康

青年科技标兵 被誉为轧钢自动化的“黄埔教官”
自动化学院向孙一康教授献辞

孙老师祝寿会弟子忆恩师

金山同

教学科研两不误的科技先锋

忆学友金山同

怀念老师金山同先生

纪念导师金山同先生

家庭的回忆与思念

钟廷珍

对我国轧钢事业贡献非凡的人

献给祖国深深的爱

我们心目中的钟廷珍老师

恩师如父

胡庶华

生命的金属质感——胡庶华

忆胡庶华教授

教育成就与留世作品

章守华

中国金属材料科学和教育的卓越贡献者

为人师表 甘为人梯

正己守道 风华更逾百年

童光煦

勤学善教巧实践

精心培养采矿专业人才

深切怀念童光煦先生

采矿工程学科的基础与前沿

贺童光煦教授八十寿辰暨回国执教五十周年

谢锡善

中国高温合金的领军人物

爱国求学 发奋图强

诚挚祝贺谢锡善教授 80 华诞

鹤发银丝映日月 丹心热血铸合金

魏景昌

爱国忧民 投笔从戎

转战高等教育 俯首甘为孺子牛

忆钢院创始人魏景昌同志

戊子清明 祭父

第三辑目录

陈大受

回忆陈大受
陈大受与石景山钢铁厂
访陈大受教授
对开展科学研究的认识

金 岩

迎奥运 忆故人
我的爷爷，老一代体育家金岩
回忆我学十项运动

刘 刚

为了中国钢铁大国的今天
纪念父亲刘刚诞辰 116 周年

刘叔仪

春风桃李花开日 万里姻缘一线牵
叔仪 我永远怀念你
忆刘叔仪先生
刘叔仪生平

我认识的刘叔仪教授

林宗彩

冶金专家林宗彩

厂校联合发展冶金高等教育

著名冶金专家林宗彩

马纪民

怀念我亲爱的爸爸

来自家乡的纪念

马纪民同志二三事

马纪民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在马纪民同志追悼会上林泽生同志致悼词

倪学梓

倪学梓生平

我们的父亲倪学梓

永远怀念倪老师

研究生教育中导师的治学风格拾零

谢家兰

我国培养的首位冶金硕士——谢家兰

谢树英

八十七春秋忆往事
我所知道的谢树英
昂首呼青天 我是铁炼汉

余宗森

坚持用反思和批判的态度振兴中国传统科学的余宗森
回忆与随想
我心中的余宗森司长
记父亲余宗森
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一些意见

杨永宜

杨永宜教授生平
冶金专家杨永宜
《杨永宜论文集》序言
我国著名冶金学家杨永宜

杨尚灼

和轧三同学春节闲话
压力加工系第一任主任：杨尚灼
为人师表 仁者风范